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杨伟民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黄奇帆
辜胜阻	韩永文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John Frisbie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Marc Uzan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编辑部副主任 李蕊

· 本刊专论 ·

关于美称对华贸易“吃亏论”的客观分析 曾培炎 (005)

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实现更新与复兴 张大卫 (014)

· 宏观经济 ·

2019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与下半年展望
胡晨沛 王 军 (028)

· 国际经济 ·

贸易摩擦的确定性与强化金融基础的紧迫性分析 黄志凌 (038)

澳大利亚发展共享经济的经验与启示 于凤霞 (053)

OECD 国家 R&D 投入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杨白冰 李陶亚 (060)

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改革和中国的作用 黄永富 (074)

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基于 108 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 姜惠宸 (083)

全球科技革命与我国职业教育：趋势、问题及选择 李 超 (097)

· 区域经济 ·

区域中心城市郑州的战略定位与发展重点 黄奇帆 (105)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心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博看期刊网收录期刊 中文知识网

· 名人观察 ·

关于中国《外商投资法》和中美双向投资的思考 张晓强 (112)

· 智库言论 ·

如何推动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 郭迎锋 (114)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19)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5)



CONTENTS

- The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So-called “Deficit Theory” of the U. S. Trade with China
Zeng Peiyan (005)
- Guangzhou: Realizing Revival and Rejuven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Zhang Dawei* (014)
- The Analysis of China’ s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9 and
Prospects for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Hu Chenpei , Wangjun* (028)
- The Analysis of the Certainty of Trade Friction and the Urgency of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Basis *Huang Zhiling* (038)
-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Australia’ s Sharing Economy Development
Yu Fengxia (053)
- The R&D Investment Mechanism of OECD Countri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Yang Baibing , Li Taoya (060)
-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System and the role of China
Huang Yongfu (074)
- The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y—— The Analysis of
Multinational Panel Data which about 108 Countries or Regions *Jiang Huichen* (083)
-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China’ s Vocational Education:
Trends, Problems and Choices *Li Chao* (097)
-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Focus of Zhengzhou - a Regional Central City
Huang Qifan (105)
- Thoughts on Foreign Investment Law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hina-US Two-way Investment *Zhang Xiaoqiang* (112)
- How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Guo Yingfeng* (114)
-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9)
-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5)

关于美称对华贸易“吃亏论”的 客观分析*

曾培炎

摘要：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摩擦并不断升级，严重影响两国及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中国政府以极大诚意推动中美经贸磋商，期望解决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美国贸易逆差由来已久，这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低储蓄高消费形成的内部失衡，以及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贸易逆差问题，美方需要正确认识，不能只片面强调货物贸易逆差。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国际贸易的业态、模式与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从货物贸易为主转向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从最终品贸易为主转向中间品贸易为主。只看货物贸易而不看服务贸易，只看贸易总额而不看贸易附加值，只从GDP的角度而不从GNP的角度看国际贸易，都不能准确反映国际贸易全局。实际上，多年来，美国在对华经贸往来中没有吃亏，而是在国家、企业、家庭等各部门获得了实实在在利益。希望中美双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解决各自合理关切，落实两国元首确定的原则与方向，务实进取、相向而行，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贸易协议。这不仅对两国经贸关系具有历史意义，对国际经贸合作也有示范意义。

关键词：中美经贸关系 对华贸易 贸易摩擦 经贸磋商

作者简介：曾培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摩擦并不断升级，严重影响了两国及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中国政府以极大诚意推动中美经贸磋商，期望解决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前不久两国元首大阪会晤，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定向把舵，达成重要共识，再次确认了共同

* 该文为曾培炎同志于2019年7月9日在中国香港“中美经贸关系：现状和前景”研讨会上的讲话。

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并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这为中美关系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从根本上讲，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双方存在巨大利益交集，两国应该成为合作好伙伴，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全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过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化格局。前段时间，有些美方人士声称，因为美对华贸易存在逆差，而使美方在两国贸易中吃了亏。这个观点是片面的，落后于时代发展，实际上经不起推敲、站不住脚。在全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布局中，商品、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实现了大规模跨境流动，形成了全球要素的大市场、大交集、大循环和大平衡，极大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因此，在全球化时代，需要用新的理念，不能只从货物贸易角度，而要从全球要素流动受益的角度来核算。参与交易各主体的受益大小取决于自然禀赋、资本积累、科技水平、产业层次、劳动力素质等有关要素的比较优势，以及参与交易的方式方法。

一、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形成的客观必然性

美国贸易逆差由来已久，这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低储蓄高消费形成的内部失衡，以及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是决定美长期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美国的贸易逆差和美元国际货币主导地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美元必须满足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不断发展中不断增长的交易和储备需求，各国需要依靠对美出口来换取美元。二战后美国贸易长期顺差，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才开始出现货物贸易逆差并不断扩大。80 年代年均超过 900 亿美元，90 年代增长至年均 1700 亿美元左右，21 世纪以来增长至年均 6000 亿美元以上。同时，各国持有的美元不断增长，美元在全球交易和支付结算中的比例为 40% 左右，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更是连续多年超过 60%（图 1）。

（二）美国内消费与储蓄失衡是导致逆差的关键原因

美国是消费型社会，私人消费支出占国内消费总值（GDP）比重达到近 70%，总储蓄率不到 20%，低储蓄与高消费的失衡就需要依靠对外贸易来弥补。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总储蓄率为 23% 左右，此后总体呈下降态势，近年来为 18% 左右，下降了近 5 个百分点。同期，美国货物贸易年均顺差占 GDP 比重由 0.6% 变成逆差为 3.8%，相差 4.4 个百分点，

与总储蓄率下降幅度基本相近（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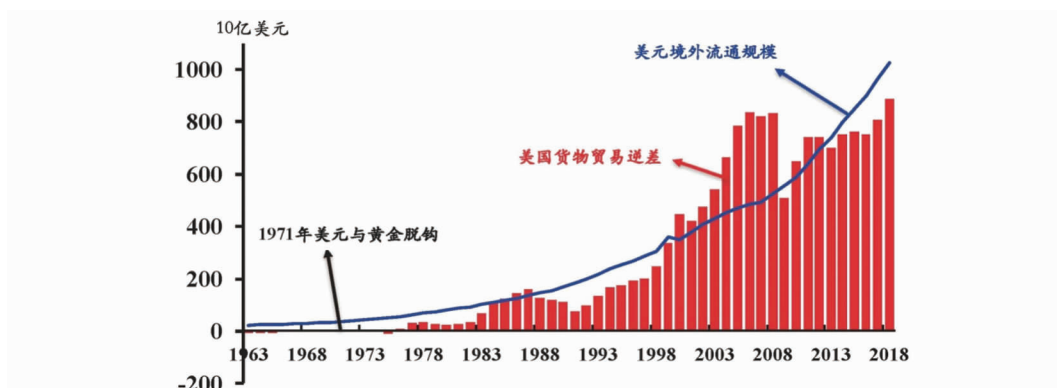


图 1 1963—2018 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与美元境外流通规模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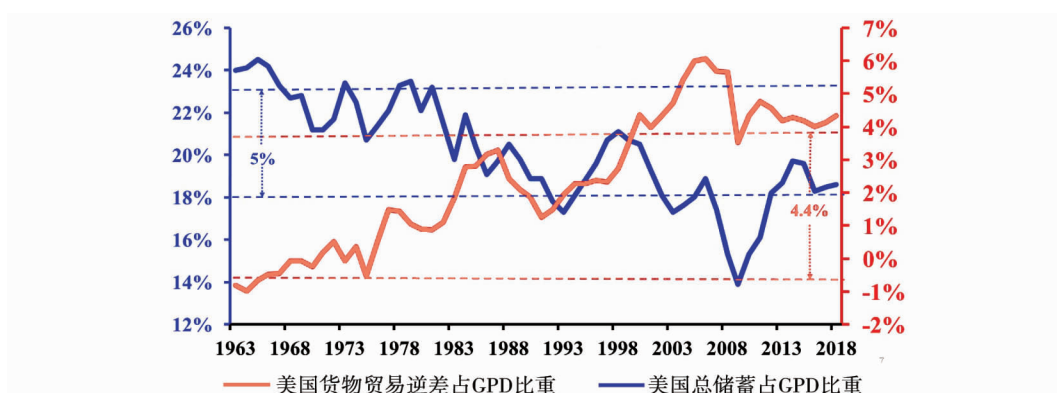


图 2 1963—2018 年美国总储蓄与货物贸易逆差分别占 GDP 的比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美国经济分析局（BEA）。

（三）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

20 世纪后半叶，为了追求发展附加值更高的服务业，同时受人力等要素成本提高和环保约束趋严影响，美国开始将制造业向海外转移。从 1960 年至今，制造业比重从 25% 下降至 11%，服务业比重由 64% 升高到 80%。美国国内生产能力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工业品和消费品需求，必须大量依赖进口。至于制造业就业人口减少、贫富分化，这是美国国内制度性缺陷所致（图 3）。

（四）美国限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是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政策原因

美国多年来一直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制定了《出口管制法案》以及相关的针对关键技术和产品的出口管制体系框架。2018 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仅为 391 亿美元，不到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 1/4，占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仅

为 10.6%。有学者估算，如果美方将限制放宽到对法国的水平，美对华贸易逆差将减少 35%（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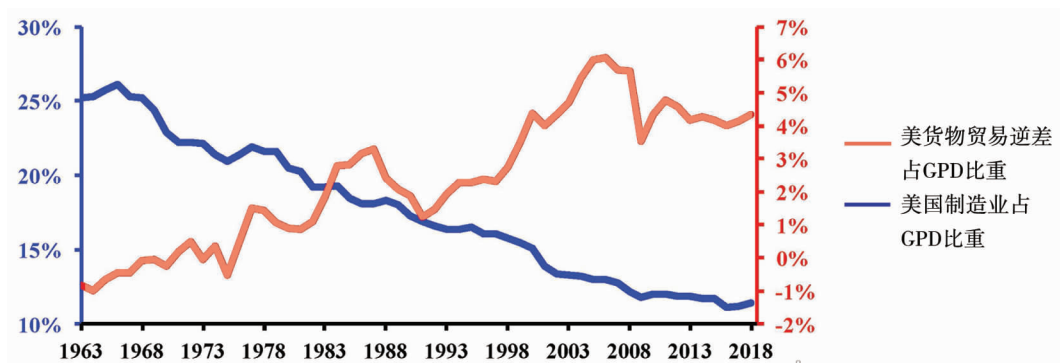


图 3 1963—2018 年美国制造业与货物贸易逆差分别占 GDP 的比重

资料来源：BEA，Wind 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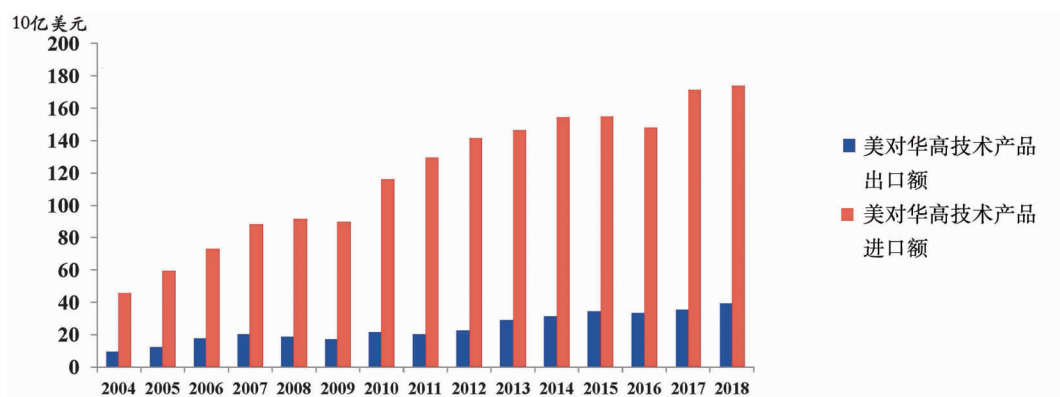


图 4 2004—2018 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与进口额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二、全面客观看待美对华贸易逆差数字

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国际贸易的业态、模式与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从货物贸易为主转向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从最终品贸易为主转向中间品贸易为主。只看货物贸易而不看服务贸易，只看贸易总额而不看贸易附加值，只从 GDP 的角度而不从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角度看国际贸易，都不能准确反映国际贸易全局。

（一）不能仅看货物贸易，还要看服务贸易

美国服务贸易总额和出口额长期位列全球第一，中国是美国第三大服务出口市场。在双边贸易中，尽管美国对华货物贸易为逆差，但服务贸易是顺差。总体来看，服务贸

易可以分为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大类。按 BEA 统计，2018 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到 405 亿美元。商业存在模式是指他国企业在本国设立机构的服务销售，2016 年美国在华商业存在顺差 468 亿美元，2018 年该顺差会更大。据此测算，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近千亿美元，这将大幅抵消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表 1）。

表 1 2018 年美国对华各类贸易逆顺差情况

2018 年	10 亿美元
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	- 323
美对华跨境服务贸易顺差	40.5
美对华商业存在顺差	46.8*
美对华实际贸易逆差	- 235.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商务部和美国商务部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 注：该数据为 2016 年数据。

（二）美对华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对整个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

经济全球化分工条件下，一国的出口包含了其他很多国家的产品，用贸易增加值方法更能反映一国真实的贸易水平。中国对美货物出口中，半数以上是加工贸易，其中大部分中间品来自于东亚地区（图 5）。比如说一台在美售价 999 美元的苹果手机，大部分零部件来自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家供应商，中国在整个制造环节中获得的价值仅 55 美元以及 3 美元的工人工钱。因此，如按照传统的贸易总值方法进行计算，中美贸易逆差被严重高估了。根据中国商务部研究数据，按照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2018 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 1827 亿美元，比传统的贸易总值方法减少约 43%（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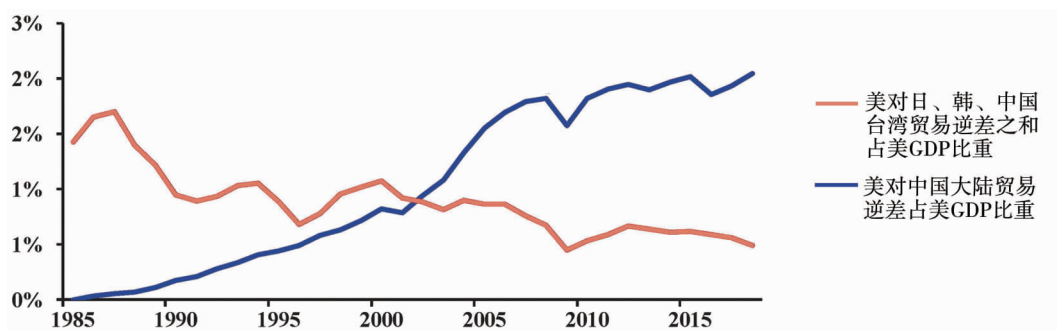


图 5 1985—2015 年美国对中国大陆贸易逆差及对日、韩、中国台湾贸易逆差之和分别占美 GDP 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Wind 资讯数据计算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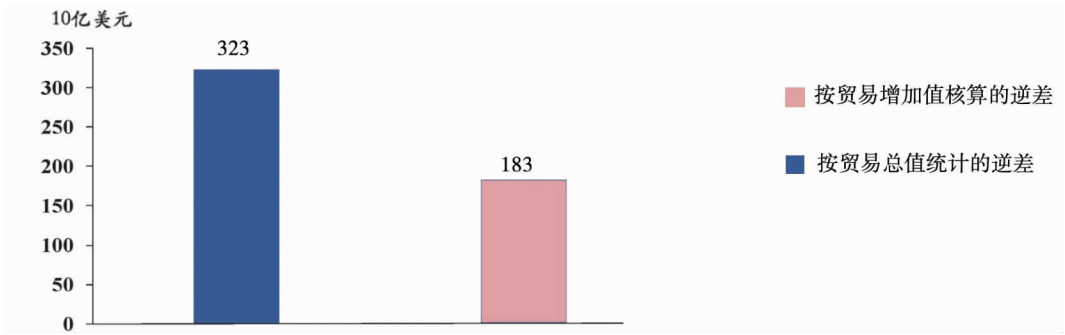


图 6 两种计算方式下 2018 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规模

资料来源：商务部《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

(三) 如果从 GNP 的角度考虑，美方贸易受益占优

当前的贸易统计方法是基于 GDP 的，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一统计方法是落后于实际的。计算中美贸易额要用 GNP 的方法，将两国企业在对方国家的经营收入也计算进来。根据 BEA 数据，2016 年美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销售货物和服务约 4000 亿美元（其中也含部分自美进口的商品和服务），这些企业如果设在美国的话，在华销售收入就是出口。加总双边跨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美国对华的贸易受益是明显占优的（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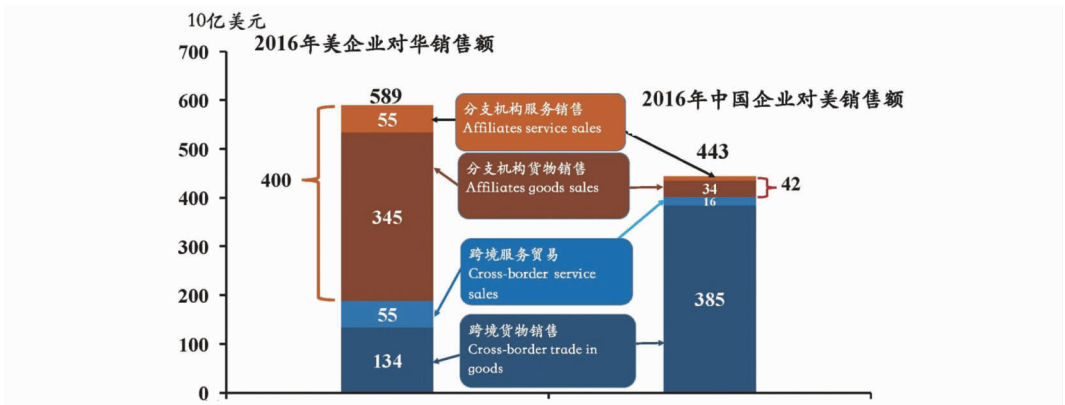


图 7 2016 年美国企业对华销售额及中国企业对美销售额

资料来源：BEA。

(四)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统计数据长期被高估

按照中美两国商务部联合开展的研究表明，美国统计的对华贸易数据长期被高估 20% 左右。高估部分主要包括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将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部分转口贸易计入中国；二是由于国际中间贸易商的存在，中国出口商的卖价和美国进口商的买价不同，双方海关统计存在差异（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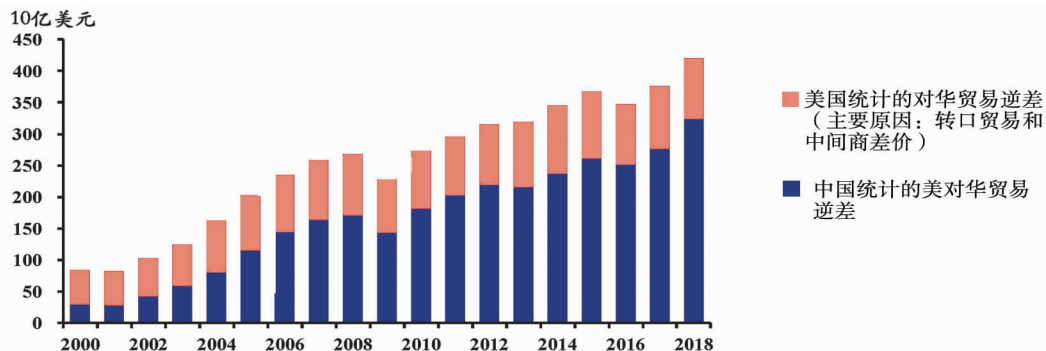


图 8 2000—2018 年美国高估的对华贸易逆差及中国统计的美对华贸易逆差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美国商务部。

三、美国在对华经贸中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多年来，美国在对华经贸往来中没有吃亏，而是在国家、企业、家庭等各部门获得了实实在在利益。

(一) 美国借助美元优势地位获得大量国际铸币税

一张百元美钞的生产成本只有几十美分，而其他国家为获取这张百元美钞则需提供价值 100 美元的实物商品和服务，这个差额即为美国获得的国际铸币税。据测算，2011 至 2018 年在美国境外流通的美元年均增加约 550 亿，截至 2018 年在美国境外流通的美元超过 1 万亿。另外，各国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总量 2019 年一季度末超过 6.7 万亿美元 (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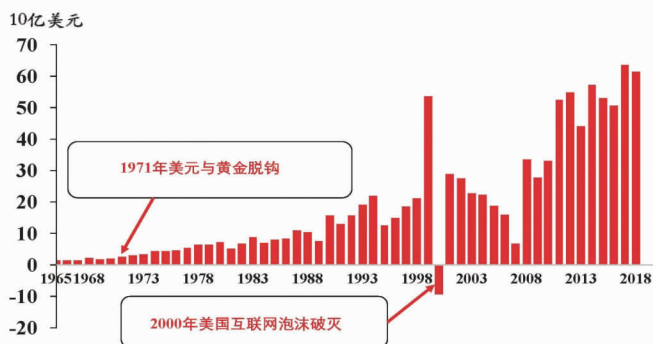


图 9 1965—2018 年美元境外流通年度增量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二) 中美贸易为美国消费者提供大量物美价廉商品

中国商品的输入降低了美国物价水平和居民生活成本，美国家庭因此能节省不少支

出。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研究显示，进口中国商品使美国家庭降低生活成本 1~1.5 个百分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等美方机构估算，对中国 2500 亿美元输美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将使美国每个家庭每年支出增加约 500 到 800 美元；若对全部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25% 关税，支出将增加至约 2000 美元（表 2）。

表 2 美国研究机构所测算的若美对华加征 25% 关税对美国每个家庭支出的影响

机构	加税规模	500 亿美元	2000 亿美元	3000 亿美元
	家庭支出			
普林斯顿大学		+ US \$ 127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 US \$ 831	
彼得森研究所			+ US \$ 550	+ US \$ 2200
全球贸易伙伴咨询公司			+ US \$ 767	+ US \$ 20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而得。

（三）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获得丰厚回报

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商品零售市场之一，通过与中国开展贸易和在中国投资，美国企业分享了发展的红利。如 2018 年，波音在中国市场营收占其全球营收的 13%，苹果公司约 20%，高通公司则超过 66%（表 3）。此外，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利润率较高。根据中国美国商会调查报告，在受访企业中，2018 年约 2/3 的美国公司在华业务的利润率大于或等于其全球业务利润率。例如，耐克公司在中国地区息税前利润率为 35.2%，高出北美和欧洲十几个百分点。

表 3 美国部分在华企业 2018 年销售收入情况

	在华销售收入（10 亿美元）	占其全球收入比重（%）
高通	15.1	67
苹果	51.9	20
波音	13.8	13
英特尔	18.8	26.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企业年报整理而得。

（四）中国为美国提供大量低价美元资本

中国多年来的贸易盈余主要通过美国国债回流美国，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低成本资金，推动了美国经济繁荣。截至 2019 年 3 月底，中国持有约 1.12 万亿美元国债，是最大

的境外持有国（表 4）。美国国债平均收益率约为 2%~3%，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平均收益率比此高出数倍。即使是以提供发展援助为主的世界银行，其美元浮动贷款利率也达到 2.8%~3.7%，而美国市场商业化利率更高，10~15 年期企业债平均收益率约为 4%，银行贷款基础利率达到 5.5%（表 5）。

表 4 2019 年 3 月全球持有美国国债的主要国家

国家	规模（10 亿美元）
中国	1120.5
日本	1078.1
英国	317.1
巴西	311.7
爱尔兰	277.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而得。

表 5 近期部分债券收益率和贷款利率情况

项目种类	收益率
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2%~3%
美国 10~15 年期企业债收益率	4%
世界银行美元浮动贷款利率	2.8%~3.7%
美国银行基础贷款利率	5.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Wind 资讯及公开资料整理而得。

当然，贸易是互惠互利的，中美贸易也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增加了就业岗位，促进了产业发展，有益于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到全球化中，同时也促进了亚洲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对于贸易逆差问题，美方需要正确认识，不能只片面强调货物贸易逆差，要全面看待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以及得失，采取的政策措施要建立在客观分析基础上，一味加征关税只会适得其反。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这次二十国集团（G20）大阪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这是一个良好的信号。希望中美双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解决各自合理关切，落实两国元首确定的原则与方向，务实进取、相向而行，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贸易协议。这不仅对两国经贸关系具有历史意义，对国际经贸合作也有示范意义。

责任编辑：谷 岳

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 实现更新与复兴

张大卫

摘要：2019 年 2 月，中央正式向社会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大湾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起，成为国家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在纲要中，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在纲要和中央最近出台的有关文件中，都明确揭示了这一区域战略所体现的国家意志。即：丰富“一国两制内涵”，保持港澳长期稳定；落实新发展理念，发展新动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助推“一带一路”建设，构筑海上丝绸之路对接融汇支撑区；带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创新绿色发展。广州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进程中，需更好地担负起国家中心城市的使命和责任。为此建议：加快推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城市更新步伐，使“老广”进一步焕发新活力；保持城市的年轻化；把广州建设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时尚中心和消费中心。

关键词：广州市 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评价

作者简介：张大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一、广州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新定位

2019 年 2 月，中央正式向社会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大湾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起，成为国家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在纲要中，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

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这些定位清晰地表达了国家制订大湾区规划的愿景，但建设大湾区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在纲要和中央最近出台的有关文件中，都明确揭示了这一区域战略所体现的国家意志。即：丰富“一国两制”内涵，保持港澳长期稳定；落实新发展理念，发展新动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助推“一带一路”建设，构筑海上丝绸之路对接融汇支撑区；带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创新绿色发展。重要意义也好，国家意志也好，我们确实应从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国两制”以及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格局上，去把握这一区域战略的深刻内涵。

表 1 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竞争力对比

指标（2017年）	东京湾区	旧金山湾区	纽约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			
				大湾区	内地9市	香港	澳门
人口（万人）	4347	473	2032	6951	6150	739	62
GDP（万亿美元）	1.82	0.48	1.74	1.51	1.12	0.34	0.05
人均GDP（万美元）	4.19	10.15	8.56	2.17	1.82	4.6	8.06
经济增速（%）	2.3	2.3	4.7	7.0	7.9	3.7	9.1
占地面积（万 km ² ）	3.68	1.79	2.15	5.6	5.47	0.11	0.003
港口集散箱吞吐量（万 TPU）	798	242	671	7809	5719	2076	13
机场旅客吞吐量（亿人次）	1.24	0.79	1.32	2.02	1.22	0.73	0.07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	5	8	2	-	18（深圳） 28（广州）	3	-
全球创新指数排名	13	6	6	17（中国）	-	14	-
世界100强大学数量	2	2	3	4	0	4	0
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	39	28	26	19	11	8	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有关统计资料编绘。

对此，笔者理解有以下几点：一是促进创新、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区域优势资源整合，激发市场活力，率先构筑现代化经济体系，培育带动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二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全面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国际性开放新高地，代表国家参与世界城市群竞争。三是加快“一国两制”框架下区域间制度磨合与融合，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区域示范样板。四是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和产业变革，满足人

民群众高品质生活对消费福利、人才、环境、生态及其他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需要。

纲要在对粤港澳大湾区进行整体定位的同时，为强调发挥优势、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和错位发展，也概略地明确了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的战略定位。广州是大湾区 4 个中心城市之一。纲要对广州市的定位主要有：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国际大都市。对比 21 世纪以来历次修编后国务院批准的规划，可以看到有关广州市的定位在不断“升舱”。

2001—2011年规划 (2005年)	2011—2020年规划 (2016年)	2017—2035年规划 (2018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广东省省会； ▶华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广东省省会；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 ▶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广东省省会； ▶国家重要中心城市； ▶历史文化名城； ▶国际综合交通枢纽； ▶商贸中心、交往中心、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引领型全球城市。

表 2 大湾区规划及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对比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广州定位	深圳定位	香港定位	澳门定位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2.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4. 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 5. 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 2. 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 3. 科技文化教育中心； 4. 国际大都市。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 2. 国际创新型城市； 3. 现代化国际化城市； 4.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之都。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 2. 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及风险管理中心； 3. 亚太区国际法律争议解决中心； 4. 国际大都会。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2. 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服务平台； 3. 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纲要》整理编绘。

与纲要中其他中心城市的定位相比，广州的优势在于明确为“国家中心城市”；香港的优势在于明确为“国际大都会”和国际金融中心（离岸业务枢纽、资金管理及风险管理）、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航运中心、航空枢纽等功能性定位；深圳的优势体现在“国家创新城市”“现代化国际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之都”等特定功能上。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仅凭广深港澳四市的定位都不能单独担当起实现大湾区战略

目标的历史使命。完成这一使命，必须靠四市协同、融合发力。国际经验表明，过多的关税区、特区会造成城市间的经济隔离，形成中心城市孤立发展的状况。因而四市间要综合运用竞争与合作两种机制，使竞争成为合作的动力，用政府间、企业和公众广泛参与的合作来解决区域结构性矛盾。而广州，则应紧扣“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抓住战略机遇，扬长补短，找准新时代发展路径。

二、广州市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历史性思考

城市的存在不是孤立的。所谓中心城市来自于其在城市体系中的位置。中国的城市体系有一个历史发育的过程。

第一，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城市的肇始期。由于政治上主要实行“分封制”，城市一般在空间上是割裂和封闭的。其往往是不同层级的政治中心，不具备自下而上的纵向联系和由此及彼的横向联系。

第二，自秦王朝实行郡县制后，国家破除了分封领地制度。但因受小农经济社会形态的局限，大行政区内城市间是政治统辖的相属关系，相互间自发、平等的经济联系较弱。

第三，明代以后，随着中国商贸活动逐渐活跃和商业经济地位的提升，工商业城镇大量涌现。受政治和经济两种力量的交叉作用，城市空间体系开始复杂化，出现了如美国学者所说的行政隶属和经济联系这两套体系。但一般讲，处于官衙所在地的城市以及由其所统辖的城市间，既存在行政隶属关系，也保持较密切的经济联系。管理较大区域的衙署所在地城市，往往具有行政和经济两套体系的“中心”功能。

第四，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源在更大的地理空间配置，由行政中心统辖区内经济活动的城市体系发生了变化。城市特有的功能、与腹地间的联系、经济实力、交通的便利性、在全球供应链上的位置等，都会成为重要因素，使行政隶属的概念逐步弱化，而由市场分工形成的经济联系则日益紧密。一些成为经济中心的城市地位可能会超过行政中心。如美国的纽约与华盛顿，中国的青岛与济南、大连与沈阳、厦门与福州等。

广州自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秦将任嚣平定岭南后建城，即成为华南区域的中心城市。这里“介于岭海间，北负雄、韶，足以临吴、楚；东肩潮、惠，可以制瓯、闽；西固高、廉，扼交、邕之噤吭；南环琼岛，控黎夷之门户”。古人所言，讲的是广州所具有的区位优势 and 方輿上的军事控制能力。而它“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海、野、河、城层次渐进，底蕴丰厚；塔、楼、阁、台遥相呼应，各有含义，为岭南城市之表

率”，讲的则是广州文化底蕴深厚、城市特色鲜明和传统人居智慧在城建上的反映。

进入近现代社会，实施门户开放政策，使广州成为中国最先接触现代文明和开启国际贸易的城市，也是最早引领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代的城市。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广州又因其地近港澳和文化多元性的优势，开风气之先，引领了中国的改革与开放、繁荣与发展。其华南地区中心城市地位是唯一的、不容置疑的。如今，在大湾区的规划中，中国的华南地区出现了广、深、港、澳四个中心城市，其“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的特殊性，在世界城市群中是仅有的。对广州来讲，特别有意味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当年的小渔村深圳迅速崛起，成为可与广州比肩的中心城市。对正在发生的变化，广州应客观分析、正确应对。

三、如何看待广州与深圳的增长和发展问题

改革开放 40 年，深圳发生了沧海桑田之变。近年来，其又紧紧抓住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一重大机遇，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深圳经济发展再次提质加速。2017 年，广州生产总值（GDP）被深圳超越；2018 年两市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表 3 2017 年广州、深圳基本情况

2017 年	GDP 总量 (亿元)	人均 GDP (元)	三次产业比重	常住 人口 (万人)	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 (%)	户籍 人口 (万人)	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 (%)	市辖区 面积(平 方公里)
广州	22859.35	155491	0.98 : 27.27 : 71.75	1490.44	86.38	927.69	79.78	7434.4
深圳	24221.98	189568	0.4 : 41.1 : 58.8	1302.66	100	454.70	34.9	1997.47

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省统计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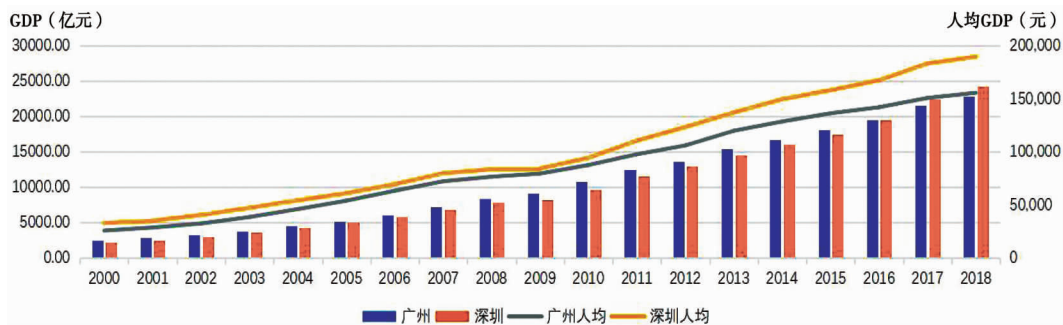


图 1 2000—2018 年广州、深圳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省统计资料编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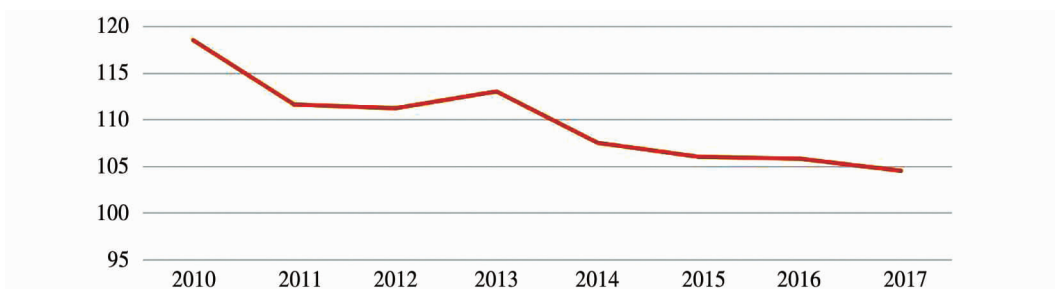


图 2 2000—2017 年广州工业总产值指数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2018 广州统计年鉴》计算编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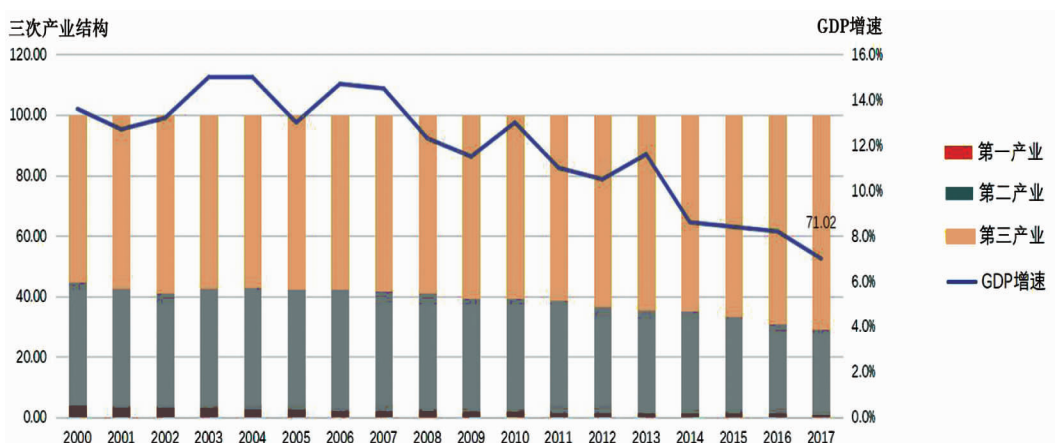


图 3 2000—2017 年广州三次产业结构与 GDP 增速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2018 广州统计年鉴》计算编绘。

深圳的奇迹具有不可复制性。广州经济总量被深圳超越也有其深刻原因和内在规律。认真分析起来，两市不同的经济结构和要素禀赋特征是关键。一是广州产业结构正处于调整期。做为老工业基地，工业经济中传统制造业比重较大。近年来，广州工业新旧动能转换加快，速度、效益、质量、投资等指标也表现不俗。但 2018 年，35 个工业行业大类中，仍有 12 个行业出现负增长。广州全年工业增加值增长 5.5%，而同期深圳工业增加值增长 9.5%，比广州快了 4 个百分点。二是广州作为省会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好，规模大。2018 年广州第三产业增长 6.6%，比重达到 71.75%，比 2017 年增加 0.73 个百分点；深圳的增速为 6.4%，比重达 58.8%，均弱于广州。服务业增速加快和比重提高，是经济结构优化的结果，但在一般情况下，服务业效率往往低于工业部门的效率，这也会影响 GDP 的增速。

广深两市相比较，从创新动力、企业活力上看，深圳具有较强的产业发展后劲：一

是形成了庞大的高端制造业产业集群。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前十大行业依次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其中，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占全国产量的 98.15%，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占全国产量的 17.16%，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的 14.41%。二是上市公司数量大、市值高。

表 4 2018 年深圳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
移动通信基站设备	万信道	42427.60	63.5
新能源汽车	万辆	9.99	191.1
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机	万部	541.85	33.2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	万台	30870.73	-15.3
民用无人机	万架	294.50	4.4
工业机器人	套	21283.00	34.0
电视接收机顶盒	万台	9861.67	-0.9
半导体分立器件	亿只	98.88	-30.9
集成电路	亿块	255.11	8.0
液晶显示屏	亿片	11.08	-11.6
电子元件	亿只	1591.17	7.7
光纤	万千米	1240.71	12.8
服务器	万台	89.19	35.5
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	千瓦	239361.49	33.6
石墨及碳素制品	吨	12095.63	-31.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深圳市统计资料编绘。

表 5 2018 年底主要城市上市公司统计情况简表

单位：家，亿元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天津	重庆
数量	319	319	101	303	53	52
市值	145807.7	44366.91	12284.24	54458.31	4511.002	5031.50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编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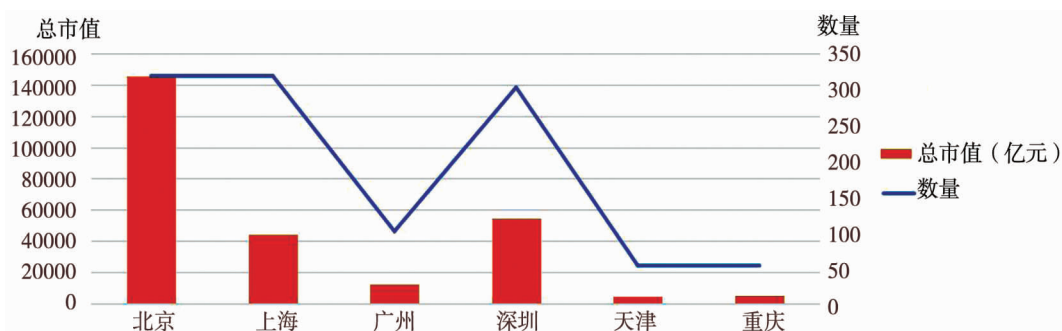


图 4 2018 年底主要城市上市公司总市值和上市公司数量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深圳发展的态势令人鼓舞，但广州长期作为中心城市，其已形成的优势和充沛的发展后劲不能低估。

第一，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广州市域总面积达 7434.4 平方公里，而深圳仅有 1997.47 平方公里，广州是深圳的 3.72 倍；广州建成区面积达 1294 平方公里，深圳建成区面积为 973 平方公里。广州未建成区面积即潜在发展空间面积是深圳的 5.9 倍。

表 6 六城市面积及 GDP 情况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天津	重庆
面积 (平方公里)	16410	6340	7434	1997.47	11946	82402
建成区面积 (平方公里)	1485	1426	1294	973	913	1379
GDP (万亿)	30320	32679.87	22859.35	24221.98	18809.64	20363.19
GDP/单位平方公里	1.847654	5.154554	3.074973	12.12633	1.574555	0.24712
GDP/建成区单位平方公里	20.41751	22.91716	17.66565	24.89412	20.60202	14.76664

资料来源：《2017 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第二，经济结构相对均衡。广州的产业体系健全，更具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工业部门的汽车制造业、电子产品制造业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速度加快，基础性产业增长后劲充足。广州是千年商都，商业文化发达，商业场景众多，商业资本和产业结合更为紧密。2018 年，广州批发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是深圳的 2.36 倍；快递业务量增长 28.8%，突破 50 亿件，持续保持全国第一的位次。广州服务业比重高，增长后劲强。而深圳产业体系的对外依存度高达 123.79%，为减少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满足国内消费和产业升级的需要，下一步围绕内需市场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很重。

表 7 2018 年广州、深圳对外依存度表

	GPD	进口	出口	进出口 差额	进出口 总额	对美 出口	对香港 出口	外贸依存 度 (%)
广州	22859.35	4202.57	5607.58	1405.01	9810.15	821.49	808.72	42.92
深圳	24221.98	13709.05	16274.69	2565.64	29983.74	2383.94	6758.33	123.79

数据来源：《2018 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深圳市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第三，公共服务能力强。广州聚集了服务于华南乃至全国的优质医疗、教育、科技和文化资源，这种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公共服务能力是广州最值得称道的软实力。

表 8 2018 年广州、深圳医疗卫生机构情况对比表

	医院	三甲医院	全部床位 (万张)	医院床位 (万张)	每千人 床位	卫生技术人 员 (万人)	每千人卫生 技术人员
广州	255	57	9.51	8.60	5.77	15.65	10.50
深圳	139	18	4.76	4.36	3.35	9.37	7.19

数据来源：《2018 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深圳市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一是医疗卫生。在中国大陆地区《2018 顶级医院 100 强》中，广州有 11 家医院入围，次于北京 16 家、上海 13 家，排名第三。深圳仅有 1 家医院入围。

二是教育。广州的高素质人才培养能力雄视华南，其 2018 年本专科招生、在校生、毕业生数量均是深圳的 10 倍以上。而其研究生招生、在校生和毕业生数量也是深圳的 5 倍以上。

表 9 2018 年广州、深圳教育情况对比

单位：万人

	本专科招生	在校生	毕业生	研究生招生	在校研究生	毕业研究生
广州	32.36	108.64	29.04	3.74	10.11	2.54
深圳	2.71	8.82	2.31	0.65	1.76	0.49

数据来源：《2018 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深圳市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是文化。广州从秦始皇时代筑番禺城至今已有 2233 年的历史。中原文化与南越各民族文化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岭南—广府文化。广州面朝大海、背靠中华腹地，历史上在传承传播中华文化、文明的同时，也是接驳转化外来文化、文明的窗口。广州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唐宋时代就有阿拉伯商人在此开展贸易活动，在将中华文明推荐到欧洲的同时也带来了印度、中亚、欧洲和阿拉伯地区的宗教与文化。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广州又是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最先产生碰撞的地方，在输入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同时，无数中国的拓荒者也从这里走向东南亚和欧美国家。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构筑了广州地域文化的特色和底蕴，使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全球影响力。广州已成为世界上东西方文明、文化成功相互交融的典范之区。

四是科技。广州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暨南大学等著名高校和中科院广州分院等众多国家一流科研机构，科技人才荟萃，科研设施完善，基础科学研究优势强，可以成为科学思想、科学发明的策源地。深圳是“东方硅谷”，其优势在于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活动，更有利于推动面向市场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化。两城之间有良好的互补关系。从专利来看。广州专利申请量、发明专利、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授权量虽仍与深圳有差距，但2018年普遍有了快于深圳的增长。从科研机构来看。广州拥有的国家、省级高端科研平台数量远多于深圳。

表 10 广州、深圳专利申请情况比较

	申请量 (万件)	增速 (%)	专利授权 量 (万件)	增速 (%)	发明专利 (万件)	增速 (%)	发明专利授 权 (万件)	增速 (%)
广州	17.31	46.3	8.98	49.2	5.02	35.8	1.08	15.5
深圳	22.86	29.1	14.02	48.8	7.00	16.1	2.13	12.6

数据来源：《2018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深圳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 11 广州、深圳国家及省市级高端科研平台

单位：个

	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	国家重点 实验室	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省级重点 实验室	市级重点 实验室
广州	18	27	20	956	233	165
深圳	7	26	14	218	24	238

数据来源：《2018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深圳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深圳统计年鉴2018》。

注：广州是2018年的数据，深圳是2017年的数据。

五是人口结构比较协调。2018年，广州1490.44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达927.69万人，占62.2%；深圳1302.66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达454.7万人，仅占34.9%。较

为良好的人口稳定性，既是好的公共政策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改善人口结构的前提。最重要的是它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另外，从常住人口年龄结构看（如表 12）。在 9 个国家中心城市中，广州 0~14 岁人口占比为 17.2%，仅低于郑州的 19.3%，居第二位，甚至高于深圳；65 岁以上人口占 8.6%，为倒数第一位。这说明广州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仍是一座“年轻”的城市，而且外来人口落户率高，劳动后备人口资源充足。这些体现“人口红利”的数据，都说明广州是一座成长性强和创新潜力巨大的城市。

表 12 2017 年底国家中心城市和深、港、澳、杭等城市常住人口年龄结构

地区	常住人口（万人）				比重（%）		
	总数	0~14 岁	15~64 岁	65 岁及以上	0~14 岁	15~64 岁	65 岁及以上
北京市	2170.7	225.8	1706.2	238.8	10.4	78.6	11.0
上海市	2418	240.5	1832.7	344.8	9.9	75.8	14.3
天津市	1557	175.8	1205.5	175.7	11.3	77.4	11.3
重庆市	3075	504.1	2131.8	439.1	16.4	69.3	14.3
郑州市	988	190.7	694.6	102.7	19.3	70.3	10.4
武汉市	854	116.0	621.1	116.8	13.6	72.7	13.7
西安市	883	120.4	664.0	98.6	13.6	75.2	11.2
成都市	1604	253.9	1126.7	223.4	15.8	70.2	13.9
广州市	1450	249.5	1075.5	125.0	17.2	74.2	8.6
深圳市	1252.8	210.9	944.9	97.1	16.8	75.4	7.7
杭州市	946.8	115.2	713.4	118.2	12.2	75.3	12.5
香港	739.2	84.9	533.8	120.5	11.5	72.2	16.3
澳门	64.8	8.6	49.9	6.3	13.3	76.9	9.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2017 年人口抽样调查汇总数据编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广州的基础是雄厚的，所具有的优势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替代的。它在综合交通、文化、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所具有的强大公共服务能力，华南地区的其他城市还难以比肩。特别是，广州是广深港澳四市中唯一拥有广阔经济腹地和多层级城市体系的中心城市，在竞争与合作中，可以通过大都市圈规划来不断拓展自己发展的经济空间。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大可不必仅以 GDP 等个别指标上的一时被超越而生杞人之忧。

四、对广州的几点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既是自然地理的概念，也是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的概念。

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它有着背靠大陆腹地、面向西太平洋的良好区位，具有在蓝色港湾和珠江三角洲区域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良好自然禀赋。

从经济地理角度看：其位于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和“一带一路”的交汇之地，是我国对外开放与交流合作的战略枢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它已形成特有的制度、体制、机制和市场融合优势，已成为带动国家创新发展的引擎和辐射东亚、南亚、东南亚发展的经济支撑带。

从文化地理角度看：这一区域由于传统文化与工业文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的长期交融与碰撞，形成了积淀深厚、韵味悠长、包容互鉴、历久弥新的特定文化生态。它的发展、融合与传播，寄托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理想，有着很强的空间张力。

从政治地理角度看：它承担着经略南海、友邻东南亚区域、消解地缘政治冲突、维持长期繁荣稳定、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国家愿景和历史使命，是我国在全球化条件下将国家战略与参与全球治理实现互动的引领性平台。

大湾区的新使命是通过竞合、融合，充分发挥区域的要素优势、开放优势和文化优势，促进制度创新，深度和世界规则与标准对接，形成率先突破的能力，带领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伟大复兴。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国家赋予中心城市的任务主要有三：国家战略要津；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辐射带动大区域发展。为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进程中，更好地担负起国家中心城市的使命和责任，有建议如下。

第一，加快推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是加强与港澳的经济、文化联系，把握好与其开展制度层面合作的机会，充分利用港澳在体制、机制和营商环境方面的优势，主动对接国际规则、国际标准，以开阔的视野推动改革和制度创新，打造好外向型经济新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创新版、升级版，先行先试，为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示范。二是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重塑全球创新版图、全球经济结构、全球供应链时产生的历史机遇，提升创新资源管理能力，促进新动能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牵手港澳深，整合区域创新、金融、商务中介、自由贸易、综合交通等要素和产业优势，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全球产业引领能力和价值链管理能力。三是打造以企业为主导和主体的创新平台，注重模式创新，发展以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平台经济，促进经济组织和产业生态由线形结构、网状结构向矩阵型结构转变，把生产、交易、消费过程转化为跨区域和跨社群的价值创造、文

化认同、资源共享、市场互动过程，使这些高度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平台，成为广州互联网时代新生产关系的枢纽。四是实现国家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和社会创新体系高效对接，搭建对接和相互转换的平台，减少国家创新战略、产业创新意愿及社会与市场创新能量之间的摩擦，提升创新效率，降低创新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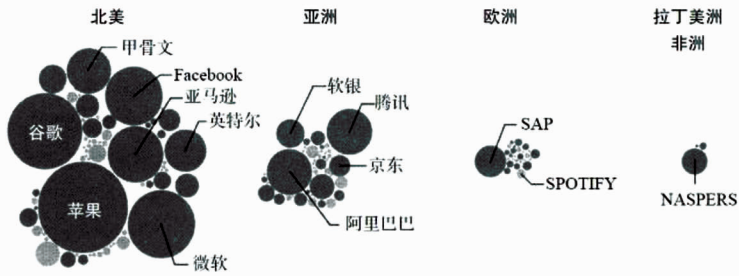


图 5 世界主要区域平台经济示意图

资料来源：[美] 杰奥夫雷 G·帕克、马歇尔 W·范·埃尔斯泰恩、桑基特·保罗·邱达利著，志鹏译，《平台革命：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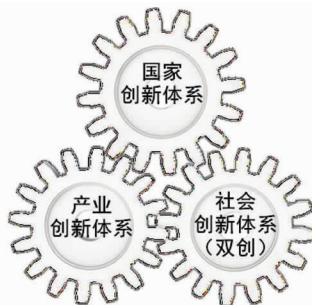


图 6 国家、产业、社会创新体系对接和相互转换平台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第二，加快城市更新步伐，使“老广”进一步焕发新活力。一是对城市进行智能化、低碳化、宜居化改造，加强对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市政、智慧管理的总体设计和统筹，避免城市智能化更新的过程被碎片化和概念化，为市民创造全龄化便利、舒适、宜业、宜居环境。二是加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和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形成强大的分拨、集疏、转运功能，发展枢纽经济。三是促进城市产业升级，把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作为城市主要业态。根据广州的优势和特点，突出工业互联网、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新能源、空间和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的产业化。将一般制造业向周边转移，在合理空间内形成科学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同时注重城市和产业对服务业生态的需要，形成合理的就业结构。四是顺应技术进步对人工的替代和就业机会由制造业更多地转向服务业的趋势性变化，推动工作性质变革。加大政府、社会对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的投资，

促进城市就业人口技能和职业素养提升，增加居民主动选择就业的机会。引导企业加强员工在职培训，使员工能适应技术进步和业态变化对岗位的新技能要求，支撑企业保持可持续的创新能力。

第三，保持城市的年轻化。一是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特别是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就业的新业态、新模式，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创新创业创造空间和就业机会。二是继续提升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缩小常住人口与总人口的剪刀差。将流动性就业人口更多地转化为新市民，使其子女成为能融入当地文化与生活环境，能接受本地化教育和能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广二代”“广三代”。发掘人力资源潜力，保持后备人力资源的充足与活力。三是破除限制人才流入和人口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在就业、住房、购房、购车、进城等政策上实行开明、开放、宽松的政策，实施包容审慎的管理，吸引国内外更多的人才和普通居民来广创业、就业、生活、消费。

第四，把广州建设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时尚中心和消费中心。一是煲好广州“岭南文化”“广府文化”这锅“老汤”，不断提鲜提纯，并在传承和传播、创新和弘扬上下功夫。保持文化的多元性特征，深化与港澳台文化、南洋文化的融合互动，加强与域外文化、文明的交流互鉴及接驳转换，打造世界多元文化、文明和谐共存共生的样板城市。用广州文化环境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打破“文明冲突”论的魔咒，促进形成交流与互鉴才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和文化进步主流的共识。二是进一步提升广州的消费中心地位，促进与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合作，强化发展自由贸易理念，适时植入其在关税等方面的贸易制度，推动政府监管体系和制度创新，发展新贸易方式和新贸易业态。提升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使其为大湾区及广义的华南地区，提供优质和便利可及的医疗、教育、养老、托幼、科技、文化、旅游等消费服务，提升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软实力和影响力。三是发挥广州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注重消费升级带来的消费情感、消费心理的需求变化，支持个性化设计、私人定制、消费体验、文化空间、消费社区和“夜经济”发展，促进创意、时装、服饰、美妆、美食、戏剧、古典与流行音乐、茶楼文化、酒吧文化、健康养生、休闲旅游、社交沙龙、流行数码产品等业态的繁荣，为居民更多地提供创造、消费的选择机会与选择场景，使广州真正成为“低商务成本、高品质生活”，领导消费新潮流的时尚之都、魅力之都。

责任编辑：谷 岳

· 宏观经济 ·

2019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 运行情况分析与下半年展望

胡晨沛 王 军

摘要：2019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表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速继续稳定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民生事业持续改善，高质量发展特征更加明显。但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趋复杂，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展望下半年，经济平稳运行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外部中美经贸摩擦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内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仍较为突出，宏观经济政策应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效落实“六稳”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关键词：经济运行 外部环境 下行压力 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胡晨沛，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统计师；
王 军，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管理中心三级职员。

2019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从生产角度看，产业结构继续优化，但多数行业增长放缓；从需求结构看，消费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从民生角度看，就业市场总体稳定、价格上涨幅度适中、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从外部环境看，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持续蔓延加剧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有所加大。展望下半年，外部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中国经济将继续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

一、从生产角度看

（一）经济增速略有回落，但继续处于合理区间

初步核算，201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450933亿元（约合6.65万亿美元），超过2018年日本全年GDP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3%，经济增速与用电、货运等实物量指标相匹配。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虽然二季度增速是自1992年我国采用目前的GDP核算方法以来的最低增速，但是在世界经济同步下行的情况下，经济的增长速度尽管略有放缓，仍然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从全球主要经济体看，越南（6.7%）、新加坡（0.1%）等经济体增速同样出现不同程度下滑。总体来看，上半年6.3%的增速为全年实现6.0%~6.5%的增长目标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拉动作用继续提高

2019年上半年，三大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不断优化，夏粮再获丰收；工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高新制造业占比提高；服务业的贡献继续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从增速上看，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0%、5.8%和7.0%，其中第一、三产业增速比2018年全年分别回落0.5和0.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持平。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第一、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6%、37.1%和60.3%，其中第三产业贡献率在2018年全年59.7%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三）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多数行业增加值增速回落

从行业增速看，多数行业增加值增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回落（表1）。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增速比2018年全年回落0.2个百分点；在第三产业中，除了金融业增加值增速较2018年全年有所加快外，其余行业增加值增速均有所下滑，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由30.7%下滑至20.6%，下滑幅度最大；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下滑幅度均在1个百分点以上，房地产增加值增速的下滑主要受到商品房面积下降的影响，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7578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8%，2018年全年销售面积为增长1.3%。

二、从需求角度看

（一）零售额增速企稳回升，减税政策效果显著

2019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5210亿元，同比增长8.4%，增速比

表 1 国内生产总值及各行业增加值增速

单位:%

	2019 年			2018 年		
	上半年	二季度	一季度	全年	四季度	三季度
GDP	6.3	6.2	6.4	6.6	6.4	6.5
第一产业	3.0	3.3	2.7	3.5	3.5	3.6
第二产业	5.8	5.6	6.1	5.8	5.8	5.3
第三产业	7.0	7.0	7.0	7.6	7.4	7.9
农林牧渔业	3.2	3.4	2.9	3.6	3.7	3.8
工业	5.8	5.6	6.1	6.1	5.7	5.9
建筑业	5.5	5.1	6.2	4.5	6.1	2.5
批发和零售业	5.9	6.0	5.8	6.2	5.5	6.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3	7.3	7.3	8.1	8.7	8.0
住宿和餐饮业	6.2	6.4	6.0	6.5	5.8	6.3
金融业	7.3	7.6	7.0	4.4	6.3	4.0
房地产业	2.5	2.4	2.5	3.8	2.0	4.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0.6	20.1	21.2	30.7	29.1	32.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8	7.3	8.3	8.9	7.3	9.0
其他服务业	5.4	5.5	5.2	6.3	6.4	6.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8 年全年回落 0.6 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60.1%。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增速来看，各个月份之间增速波动较大，4 月份增长 7.2%，增速为近 16 年以来的新低，6 月份增速回升至 9.8%，最高增速和最低增速之间相差 2.6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市场销售稳中有升，主要来自于大规模减税降费的政策红利，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0.9%，其中 5、6 月份税收降幅都在 6% 以上，减税政策红利除了直接降低居民税负外（上半年全国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 30.6%），还将通过给企业减税的方式间接让利于居民，成为支撑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10330 元，同比增长 7.5%，与 8.4% 的零售额增速较为接近。

（二）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领域投资呈分化走势

2019 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99100 亿元，同比增长 5.8%，增速比 2018 年全年小幅回落 0.1 个百分点，各月投资增速均保持在 6% 左右，增长较为平稳，

资本形成总额对 GDP 增长贡献率为 19.2%。从三大投资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4.1%，增速比 2018 年全年加快 0.3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长 3.0%，回落 6.5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10.9%，加快 1.4 个百分点（图 1）。从投资内部结构看，投资三大支柱的结构变化显现出经济存在一定下行隐患：第一，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增速大幅下滑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投资增速在上半年出现同步回落，显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2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一度降至 49.2 的近三年新低；第二，上半年共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21765 亿元，占到年初“两会”期间确定的全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 70.7%，在上半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进度明显前置的情况下，基建投资增速并未出现显著回升；第三，在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的情况下，房地产投资成为支撑上半年投资的主要因素，但从部分房地产行业先行指标看，未来房地产投资的较高增速可持续性存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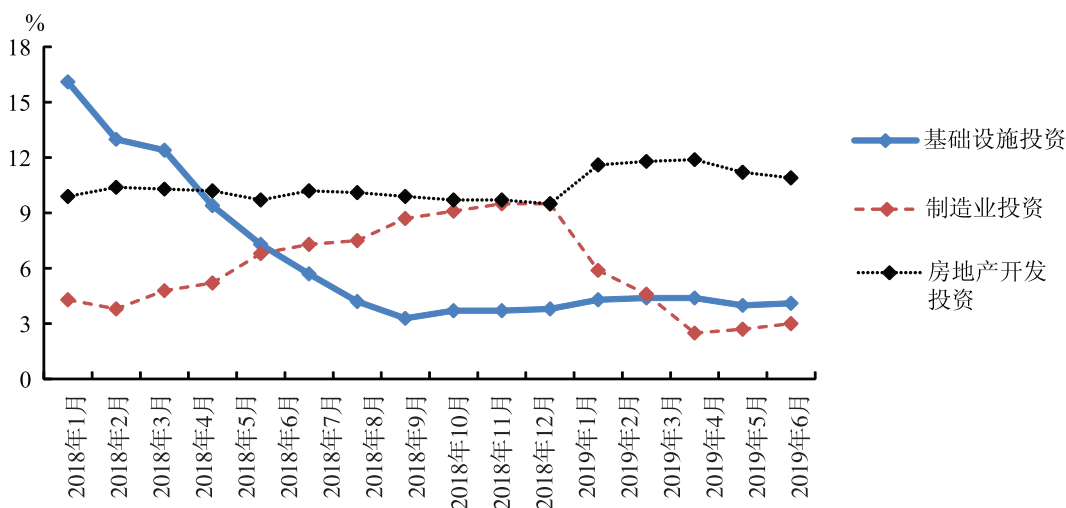


图 1 2018 年 1 月—2019 年 6 月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开发投资月度累计名义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外贸形势依然严峻，下行压力继续加大

2019 年上半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20.7%，而 2018 年全年这一贡献率为 -8.6%，但具体分析净出口增速来看，净出口对经济增速贡献率的大幅提高主要是由于进口额增速的大幅回落。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146675 亿元，同比增长 3.9%，增速比 2018 年全年回落 5.8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79521 亿元，增长 6.1%，回落 1.0 个百分点；进口 67155 亿元，增长 1.4%，回落 11.5 个百分点，进口额增速的大幅下滑使贸易顺差规模扩大至 12366 亿元，提高了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果进一步考虑上半年人民币贬值因素的影响，2019 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下行压力在 2018 年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大，以

美元计，1—6 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 0.1%，大幅低于 2018 年全年 9.9% 增速；进口额下降 4.3%，2018 年全年则为增长 15.8%。从上半年数据来看，中美经贸摩擦对双边贸易关系的影响已经基本显现，1—6 月份我国对美国进出口 2583.3 亿美元，同比下降 14.2%，其中对美出口 1994.0 亿美元，下降 8.1%；自美进口 589.2 亿美元，下降 29.9%。

三、从民生角度看经济运行

（一）就业市场总体稳定，全年目标有望超预期完成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100 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 5.5% 左右”的目标，稳就业作为“六稳”之首，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1—6 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737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67%；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位于 5.0%~5.3% 之间，保持合理区间。尤其是进入二季度，整体经济活动进入旺季，用工需求增加，就业形势持续向好，失业率继续下降，4、5 月份失业率均为 5.0%，6 月份失业率略升至 5.1%。

（二）居民消费价格涨势温和，工业生产者价格基本稳定

2019 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2%，涨幅比 2018 年全年扩大 0.1 个百分点，5、6 月份涨幅均达到 2.7%（图 2）。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由 2018 年全年上涨 1.9% 转为上涨 3.9%，特别是食品价格由上涨 1.8% 转为上涨 4.7%；受春节后多地阴雨天气、鲜菜上市量不足的影响，鲜菜价格由上涨 7.1% 转为上涨 9.2%；受非洲猪瘟疫情和周期性因素叠加影响，猪肉价格由下降 8.1% 转为上涨 7.7%；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影响，汽油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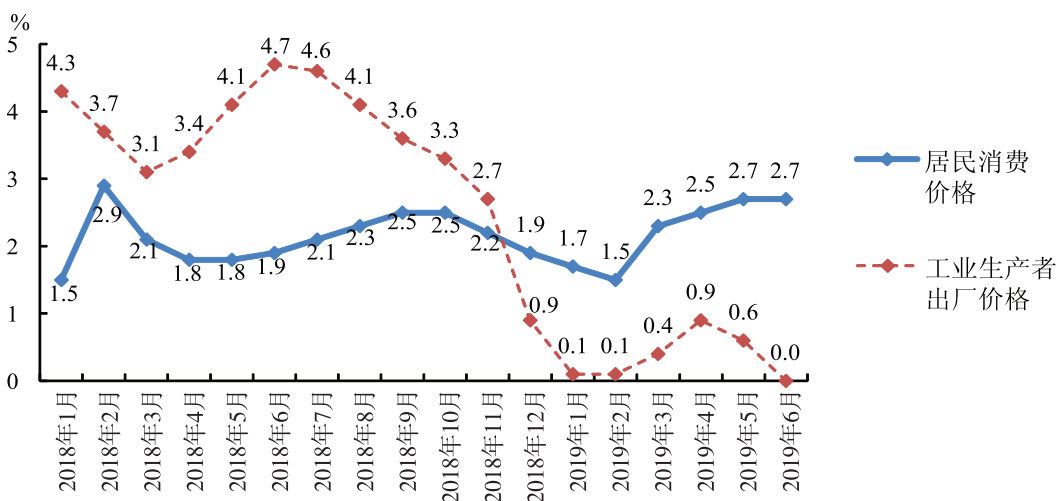


图 2 2018 年 1 月—2019 年 6 月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月度同比涨跌幅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柴油价格由分别上涨 12.9% 和 14.3% 转为分别下降 2.4% 和 2.2%；受部分地区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已阶段性完成的影响，医疗服务价格涨幅由 4.3% 回落至 1.5%。

2019 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0.3%，涨幅比 2018 年全年回落 3.2 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0.2%，回落 4.4 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7%，扩大 0.2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0.1%，涨幅比 2018 年全年回落 4.0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的九大类价格六涨三降，其中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价格涨幅最高，达到 5.1%。

（三）居民收入增速快于 GDP 增速，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根据住户调查资料，2019 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294 元，比 2018 年同期名义增长 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5%，增速略高于 GDP 增速，与 2018 年全年 6.5% 的增速持平。分城乡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342 元，实际增长 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778 元，增长 6.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 2.74，比 2018 年同期缩小 0.03（图 3）。分地区看，上海、北京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3 万元，分别达到 35294 元和 33860 元，浙江、天津、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过 2 万元。分收入来源看，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8793 元，名义增长 8.7%；经营净收入 2467 元，增长 8.9%；财产净收入 1321 元，增长 13.2%；转移净收入 2715 元，增长 6.8%。工资性收入实现快速增长主要是各地陆续落实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基本工资标准调整政策，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产业扶贫带动农村本地就业，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和月收入实现同步增长；经营净收入增长主要是个体经营户和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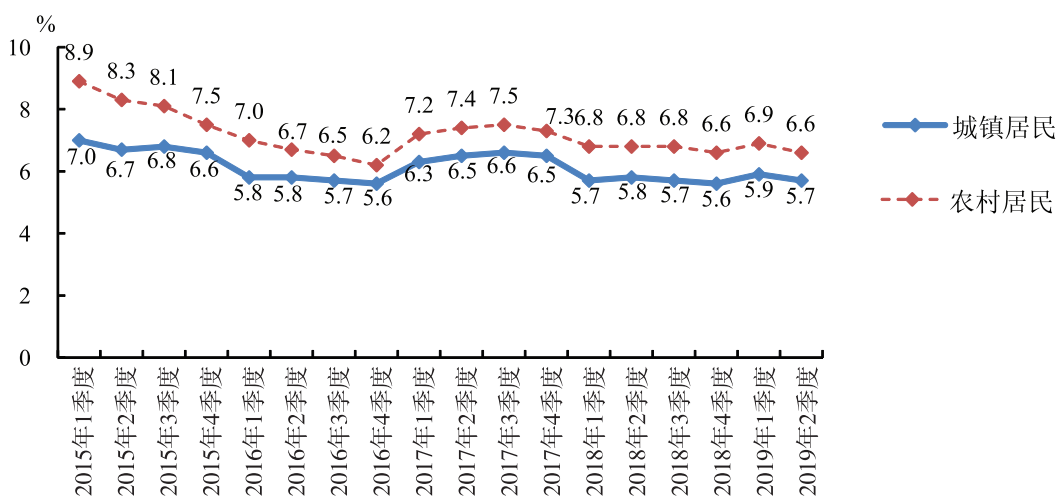


图 3 2015 年 1 季度—2019 年 2 季度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季度累计实际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微企业受惠于减税降费相关政策，经营情况得到改善；财产净收入增长主要是部分地区房租价格上涨，带动财产净收入较快增长；转移性收入主要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税率结构优化及增加专项附加扣除等一系列惠民举措，有效降低居民税收负担、提高居民获得感。

四、从高质量发展看经济运行

（一）高新产业保持较快增速

2019 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0%，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3.0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13.8%，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11.6%，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 10.5%，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5.6 和 4.5 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3.5%，增速高出全部服务业投资 6.1 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875.6 亿元，同比增长 71.1%，其中信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分别增长 68.1%、77.7%和 62.7%。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

在去产能方面，2019 年上半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6.4%，比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比 2013 年以来的平均值高 1 个百分点；在去库存方面，6 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 50162 万平方米，比 2018 年同期下降 8.9%；在去杠杆方面，5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6.8%，同比下降 0.6 个百分点；在降成本方面，上半年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 5.3%，增速比 2018 年全年回落 4.7 个百分点，个人所得税下降 30.6%；在补短板方面，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教育等短板领域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48.0%和 18.9%，分别比全部投资快 42.2 和 13.1 个百分点。

（三）三大攻坚战持续推进

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面，2019 年 6 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205477 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在精准脱贫方面，上半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在污染防治方面，上半年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2.7%，全国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0.1%，同比上升 0.4 个百分点。

五、从外部环境看经济运行

（一）全球贸易投资争端加剧，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

2019 年上半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全球范围内的跨境投资和对外贸易

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贸发会议于 2019 年 3 月发布的《国际投资协定监测报告》显示，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2 月，全球共有 35 个国家制定了 42 项国际投资协定，其中 34% 为限制或管制协定，占比为 2003 年以来最高。世界贸易组织于 6 月份发布的《贸易监测报告》显示，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5 月期间，G20 经济体实施了 20 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包括加征关税、实施进口禁令以及新的出口海关程序等，这些新贸易限制措施的规模创下历史第 2 高，是该统计自 2012 年 5 月实施以来平均值的 3.5 倍以上，涉及总值 3359 亿美元的货物贸易。在全球贸易摩擦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国际组织于近期大幅下调全球贸易增速：2019 年 6 月，世界银行将 2019 年世界贸易量增速下调 1.0 个百分点至 2.6%；2019 年 7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 2019 年世界贸易量增速下调 0.9 个百分点至 2.5%。

（二）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全球实体经济增长疲弱

2019 年以来，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严重干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全球实体经济萎靡不振，主要经济体工业生产全面走弱。1—5 月，世界工业生产同比增长 2.1%，增速较 2018 年同期回落 2.1 个百分点。6 月份，全球制造业 PMI 降至 49.4，连续 14 个月下降，为 2012 年 11 月以来最低水平。从主要经济体来看，制造业 PMI 普遍下降，6 月份，美国制造业 PMI 为 50.6，比年初下降 4.3 点；欧元区制造业 PMI 为 47.6，下降 2.9 点；德国制造业 PMI 为 45.0，下降 4.7 点；日本制造业 PMI 为 49.3，下降 1.0 点。

（三）全球新一轮降息周期开启，但政策调控空间相对有限

截至 7 月下旬，2019 年以来至少已有 22 个经济体进行了 30 次降息，美国、欧元区等主要经济体也均对降息持开放态度。但正如 IMF 原总裁拉加德在一季度指出的，“当经济低迷不可避免地到来时，高额公共债务和低利率将导致政策行动空间有限”，与金融危机前期相比，目前全球利率水平已经大幅下降。从已经降息的国家来看，降息主要原因是为应对经济增速的下滑，比如 2019 年已经三次降息的印度，一季度经济增速为 5.8%，出现明显下滑，其他降息国家也存在较为类似的情况。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但在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持续蔓延的情况下，调控政策空间有限的货币政策并非解决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本方法。

（四）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国际组织下调 2019 年经济增速

2019 年下半年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将继续在空间、类型、时间等维度外溢，世界经济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主要国际组织继续下调全年世界经济及贸易增速：2019 年 7 月，

IMF 将 2019 年按购买力平价 (PPP) 计算的世界经济增速下调 0.1 个百分点至 3.2%，这是自 2018 年 7 月份以来 IMF 连续第四次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 1.9%；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 4.1%。其他国际组织对全年世界经济走势的观点与 IMF 基本一致，认为世界经济增速将继续回落。世界银行预测 2019 年按市场汇率法计算的世界经济增速为 2.6%，比 2018 年下滑 0.4 个百分点；经合组织 (OECD) 预测按 PPP 计算的世界经济增速为 3.2%，下滑 0.4 个百分点。较低的预测反映了国际机构对中美经贸摩擦、英国脱欧进程、应对衰退的政策空间有限以及逆全球化趋势等问题的担忧。

六、对 2019 年下半年经济形势的判断

(一) 消费需求有望保持稳定增长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去的依靠出口拉动向依靠内需拉动转变，消费已经连续多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从 2019 年上半年消费数据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 核算支出法中的最终消费以及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三项指标总体呈现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尤其是 6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大幅反弹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下半年消费需求的信心。考虑到减税降费政策存在一定滞后性，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对于消费的影响将会在下半年进一步显现，预计下半年消费市场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二) 投资需求存在一定下行压力

2019 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总体稳定，但是部分领域投资出现较为明显的放缓迹象，而且这还是在上半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明显前置、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等一系列积极财政政策刺激下的结果。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下半年国内投资需求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投资者投资信心的不足，2018 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长 5.7%，增速比上年全年回落 1.2 个百分点；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 8.7%，加快 6.8 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0%以上，其增速放缓意味着私人部门投资信心的不足，同时也拉低了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二是主要领域投资需求上升空间有限，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明显加快，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但是在“房住不炒”的指导方针和 2019 年棚改力度明显减弱的情况下，房地产投资的较快增长难具有可持续性，进一步结合土地购置面积、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等房地产投资先行指标的走弱，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会有所放缓。

（三）外部需求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中美贸易谈判进程将会是决定我国 2019 年下半年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从上半年数据看，中美经贸摩擦在影响双边贸易的同时，还对中日、中韩等双边贸易额增速产生连带冲击，上半年中国对日本进出口额同比下降 4.0%，对韩国下降 8.6%。在美国于 5 月份将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从 10% 上调至 25% 的背景下，若中美经贸谈判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一负面影响将在下半年完全显现。

（四）主要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从国际组织的最新预测看，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2019 年 5 月 OECD 预测，2019 年中国经济增速为 6.2%；2019 年 6 月，世界银行预测 2019 年中国经济增速为 6.2%；2019 年 7 月，IMF 预测 2019 年中国经济增速为 6.2%。总体来看，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继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充分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许宪春：《2018 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全球化》2019 年第 3 期。
2.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形势分析课题组：《2019 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中国物价》2019 年第 7 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2019 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
4. 国家统计局：《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国家统计局网站，2019 年 7 月 15 日。
5. 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 2019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国家统计局网站，2019 年 7 月 15 日。
6. 国家统计局：《2019 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国家统计局网站，2019 年 7 月 15 日。

责任编辑：沈家文

· 国际经济 ·

贸易摩擦的确定性与强化 金融基础的紧迫性分析

黄志凌

摘要：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美国不断加码的对华经贸要求已经远远偏离所谓的“贸易摩擦”领域。观察美国与主要国际竞争对手的历次贸易摩擦及其结局，绝大多数场景的战略意图都十分明显，贸易摩擦只是手段，战略遏制是其最终目的。为了达到战略遏制目的，美国有可能视情况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比较常见的加征关税、进出口管制等贸易战手段，也不排除在贸易战手段无法达到目的时使用更危险的金融战手段。要尽可能将中美贸易摩擦控制在“贸易领域”，保持金融领域的积极合作，避免将贸易摩擦扩大至金融领域；立即着眼于长远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力争极端情景出现时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关键词：贸易摩擦 金融基础 交易系统 跨境支付

作者简介：黄志凌，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18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风险骤然上升，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官方和民间研究机构也发表了大量分析报告，但多以就贸易论贸易，政策建议也多集中于“怎样避免贸易战争”和“如何打赢贸易战争”等方面。然而，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美国不断加码的对华经贸要求已经远远偏离所谓的“贸易摩擦”领域。观察美国与主要国际竞争对手的历次贸易摩擦及其结局，绝大多数场景的战略意图都十分明显，贸易摩擦只是手段，战略遏制是其最终目的。为了达到战略遏制目的，美国有可能视情况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比较常见的加征关税、进出口管制等贸易战手段，也不排除在贸易战手

段无法达到目的时使用更危险的金融战手段。由于中国在国际商品市场的地位相对有利，单纯中美贸易摩擦的结局应该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即美国不可能透过贸易制裁手段达到其预期的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目的。但在金融领域则完全不同，美国的国际金融优势十分明显，而中国的国际金融基础也差距明显，在现有状态下发生金融对抗必然出现不对称性结局。因此，在中短期的策略上要尽可能将中美贸易摩擦控制在“贸易领域”，保持金融领域的积极合作，避免将贸易摩擦扩大至金融领域；同时，立即着眼于长远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力争极端情景出现时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一、美国挑起贸易摩擦背后的战略意图十分清晰， 但单纯贸易战不足为惧

笔者从2014年就开始关注中美经济地位变化，认为中国可能面临的美国战略调整及其贸易摩擦的不可避免性，提出要前瞻性地构筑中国经济的战略纵深。^①正如预期，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已出现重大调整。例如，2015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修改美国对华战略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对中国应从支持和合作转为施压和竞争；2016年7月，兰德公司发布了《与中国开战，想不敢想之事》报告；2017年11月，曾任美国白宫首席战略师的班农离职后在东京发表了针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战略主题讲演；2017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他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国家”。这些变化均反映出美国正在对中国做出重要的战略调整，而2018年3月以来特朗普主动挑起贸易战，就是美国战略调整后的具体表现。因此，针对目前还在曲折变化中的中美贸易摩擦，我们一定要透过事物的表象看到美国对华战略变化的本质，即便未来中美贸易失衡得到修正，美国的遏制战略也不会停止，必将以其他方式继续实施。

虽然按照美方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商品贸易顺差额高达3750亿美元，但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结构性的——中国想买的商品，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不卖；美国想卖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接近饱和；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具有一定的成本和功能优势，对于美国消费者具有很大吸引力，对于美国现有制造商也只是错位竞争；同时，近年来美国对华的出口增速一直快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在服务贸易上也一直保持顺差，那么特朗普为何视而不见仍执意要掀起贸易战呢？

^①黄志凌：《加大经济战略纵深研究，增强中国抗冲击韧性》，《全球化》2015年第8期；黄志凌：《经济升级的大国思维》，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9页。

表 1 历届美国总统发布的国安报告中中国角色的演变

时期	美国对中国角色的定位
里根政府时期	友好的非盟国
老布什政府时期	挑战者
克林顿政府前期	对手
克林顿政府后期	伙伴兼对手
小布什政府时期	竞争者
奥巴马政府时期	重要的合作对象
特朗普政府	战略竞争者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得。^①

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上升，已经给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形成压力。1978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和人均 GDP 占美国的比重分别为 6.4% 和 1.5%；到了 2007 年就已升至 24.5% 和 5.6%。而在过去金融危机的 10 年间，中国的经济实力更是实现了“机遇超车”，中国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占美国的比重分别升至 63% 和 15%。若按照目前中美经济增速估算，2030 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就将超过美国。

表 2 中美经济对比

	1978 年	2007 年	2017 年
中国人均 GDP（美元）	156	2695	8836
美国人均 GDP（美元）	10587	48062	59484
中国人均 GDP 占美国人均 GDP 比重（%）	1.48	5.61	14.85
中国 GDP（亿美元）	1495	35522	122504
美国 GDP（亿美元）	23566	144776	193906
中国 GDP 占美国 GDP 比重（%）	6.35	24.54	63.18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①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由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对国际安全环境、特别是美国面临的威胁作出判断，阐述美国政府在外交、防务等方面的总体目标和政策。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1997 年出版的《军语及相关术语》的界定，“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的是“为达到巩固国家安全目标而发展、运用和协调国力的各部分（包括外交、经济、军事和信息等）的政策组合”。该战略报告的法律基础是美国国会 1986 年正式通过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其中第 603 款明确规定，美国总统应当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阐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迄今为止，共有 6 位总统、9 届政府向国会提交了 17 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包括里根政府的 2 份（1987 年、1988 年），老布什政府的 3 份（1990 年、1991 年、1993 年），克林顿政府的 7 份（1994 年、1995 年、1996 年、1997 年、1998 年、1999 年、2000 年），小布什政府的 2 份（2002 年、2006 年）和奥巴马政府的 2 份（2010 年、2015 年），特朗普政府的 1 份（2017 年）。

除了经济体量与美国差距不断缩小之外，中国经济升级势头强劲，一些中国厂商和品牌也都具有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业已形成巨大的体系优势，这个体系不仅能够兼顾速度、弹性、低成本和创意，而且还能获得整个国家的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基础设施、物流网络、配套产业、市场体系的强力支持，这都是欧美日韩等制造业强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们对中国制造业体系的依赖度还在不断提升。另外，部分企业在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长足发展，已处于世界前列。中国 2017 年已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专利权申请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专利权申请数量年增长 13.4%，如果按照此增速，再有几年时间中国就将超越美国，而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全球竞争力，核心因素就是其技术和创新优势大幅领先其他国家，所以中国的快速崛起已经对美国长期以来全球主导地位构成了巨大压力。例如，美国公布的“301 调查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取代全球产业领导者（包括美国公司），以实现全球市场支配地位，已经是中国政府的明确政策目标”。实际上，美国的 301 调查报告是对中国科技发展、技术引进、产业升级等相关政策全面系统的梳理，是对中国引进和利用高新技术成功案例的总结，表明美国最担心的并不是贸易逆差，而是中国通过获取技术、发展基础工业的自主保障，在全球产业中占据优势，进而威胁到美国最根本的竞争优势——技术和知识产权。从美国已经开列的加征关税清单中，也反映出其不是以贸易赤字为出发点，而是以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战略为出发点，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已非常明显。

简单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通过战略遏制措施来打击现实挑战者甚至潜在竞争对手，是美国捍卫其全球主导地位的惯用手段。例如，二战之后，为了遏制苏联，实现称霸世界的目标，1947 年至 1949 年期间，美国相继推行了“杜鲁门主义”、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和建立了“北约”，目的就是要对苏联实行政治上的孤立打击、经济上的封锁和军事上的包围。包括之后的“卡特主义”“里根主义”“星球大战计划”等也均是遏制苏联战略的体现，而且美国一旦开始实施针对竞争对手的遏制战略，就一定是长期的过程。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持续了 45 年，直至 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解体。再例如，美国针对日本经济的崛起，同样也通过反复指责日本政府存在汇率低估、贸易补贴和市场保护等，来实施对日本的遏制，直到日本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陷入“长期失落”。对于欧洲，出于担心欧洲在贸易和货币实现一体化后的快速崛起，美国同样也采取遏制战略，尤其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就将本土的次贷危机成功地转嫁为欧债危机，从而对欧洲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因此，当前贸易摩擦仅仅是美国遏制中国战略实施的信号，按照之前美国针对苏联、日本、欧洲实施的战略遏制惯例，这一次针对中国的遏制必将是个长期过程，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此次对华遏制的战略目标与过去对俄罗斯的遏制战略有所不同。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目标并非是要将中国经济彻底搞崩溃，因为时至今日中美间经济互补性已经很强，中国商品和中国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已经不再是无足轻重。同时，近年来中国的军事力量虽有所发展，但与美国的差距很大，未来 10 至 20 年中国对美国的全球军事优势尚不构成直接威胁。而相比之下，俄罗斯对于美国具有直接的军事威胁能力，也无法透过现有的政治与军事手段来消除这种威胁，美国唯一的选择是摧毁俄罗斯经济，逐渐削弱俄罗斯在军事上对美国的威胁。因此，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遏制目标，主要是给中国经济发展制造困难，降低中国经济增速，拉大（至少能够保持）中美经济差距，并将中国压制在低端制造业领域，遏制中国快速升级的势头，从而维护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绝对优势。这也就是我们一直想强调的，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只是表象，即便是中美之间实现了贸易平衡，只要美国的遏制目标没有实现，美国就一定不会收手，虽然在与中国谈判时会不断变换花样，但不会采取当年对待俄罗斯的方法。

我们注意到，虽然美国具有较强的遏制对手的能力，包括其在全球范围内动用资源的能力，同时拥有最发达的金融市场，美元依然是世界货币，美元的霸权地位一时还难以改变，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具有了较强的反遏制能力和实力。只要我们制定正确的应对策略，保持我们既定的战略定力，加快推进战略布局，还是有望破解遏制战略的。中国经济有很大的战略纵深。中国作为 14 亿人口大国，本身就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潜力，而伴随人均 GDP 接近 1 万美元大关，中国潜在需求转为有效需求的能力已大幅提升；同时作为经济大国，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和积累，无论是资源和资本实力，还是利用效率方面，中国都具有很强的自我化解能力。目前中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除了一些核心城市和区域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备之外，其他区域依然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另外，中国经济正处于升级上台阶的关键阶段，相应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等投资需求很大。因此，即便是在极端情况下（外围经济封锁），完全依靠自身内需，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我们也能够保证至少 5% 的经济持续增长。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 124 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已经很难构筑起“铁板一块”的遏制包围圈。只要我们积极拓展“非美市场”，就可以有效对冲美国遏制战略的压力。其中，欧洲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欧洲的作用也是美国无法完全替代的，即便美国联合欧洲主要国家共同遏制中国，但中国与主要欧洲国家之间的实际交往并不会完全隔绝，预计大型企业间的商业模式创新将极大削弱美国的遏制战略效果。更何况大量欧洲国家对于美国的遏制中国战略并不认同，无论是出于自身利益还是

地缘战略考虑，都不可能完全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亚洲是全球最活跃的市场，对中国的依赖度已经很高，如果把“经营好亚洲市场”的策略走好，就能够有效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中国出口市场的压力；而中东、非洲和拉美与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同样能弥补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缺口。

表 3 2012—2017 年中国 GDP 增速及三驾马车的拉动情况

单位：%

年份	GDP 增速	最终消费支出 拉动	资本形成总额 拉动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拉动
2012	7.9	4.3	3.4	0.2
2013	7.8	3.6	4.3	-0.1
2014	7.3	3.6	3.4	0.3
2015	6.9	4.1	2.9	-0.1
2016	6.7	4.3	2.8	-0.4
2017	6.9	4.1	2.2	0.6
均值	7.3	4.0	3.2	0.1

数据来源：WIND。

二、充分考虑战略遏制的极端情景， 前瞻性思考不确定性很大的金融战

大国之间的战略遏制与反遏制，一般可能出现三种形态：贸易战争、金融战争和军事战争。作为全球经济总量前两位的经济大国，同时又都是有核国家，加之近年来中国在军队改革、装备现代化以及技术储备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具备了一定的抗衡美国军事冒险的能力。目前看美国对华军事遏制还只是在战略层面，中美直接发生军事战争的概率较低。虽然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概率仍在上升，相应地也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由于中国内需市场巨大，经济自我修复能力较强，因而贸易战只会降低中国增速，但不太可能导致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相对而言，或者与贸易战相比，金融战的危害性更大，更容易演变为灾难性危机，最终导致经济倒退。金融战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破坏性强、隐蔽性强、专业性强、传染性强等特点，对经济的致命伤害往往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而危机后经济的恢复通常又是长期的。从以往美国遏制竞争对手的实践来看，美国通常会挑起经济层面冲突，通过金融战最终制造金融危机，来实现贸易战无法达到的效果。

贸易战与金融战的最大不同之处还在于：对于贸易战双方而言，你少买或不买我的，我可以卖给别人；若你搞贸易封锁，彻底不卖给我，虽然我的经济受到冲击，但如果你找不到下家，你的经济也必将受到同样冲击。总之，贸易战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金融战则不同，只要能够让对手倒下，我就是胜利者；如果针对竞争对手实施金融封锁，我的损失充其量只是市场机会和部分利息，而对手方则会被憋死。

因此，相比军事战争和贸易战争而言，我们需要格外警惕金融战。美国应该估计到与中国开打“贸易战”不会从根本上达到战略遏制的预期目标。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巨大，经济韧性很强，远远超越美国过去所有对手。贸易战对中国经济虽有短期冲击，但经过1~2年的市场自发调整，就可以逐渐恢复过来。因此，我们不能排除美国在贸易战无效的情况下启动金融战的可能性，对于这种极端情况的发生一定要有前瞻性认识和充分思想准备，警惕贸易战演变为金融战决非“杞人忧天”。

还需要格外强调的是，金融战最终转为金融危机，除了外因诱发之外，内因才是根本。当前我国金融领域的风险隐患不少，潜在被攻击的薄弱环节也不少，而且这些内因在短期内还很难消除。因此，我们必须在政策上积极作为，阻断外因诱发内因的各种渠道和机制。中央提出三年打好三大攻坚战，尤其是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首要位置，是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举措。近两年来，监管机构组合出拳，各类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取得显著成效，但市场欺诈与失信、房地产价格泡沫、地方政府潜在债务等风险隐患仍存，必须坚定强化监管的决心，把握化解节奏，做好充分预案。从已发生的一些金融乱象和局部金融风险事件来看，当前金融市场风险呈现出隐蔽性、交叉性、传染性、突发性等特点，金融监管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更应当继续以提升金融监管能力为抓手，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用完善的金融监管系统来抵御外部可能发起的金融战争。

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基础，是国家信用体系的基石。银行稳则金融稳，金融稳则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大型银行在金融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尤其是银行业改革，优化机制和流程等，引入先进技术手段，继续提升银行的风险经营能力。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布局快速推进，但我们的国际合规意识不强，或多或少地将国内惯性思维带到海外业务拓展中，不符合国际监管规则和当地法律法规，给所在国监管处罚留下口实。而每当监管处罚发生，都会在金融市场引起相应震荡，一旦处理不当有可能引发局部金融风险甚至危机。因此，一定要强化银行业的合规意识，准确理解并严格遵守国际规则，加强行为约束，摒弃国内思维，降低合规风险（零容忍），不给他国监管机构可乘之机。

有人认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在全球金融生态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若出现金融大动荡必将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一旦出现此类危机，其危害程度一定要远远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届时美国很难独善其身。这种“鱼死网破”的局面也不符合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初衷，所以美国不会贸然发动针对中国的金融战。这种基于理性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非理性的不确定性风险始终是存在的，对于中国来说，前瞻性金融警戒是必要的。为此，必须积极做好金融战爆发的防御预案。如果我们改善了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美国将较难找到金融战的切入点。但是，金融战的隐蔽性和专业性不可忽略。一旦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找到了我们尚未发现的严重漏洞，用来发起对中国的金融攻击，我们必须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前做好准备。

我们可以参考美国金融战争演习的形式，组织一次金融战争演习，做好应对金融战争的预案。美国国防部于2009年发起了全球首次金融战争演习，将演练人员分为六组，除去裁判组以外，剩下五组分别代表美国、中国、俄罗斯、环太平洋其他国家或地区、欧洲。各组模仿所代表经济体的决策特点，根据模拟的全球性政治、经济和金融事件，采取经济和金融手段，维护各方利益。通过演习，美国发现自身缺乏应对某些极端情况的预案，也推演出一些更为有效的政策方针。^① 为了洞察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潜在的风险，我们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召集经济、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高层管理人员进行各种专题性金融战争演习。通过模拟金融战可能受到的各种攻击，进一步弥补已存在的漏洞，布局具有前瞻性的金融安全战略，提升极端情况出现时的应对速度。

最后，还要分析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几种政策建议。一是中国是否需要沽空持有的美国国债，给美国以所谓的“核打击”呢？坦率说这是“馊主意”，也不排除持此建议的机构藏有“借机获利”的私心。目前美国国债依然是全球较为安全和流动性极高的金融资产，也是被广泛接受的储备资产。中国沽空美债对于美国金融市场很难造成“核打击”效应，反倒是给我们自己的国际储备增加难题，是典型的“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下策。二是中国是否通过汇率贬值来化解贸易战带来的不利影响？笔者认为该策略亦是不可取的，因为中国作为经济大国，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战略选择，而稳定的汇率对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一个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更有利于加强外部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而“信心比黄金都重要”。2018年3月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新任主任库德洛就旗帜鲜明地支持稳定和强势的美元。他表示：“一个伟大的国家需要强劲的货币。我没有理由相信特朗普总统不赞成稳定而坚挺的美元。我并不是说美元必须上涨30%，而只

^①郑刚：《金融攻击：一种全新的隐型战争方式》，《竞争情报》2013秋季刊。

是说让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知道我们将保持美元这一国际储备货币的稳定，这会在国内树立信心。” 三是中国是否考虑减少美国服务贸易来反制美国呢？法律、会计、评估、咨询等现代服务不仅是美国的垄断优势，也被国际金融市场广泛接受，而中国本土这方面的现代服务能力有限，尚未被国际市场认可。如果中国将减少美国现代服务需求作为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手段，其结果比“饮鸩止渴”还可怕。

因此，我们在中短期的策略上要尽可能将中美贸易摩擦控制在“贸易领域”，保持中美金融领域的积极合作，避免将贸易摩擦扩大至金融领域；同时，立即着眼于长远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力争极端情景出现时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三、必须从战略上重视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有助于加强中国国际金融安全的价值基础

美国有能力发动金融战，是基于“美元霸权”，中国在金融战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人民币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不难判断，美元霸权地位是美国发动并赢得金融战胜利的基础。我们在短期内无法改变这种事实，必须从战略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才能从根本上打造中国金融安全基础。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具有金融发展深远意义，更具有中国金融安全的国家战略意义。^① 2009 年，我国在上海、深圳地区试点人民币贸易结算项下的自由兑换，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正式启动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们应清醒的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只是刚刚起步，不仅与美元相比差距巨大，就是与欧元和日元相比也存在很大距离。我们必须围绕人民币国际化打造中国金融安全基础。

（一）深刻理解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目的与客观条件

只要存在国际市场并且自己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国际经济活动，谁都梦想使自己发行的货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所谓国际化货币，主要是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发行的货币在境外作为计价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贮存并得到广泛使用。具体的货币功能包括：标价货币、计价货币、结算货币、载体货币、替代货币、投资货币、锚定货币、干预货币和储备货币等等。

各种媒体间流传着多种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主要目的的说法。一种观点是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加强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再受美国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影响；另有

^①黄志凌：《经济升级的大国思维》，人民出版社 201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20~127 页。

一种说法是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增强中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和话语权，降低中国企业交易成本；还有一种说法是既可以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获得铸币税效应，也可以加速在中国的一些重要城市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等等。但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目的是减少外汇储备压力、降低中国在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承担的汇率风险，更重要的是透过人民币国际化建设打造金融安全的基础。这是根本所在，不能舍本逐末。一种货币被公认为完全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必须同时具备国际结算货币、国际计价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三大功能，而这三大功能的实现对于该国或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一种货币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需要具备一系列客观条件：一是发行国或发行体政治稳定且在国际上的影响强大；二是发行国或发行体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经济开放程度高且对外贸易额巨大；三是发行国或发行体拥有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完善健全的金融市场；四是政府支持本国货币国际化，并推行有利于本国货币国际化的政策；五是发行国货币币值稳定，具有较好的信誉。应该说，人民币已经具备了这些客观条件，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动机问题。一般来说，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动机有三个，即购买中国产品和服务、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以及购买以人民币标价的金融资产。其中，中国现行的政策环境虽然能完全满足第一和第二个动机的实现，但激励的力度明显不足；而满足第三个动机所需的条件则较为复杂。如果持币者选择在中国境内购买人民币标价的金融产品，则中国需向境外投资者开放金融市场，即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如果持币者选择在境外购买人民币标价的金融产品，则需培育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为持币者提供充足的人民币金融工具。目前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较低，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深度不足，成为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主要动机集中在套利方面，这是人民币国际化健康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问题。人民币自由兑换包括三个层面：其一，境外市场与境内市场之间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其二，境外市场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其三，境内市场的人民币自由兑换。目前的现状是，在不涉及人民币回流的情况下，境外人民币完全自由，境外市场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人民币最终的购买权和收益权对应的是境内市场，如果切断了境内外市场间的自由兑换通道，境外市场的人民币也失去了真正自由的含义。这也是为什么2009年和2010年香港人民币同业拆借利率超低，人民银行为进一步培育离岸人民币市场，设立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允许境外三类机构参与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原因。因此，如何实现境内市场与境外市场之间的自由兑换，已经成

为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

三是提升对外输出人民币的能力。金本位制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黄金产量增长幅度远低于商品生产与交易增长幅度，黄金作为国际货币不能满足全球范围内媒介商品交易的需求。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稳固，与美国常年“双逆差”向全球输送美元的局面有一定关系。^① 日本过去几十年一直都在持续推进所谓的日元国际化，但成效不显著，在目前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比非常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是贸易顺差国，无法通过贸易赤字的形式对外输出货币，而只能通过金融资本渠道进行货币输出。^② 人民币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不仅要解决境外持有动机、消除持有障碍，还必须提升对外输出供应能力。

（二）历史的发展也证明，成功实现货币国际化需要具备多方条件，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英镑国际化经历了 50 多年的发展。1816 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承认黄金作为货币的本位。1821 年，英国正式启用金本位制，英镑成为英国的标准货币单位。19 世纪 70 年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英镑走向全球化，不仅基于世界对英国经济实力的信任，更有赖于英国完善的金融制度和法制化的金融监管。英格兰银行对于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成为英镑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而 1720 年爆发的南海公司股票事件更是迫使英国用了 100 年的时间来不断完善货币发行、监管制度。

美元国际化进程也经历了 50 多年的时间。1894 年美国的 GDP 就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到 1913 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相当于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国家工业产值之和。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也得到了迅速发展。1790—1868 年，美国进出口贸易处于逆差状态，此后美国进入贸易顺差时期，1900—1913 年年均商品贸易顺差已经达到 5.702 亿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帮助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到 1929 年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达到 14.2%，第一次超越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产值超过了 50%，进出口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1/3，黄金储备占西方国家黄金储备的 59%。因此，在 1944 年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才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经过《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签署，美国才确立了美元的国际核心货币地位。

欧元经过 30 多年酝酿和准备，于 1999 年正式启动，并于 2002 年开始流通。流通后

^①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除少数年份之外，美国基本处于“双逆差”的状态。

^②为促进日元的输出，日本建立了海外协力基金（OECF）和输出入银行（JEXIM），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展“黑字环流”计划，向外输出日元。

的10年间，欧元成就斐然。欧元走出了类似M型的走势，反映出欧元从区域货币到国际主导货币的成长历程。欧元区国家GDP占全球GDP超过15%，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欧元所占比重也从1999年诞生时的18%，上升到2009年的27%；而同期美元所占比重，则从71%下降到64%。但由于欧元设计上的“先天不足”，以及相关财政、经济一体化进程滞后，欧元作为超主权的区域货币，只有统一的中央银行提供货币发行、货币政策和金融调控，缺乏完善的区域内财政政策调控和监管。在国际金融风暴冲击下，上述问题恶化为欧债危机，而欧债危机又反过来加剧了欧元危机。

再看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在资本项目迅速开放的过程中，日本国内的金融改革非常滞后。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经济异军突起，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在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前，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加速，为日元在国际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随着欧元的兴起、日本经济的急速滑坡，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在进入2000年后不断倒退。日元的国际化进程直接导致了两个空心化——企业资金流出、居民投资国际化。这两个空心化影响了本地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日本经济实力，进而重新对日元的国际地位产生了影响，并成为日本经济“失落的二十年”的一大推手。日本过去30多年一直持续进行的日元国际化之所以成效不显著，在目前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比非常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是贸易顺差国，无法通过贸易赤字的形式对外输出货币，而只能通过金融资本渠道进行货币输出。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本地金融市场并未得到发展。在资本项目迅速开放的过程中，日本国内的金融改革滞后，如日本对债券市场的管制直到1995年前后才放松，这使得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没有改变，从而未能给国际化的货币提供一个价值储藏的渠道。

人民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尚不足以支持重要经济体选择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健全，容量与深度也还不够。这两个方面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原因。

人民币国际计价货币功能是人民币国际化最短的短板。人民币的国际计价功能是指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的私人用途和官方用途中，承担价值衡量和记账工具职能。相对于人民币的国际结算职能，目前人民币的国际计价职能严重滞后。例如，虽然我国已逐渐成为大宗商品消费大国、贸易大国，多个品种进口数量高居全球榜首，但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仍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经济体手中，形成了以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农产品、NYMEX（纽交所）能源和LME（伦敦金属交易所）有色金属为主的几大商品定价中心。这些定价中心基于历史惯性、交易双方接受程度、套期保值途径和容量、理论模

型和硬件辅助系统的完备程度等因素，推出了以美元为主的大宗商品定价机制和价格。

通常而言，某一货币是否能作为国际计价货币主要与如下因素相关：一是通货膨胀，通胀率低、币值稳定的货币更有可能被选作贸易计价货币；二是汇率变动，进出口双方选择计价货币时会更多地倾向于选择具有稳定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国家的货币；三是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进出口双方更愿意选择兑换成本最低且能被其他国家贸易商普遍接受的货币，这就要求该货币的发行国必须有发达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以及完善的货币市场工具；四是货币的可兑换程度，如果一种货币还没有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那么境外持币的风险与成本就比较高，这种货币在与其他可自由兑换的货币的计价竞争当中，就会处于劣势地位。从这些方面来看，人民币充当国际计价货币的路途还十分漫长。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汇率稳定，这是国际市场愿意使用结算和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的前提之一。有人认为只要是特朗普反对的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他担心人民币贬值，我们就让人民币贬值，让他的贸易战目标不得逞。这样做的结果是短期对冲了贸易战压力，但远期增大金融战的风险。而金融战是比贸易战破坏力更大的国家之间经济对抗。有人疑问，你说稳定人民币汇率很重要，为什么特朗普也反对人民币贬值？其实，特朗普的所有决定都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只不过是现在和将来不同时间而已。打贸易战时他不希望你的货币贬值，但到打金融战时就不一样了，那时就会以摧毁你的货币为目标。所以，我们现在就必须做好准备。

四、加强金融交易系统建设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事关中国国际金融安全的技术基础

基于美国已有金融制裁案例，对比中国金融体系现实，我们在金融交易的基础设施方面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短板：一方面，某些金融产品的交易只能使用美国的交易系统完成交易，比如中国的外币债券交易只能通过美国彭博公司的 POMS 系统完成。另一方面，某些金融产品由于价格、交易活跃度等原因需要使用国外的交易系统，比如中国的外汇即期和远期交易（除人民币兑外币）大多是在 FXall 和 EBS 系统上完成的。虽然 FXall 是汤森路透（非美国）的产品，但开发 EBS 系统的 NEX 集团已被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CME）收购。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发的 CFETS FX2017 系统由于外汇报价和流动性劣势，在外币兑外币的外汇交易中使用较少（仅有人民币兑外币交易必须通过 CFETS FX2017 完成）。

从技术的角度分析，我们的跨境支付系统还存在以下潜在风险：一是部分关键领域

缺乏备份机制。大额资金的跨境支付清算中，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居于绝对垄断地位。SWIFT 网络通过系统工具、报文标准等手段，将不同国家的银行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的跨境货币转移均通过 SWIFT 网络发起指令、开展跟踪。一旦 SWIFT 网络因种种原因无法使用，将导致一国或多国跨境经济金融活动的整体瘫痪。小额支付领域的服务主体主要是银行卡组织、第三方支付公司等，参与主体较多、冗余程度较高。经多年发展，目前银联已覆盖 170 个国家，但较维萨（VISA）、万事达（MasterCard）等覆盖 200 个以上国家的覆盖程度仍有差距。二是金融安全存在政治干预风险。美元是跨境支付清算的主要货币，导致在美国长臂管辖规则下，各类主要的支付清算主体频繁受到美国的强力政治干预，特别是 SWIFT 系统影响力大、杀伤力强，已成为国际自由经济金融活动的隐患。譬如，大额支付领域：如 2012 年将伊朗排除出 SWIFT 网络，直接导致伊朗石油出口下降 60%，被广泛认为是 2015 年伊核协议签署的主要推力。美国、欧盟还曾多次威胁将俄罗斯排除在 SWIFT 系统之外。再譬如，小额支付方面：VISA、MasterCard 等卡组织也必须服从美国制裁，如在乌克兰危机之中，VISA、MasterCard 就根据美国要求，停止了对俄罗斯支付的清算服务，导致一些俄罗斯客户转而使用中国银联服务。三是部分跨境数据易被他国掌握。美国进一步扩大了 SWIFT 数据信息的应用范围，不再局限于反恐，而将其与美元清算数据打通，用于制裁、反洗钱、金融情报等领域。如据媒体报道，美国通过 SWIFT 数据，全面掌握了澳门汇业银行通过 80 个账户处理 2500 万美元的涉及朝鲜资金，认定汇业银行涉及洗钱，对其进行了制裁。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必须尽快完善跨境支付清算系统。随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二期的投产运行，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一定程度上脱离了 SWIFT 的掌控，中国可以通过 CIPS 直接完成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截至 2018 年 12 月，CIPS 共有 31 家直接参与者和 818 家间接参与者，其中亚洲 626 家（含境内 349 家）、欧洲 102 家、北美洲 25 家、大洋洲 17 家、南美洲 17 家、非洲 31 家。^①但需要注意的是，只有这 31 家直接参与者可以直接使用 CIPS 系统办理业务，其他 818 家间接参与者需通过直接参与者来使用 CIPS 系统。然而除非间接参与者选择用专线向直接参与者传递信息，直接参与者与间接参与者之间报文的传递需要通过 SWIFT 来完成。而绝大多数间接参与者并没有接入专线。因此，这部分人民币跨境支付信息仍将被 SWIFT 记录。如果中美发生金融战，美国有可能假借反恐等名义使用 SWIFT 数据库，利用 SWIFT 分析中国的国际布局。出现极端情况

^①数据来源：CIPS 官网。

时，美国甚至有可能限制中国金融机构使用 SWIFT，从而限制人民币跨境支付。因此，必须尽快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

第二，推动阻止未经授权的数据开放。跨境支付涉及对外政治、经贸往来，数据高度敏感，欧洲各国已多次呼吁停止与美国的 SWIFT 的数据共享。2013 年 10 月，欧盟议会通过一项停止决议，但为“非强制性”。在通用数据保护（GDPR）条例背景下，预计数据共享的反对声音还会加强。建议我国积极加入：明确授权共享规则，清晰划分货币发行国、金融机构所在国、业务所在国等主体间的职责、权限，未经各相关方允许，不得单方面提供；规范数据共享流程和标准，明确数据提供的信息字段、隐私保护、商业秘密保护等规则，限制政治用途；建立数据提供的授权、告知、终止等流程，接受多方监督；明确数据主权，SWIFT、VISA 等系统上的数据应由交易方所有，由交易方全权控制，SWIFT、VISA 等国际组织只有管理权、保存权，并无所有权。

第三，完善对跨境支付体系的主动监管。建议按照国际监管标准，积极主动参与对跨境支付清算主体的监管。首先，获得监管权限，推动 SWIFT 组织进一步开放监管权限，推动人民银行成为 SWIFT 监督组织（Oversight Group）成员，力争加入监督执行工作组。其次，完善国内立法，明确人民银行作为对人民币跨境业务的监管权力，包括对跨境支付清算机构的现场检查、资料调阅、应急处理等内容。最后，加强跨境监管协调，积极参与国际监管规则制定，建立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国际货币发行体的监管合作机制，共同维护跨境支付结算体系安全。

第四，积极参与或对接国际上正在建立的 SWIFT 的替代系统。伴随着对美国干预的反抗，欧盟、俄罗斯等经济体已开始研究打造 SWIFT 的替代系统。如欧盟计划以特殊目的实体（SPV）方式复制 SWIFT 功能，方便欧洲公司依据欧盟法律与伊朗展开合法的金融结算交易，并表示将对全球其他伙伴开放。俄罗斯已打造了金融信息传递系统 SPFS，正在积极引入参与主体，目前已有 500 余家各类组织和机构加入。从头打造大额跨境支付信息交换体系面临长期考验，但作为国际冲突中必要的备份机制，建议积极参与或主动对接。

责任编辑：沈家文

澳大利亚发展共享经济的经验与启示

于凤霞

摘要：共享经济给人类带来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曙光，共享经济具备诸多优势，被视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其发展仍然面临新旧业态平衡、法律法规调整、劳工关系变迁、监管政策变革等巨大挑战。澳大利亚在共享经济发展和新旧业态的平衡中，政府最终选择支持民意，在税收、监管、消费者保护等方面进行政策调整，既促进共享经济发展又保障新旧业态公平竞争。合理借鉴澳大利亚经验，将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制定共享经济发展和监管政策。

关键词：数字经济 共享经济 平台经济

作者简介：于凤霞，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分享经济处处长、高级经济师。

共享经济已经成为变革人类生产生活的新模式，让全世界看到了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曙光。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共享经济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享经济的发展就一帆风顺。实际上，虽然共享经济已经被视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在短期内却会对传统产业的市场需求和管理体制造成冲击。因此，在共享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面前，哪个国家能够率先冲破传统制度障碍，哪个国家就能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领头羊。纵观世界，我们发现，澳大利亚在经历数年的新旧业态平衡后，逐步转变了曾经对共享经济的偏见，变遏制为支持，进而成为共享经济企业竞相进入的蓝海市场。目前，已经有 22% 的澳大利亚人通过优步（Uber）、爱彼迎（Airbnb）、Airtasker 等网络平台，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或闲置资产赚取外快，已经有超过 2/3 的人

使用过共享经济服务。

反观我国，虽然政府部门已经研究制定支持共享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文件，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以共享出行为代表的共享经济企业仍然遭遇重重阻碍。其中，既有监管部门对新业态认识不足、监管能力跟不上的原因，也有维护传统业态利益，将大量问题留在线下等考量。但是，数字化、平台化的趋势已然不可逆，顺势而为，走共享经济的节约型发展道路，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澳大利亚为典型案例，介绍政府部门在观念转变、支持共享经济平稳发展的成功经验，希望能够为我国各地共享经济的支持政策制定、监管规则调整等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一、澳大利亚共享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

在澳大利亚，共享经济也属于舶来品。早在 2012 年 10 月，美国的共享出行领导企业 Uber 就已进入澳大利亚，但是 Uber 所提供的服务一直不被澳大利亚所认可，在很长时间里都属于违法运营，而且不断遭到来自监管部门、税务部门、工会、司机等各方的阻碍。客观地看，这是新旧业态相互抗争，最终达成平衡发展、公平竞争格局必不可少的路径，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都正在经历这一过程。在本部分，我们以共享出行为典型案例，阐述作为新生事物的共享经济在发展中面临的多重挑战。

（一）与传统业态的抗争

共享经济强调对利用不足的资源进行挖潜，无需或仅需很少的新增投入，因而其成本往往大幅低于传统市场服务，并直接给传统业态带来冲击。这在出行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传统出租车行业面临政府的强监管，一直保持着严格的数量和价格控制，出租车司机不仅要承受巨额的牌照费用，还要负担日常的运营成本。正因如此，自从 Uber 进入澳大利亚之后，就不断面临当地出租车司机的罢工与抗议。例如，2015 年 9 月，澳大利亚出租车行业掀起大规模抗议 Uber 的罢工运动，400 名司机聚集在墨尔本维多利亚议会大厦，要求政府取缔 Uber，昆士兰、西澳大利亚和新南威尔士等州也相继进行罢工抗议。实际上，在大量出租车罢工时，澳大利亚民众的反映却很冷淡，多数人认为 Uber 能提供更好更便宜的服务。

（二）与税务部门的抗争

自 Uber 进入澳大利亚起，其就一直处于违法运营状态，因此先后有大量 Uber 司机被课以罚款。例如，昆士兰州政府曾在一年时间内对 500 多名 Uber 司机开出 1500 多张罚单，总金额超过 173 万澳元。2015 年，澳大利亚税务局（ATO）对全国 Uber 司机的收入报税情况展开审核，并以 Uber 司机提供的服务类似出租车运营服务为由，要求 Uber

司机按照澳大利亚税法规定，从当年8月1日起不论营业额多少，都必须申请澳大利亚商业编号（ABN）并缴纳商品与服务税（GST），否则将因违反税法而遭受巨额罚款。对此，Uber认为其司机不使用出租车车站，不穿统一制服，不在街道上载客，而且多数属于兼职司机，因此不应当被归类为出租车司机。^①同时，Uber建议旗下9000多名司机暂不进行商业注册，并对税务局的决定提起上诉。但是，最终Uber的观点并未得到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的认可和支 持，在历经18个月的诉讼纠纷后，2017年2月正式裁定Uber司机为出租车司机，必须遵从澳大利亚的税法规定，即不论营业额多少都必须注册并缴纳GST。

（三）与司机和劳工部门的抗争

共享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就业带动和收入促进作用。但是，不少从过去专职岗位转移到兼职岗位的人员，在面临竞争压力时往往会寻求共享平台提供类似专职岗位的福利保障，这在十分注重福利的西方国家尤为突出。2017年6月，澳大利亚司机工会——“共享出行司机联盟”要求Uber给予司机“正式员工”而不是“分包商”地位，并享受雇员相关福利待遇。应工会请求，澳大利亚劳动力监管机构——公平工作监察员（FWO）启动对Uber的用工方式调查，重点审查Uber是否违反澳大利亚劳动法。然而，历经一年多时间，这一调查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时至今日监管部门仍然在继续调查Uber与司机的合同是否符合澳大利亚法律。

以共享出行为典型案例的曲折发展表明，共享经济在澳大利亚的发展也曾面临重重障碍。但是，即便如此，澳大利亚共享经济的发展进程并未受到实质性阻碍。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尽管一开始澳大利亚各州政府都在大力打压Uber等共享出行服务，但到2015年时全澳大利亚的Uber用户反而增长至100万左右，这让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共享经济这一新业态的利弊，以及此前打压政策的合理性。2015年以来，澳大利亚各政府部门都在加深对共享经济的认识，并客观评估共享经济带来的各方面影响。例如，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 2016）的研究报告指出，共享出行以更低的成本提供了比传统出租车更高质量的服务。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将共享经济带来的消费者福利归纳为四个方面：更多选择机会、了解其他用户体验、找到适合自己偏好的产品或服务、可能价格更便宜。其他第三方评估也发现，共享经济对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增加税收等方面都有积极效果，政府部门的监管政

^①ATO和Uber官司的核心在于Uber司机提供的服务是否属于“出租车服务”，但焦点却在于是否注册缴纳GST。因为，澳大利亚税法规定，一般企业的营业额高于7.5万澳元才必须注册缴纳GST，但出租车行业例外，即无论出租车司机营业额多少都必须注册缴纳GST。

策也随之逐步调整。正是在澳大利亚出租车司机罢工后的一个月，首都堪培拉就率先完成法律修订，正式承认 Uber 和其他共享出行服务的合法性，这也对其他地区监管政策的放松起到了示范作用。

二、澳大利亚发展共享经济的经验

经过数年的磨合和政策调整，澳大利亚共享经济已经得到长足发展。目前，Uber 在澳大利亚的司机数量已经达到数十万，Airbnb 在悉尼的用户量位居全球前列，此外还涌现了宠物看护、技能分享等大量共享经济创业企业。根据 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Work 发布的官方报告显示，澳大利亚从事兼职工作的人数在逐年上升，已经从 2012 年的 29.7% 增加到了 31.7%。根据德勤报告，2016 年仅新南威尔士州（NSW）主要共享经济企业的收入就达到 26 亿澳元，同比增长 68%，服务提供者达到 9.2 万人。澳大利亚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与政府官员主动认识共享经济，积极推动政策的适应性调整有很大关系。

（一）政府官员已普遍接受共享经济新理念、新业态

澳大利亚各州对共享经济开展属地化管理，在面对共享经济带来的影响时，普遍以尊重发展趋势和百姓需求为出发点，进行主动了解和客观评估。以新南威尔士州为例，2017 年 8 月在面对 Uber 意欲在澳大利亚实施“飞的”计划时，州政府一位发言人称，“科技创新的速度与大数据的使用推动了交通设施和服务的完善，并给我们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以改变计划和部署未来交通服务的方式”。2017 年底，在 Taxify 进入新南威尔士州时，州贸易和工业部长表示很高兴 Taxify 在新南威尔士州推出其服务，这笔巨额投资将吸引数以千计的司机注册，对经济 and 用户而言都是巨大的胜利。类似支持共享经济发展的官员发言并不少见，而且还有一些官员在网站上公开讨论共享经济相关议题，比如有电子安全专员办公室的专员在官网上发表文章讨论共享经济中的育儿外包服务。

（二）在政府官方网站上系统宣传共享经济

澳大利亚对待共享经济的态度是客观公正的，在支持共享经济创新发展的同时，也提醒各方权利义务和可能问题。对此，我们能够在澳大利亚各大政府网站看到对共享经济的系统介绍，比如 ACCC 官方网站上就有对共享经济的详细介绍，ATO 则系统介绍了共享经济相关的税务问题。2016 年 11 月，ACCC 还发布了协助共享经济平台运营商、用户和服务提供方的指南，强调各方在《澳大利亚消费者法》（ACL）中的权利和义务。在平台运营商指南中，突出强调评论的重要性，认为评论不仅决定服务质量，而且也是信任和安全的重要指标，要求必须有适当的流程来确保用户评论的真实性和不可更改性。

在服务提供方指南中，解释了对消费者的义务，以及与平台打交道中的权利，并指出平台运营商必须协助服务提供方履行义务。在用户指南中，指出包括如何评论、检查平台有无额外交易保障等八个技巧，以帮助用户获得最大收益。值得注意的是，ACCC 已经将这些教育平台和用户的法律义务作为国家项目的一部分。此外，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市民了解共享经济，比如 NSW 政府在官网上列出市民需要了解的共享经济知识，并宣称欢迎共享经济带来的对消费者选择、就业和生产率方面的积极影响。

（三）建立新旧业态公平竞争的税收规则

为促进新旧业态平衡发展，澳大利亚税务局将共享经济平台和平台上的服务提供者均纳入到征税范围，以建立新旧业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共享经济平台企业，需要申请 ABN，并缴纳 GST。如果平台年度营业额（预期）低于 7.5 万澳元，则无需注册 GST，但可以申请 ABN 以防有开票的不时之需。例外的是，对共享出行企业执行特殊规定，不论营业额多少都必须注册 ABN 并对全额收入按 11% 的税率、分月或季度申报 GST。此外，如果共享出行企业同时拥有其他企业，即使其他企业并非从事共享出行业务（比如是共享停车位），也必须同时报税。对平台上的服务提供者，规定使用共享经济平台提供收费服务或使用住宅、汽车或其他资产赚取收入时，需要记录所有收入以及可以扣除的费用，并在纳税申报表中进行申报。以共享出行为例，司机可申请抵扣合规费、停车费、过路费等大量运营相关费用，但只有载客行驶里程发生的费用才能扣除，且税务局将每辆汽车可申报的载客行驶里程限定为最高 5000 公里。对于抵扣费用计算方法，税务局还提供了两种方式：按汽车行驶每公里费用申报或通过记录行车日志计算汽车申报费用，并专门发布了一款叫“我的扣除”APP 工具。

（四）突出对消费者的法律保护

在监管方面，澳大利亚将消费者的权利和福利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ACL 将共享经济平台上发生的纠纷均纳入规范范围，旨在持续推进公平共享。ACL 认为，澳大利亚有 50% 人口使用或考虑使用共享经济平台，所以号召每个人都必须发挥自己作用来实现公平共享。ACL 不断提醒用户，如果通过共享经济平台租用或购买商品和服务，出现问题会跟在商店购买一样受到法律保护。ACL 还在其官网上为消费者明确指出了纠纷处理流程：一是同商家或服务供应商协商；二是与共享经济平台联系，走共享经济交易平台内部争议解决程序；三是在平台上给商品或服务提供者留下实事求是的评语和评级；四是向所在州或地区的消费者事务机构提出投诉。此外，在具体的共享经济监管细则中，还提出了一系列详细的信息披露要求，以让消费者拥有同传统线下消费一样的知情权。

（五）建立平衡新旧业态的监管机制

共享经济对传统业态带来了客观冲击，尤其是共享出行的发展，打破了长期以来难以满足用户需求、过度监管又反对竞争的出租车商业模式，因此协调新旧业态的矛盾成为监管变革的重点。以 NSW 为例，经过广泛审查和咨询，政府认识到现行法律增加了服务提供成本，限制了创新机会。2015 年 12 月，NSW 交通部门宣布更新过时的交通监管规则，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对此，NSW 提出了四方面的交通变革举措：一是在拿到许可证、完成司机背景审查、司机和车辆安全检查，以及第三方强制保险后，共享出行企业和司机可以合法运营；^① 二是立即取消超过 50 条的出租车和租车监管规则，评估认为这有望每年节约 3000 万澳元的监管成本；三是建立新的监管机构和委员会——点对点交通管理局，以确保新的监管规则得到落实；四是引入一套援助方案来缓解共享出行给传统出租车牌照持有者造成的重大影响，包括艰苦条件支持和牌照回购计划。同时，为出租车和租车牌照持有者建立 2.5 亿澳元的行业调整方案，资金来源于每次向出租车和共享出行乘客征收 1 澳元费用。

（六）政府部门积极参与共享经济

澳大利亚政府不仅是共享经济的宣传者，而且政府部门也在深度参与共享经济，通过类似政府采购的方式支持政府机构使用共享经济服务提高效率。以 NSW 为例，州政府正在推动汽车共享、共享出行的政府采购，以降低政府成本。在汽车共享方面，早在 2015 年初，州财政、服务和创新部（DFSI）就对汽车共享的价值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测试，^② 通过测试发现，使用汽车共享明显降低了政府车队的规模和成本。2015 年 8 月，州政府宣布利用共享经济成立新车队的计划，目前市区的公务员都使用汽车共享。在共享出行方面，2016 年 3 月，DFSI 成为州内第一个为公务员提供共享出行服务的政府机构，需要出差的公务员可以在出租车、共享出行和公共交通中选择最合适和最有价值的方式。此外，2016 年 4 月，州政府老龄部老年卡宣布与 Uber 建立新的合作关系，一方面为老年人会员提供共享出行折扣服务，另一方面为老年人提供成为 Uber 司机的机会，让他们以适合自己的时间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

三、澳大利亚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正如历史上汽车对马车的替代一样，任何新业态的产生和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

^①在第三方强制保险方面，保险费用取决于车辆使用情况，根据新的保费安排，保费结构由基础费用和变动费用组成，其中变动费用取决于汽车使用里程。

^②测试使用了 GoGet 和 Hertz 24/7 提供的汽车共享服务，测试期间有超过 160 名公务员使用了 352 次与业务相关的共享出行。

各种阻力甚至暴力冲突，这是经济和社会进步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解决之道在于，建立一种能够取得广泛信任并产生普遍满意结果的制度。由于传统出租车监管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作为共享经济新业态的 Uber 进入澳大利亚所引发的矛盾，以及澳大利亚政府推动的监管变革，不仅对全球其他市场的共享出行变革有重要借鉴意义，而且对其他共享经济领域监管政策的调整也有重要启示。

（一）要客观认识共享经济新业态的创新发展

共享经济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共识和快速发展，已经充分证明其适应性和生命力。更为重要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共享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可称之为全球共享经济竞赛。我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早已提上议事日程，监管机构应正视共享经济发展的客观性、必要性，并学习澳大利亚经验，全面评估共享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从而进行趋利避害的针对性政策设计。尤其是，要发挥我国体制优势，将共享经济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促进监管部门全面客观认识共享经济、推广共享经济、引领共享经济。

（二）要统筹建立多部门协同的推进机制

用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的话说，共享经济是一种破坏性创新，虽然能带来诸多益处，但也会对传统的业态造成显著冲击。作为新业态，共享经济涉及到多产业融合、新旧业态平衡、法律法规调整、劳工关系变迁、监管政策变革等问题，需要政府部门进行“跨界”交流、多部门协调，研究制定一套系统性的支持政策和解决方案。目前，我国急需统筹考虑的是，研究制定促进共享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社保兜底政策、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专兼职分类监管政策和分类征税政策，这些基础制度无法取得突破，共享经济很难获得充分的发展。

（三）要给出新旧业态转型发展的过渡性解决方案

目前，共享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不再是市场和用户不欢迎的问题，而是如何确保新旧业态不发生系统性、尖锐性的稳定风险，顺利实现新旧业态的融合、转型发展。对此，监管部门需要客观分析传统业态中存在的“非市场性”门槛，以及新旧业态矛盾的焦点和形成原因，由此才能研究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比如，在共享出行领域，全球出租车行业都因传统的许可制、牌照拍卖、数量管制等形成了行政性的退出壁垒，造成出租车司机难以轻装前行与共享出行司机公平竞争。对此，我国也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经验，通过降低牌照租金、制定补贴方案等方法实现平稳过渡。

（下转第 73 页）

OECD 国家 R&D 投入机制 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杨白冰 李陶亚

摘要：本研究将 OECD 国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R&D 投入—产出”效率分析框架，将创新机制划分为 R&D 投入、基础研究、创新投产、技术扩散以及创新产出五个阶段，深入分析 OECD 国家在创新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国际比较的结果显示：R&D 投入结构而非数量对创新产出影响更为显著，企业主导的 R&D 投入具有更高的投入产出效率；基础研究水平的高低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高效的产学研转化机制以及完善的技术扩散网络才是提升创新绩效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下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激励企业增加 R&D 投入，推动创新型企业集群化，强化政府服务职能，吸引外商投资，创新融资模式等。

关键词：R&D 投入 创新产出 技术扩散 产学研转化

作者简介：杨白冰，国家信息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
李陶亚，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

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其内涵是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①其内涵既包括新知识或新技术的创造，也包括将新知识或新技术投入生产并最终获得收益。^②近年来，我国 R&D 投入呈现稳步上升趋势。2017 年，R&D 经费投

* 本文受四川省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强化 R&D 投入支撑创新型四川建设的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2017ZR0001）项目资助。

① 卢方元、靳丹丹：《我国 R&D 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1 年第 3 期，第 149～157 页。

②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73～74 页。

入高达 17606.1 亿元，同比增长 12.3%，R&D 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 2.13%，比 2016 年提高 0.02 个百分点。^① 研发投入总量的逐年加大以及结构不断优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夯实了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发整体水平仍然存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特别是在研发投入结构、基础研究水平、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仍与创新型国家有较大差距。^② 本文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 R&D 投入—产出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期为我国创新发展提供启示。

一、OECD 国家 R&D 投入—产出的基本特征

（一）OECD 国家 R&D 投入变化趋势

1. OECD 国家 R&D 投入总量变化情况

已有研究通常以 R&D 投入总额与 R&D 投入强度对一国 R&D 投入水平进行测度。图 1 反映了 R&D 投入总额与增速的变化情况。由图可知，OECD 国家的 R&D 投入呈现如下特点：第一，发达国家政府十分重视新技术的开发。比较 1996、2006、2016 年 R&D 投入额可以发现，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OECD 国家 R&D 投资总额呈现显著的上涨趋势。第二，OECD 各国 R&D 投资额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超过了同期名义 GDP 的增长速度。在 1996 至 2016 年这 20 年间，以现价美元折算的 R&D 投资额增长率为 5.76%，同期的名义 GDP 增长率为 3.29%。^③ OECD 国家的 R&D 投入增速除了在 20 世纪初的几年以及在金融危机后的几年低于同期 GDP 的增速外，其余时期均超过同期 GDP 的增长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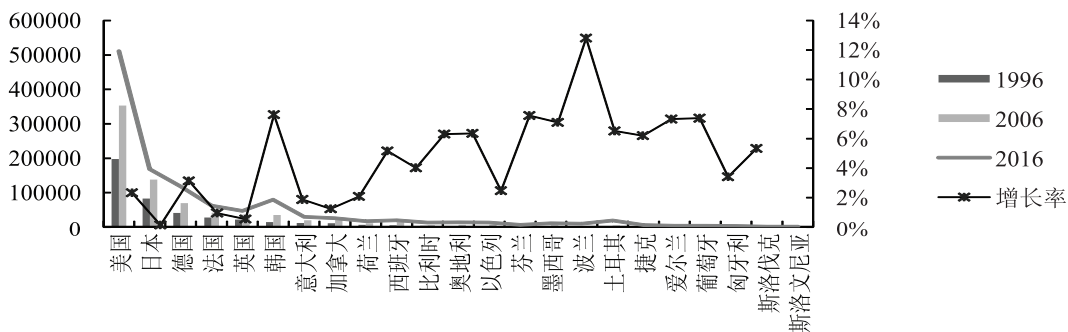


图 1 1996—2016 年主要 OECD 国家 R&D 投资额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OECD 数据库。

^①数据来源：《2017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②廖伟：《中国与 OECD 国家 R&D 投入比较研究》，《特区经济》2010 年第 8 期，第 107～109 页。

^③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计算了 23 个 OECD 国家的 R&D 投入与 GDP，数据均以现价美元进行折算，其中 R&D 投入数据源于 OECD 数据库，GDP 数据源于世界银行。

2. OECD 国家 R&D 投入强度变化情况

从投入强度看，1996—2016 年 OECD 主要国家的 R&D 投入强度发生了明显变化（见图 2），且不同国家间出现了分化：有些国家的 R&D 投入强度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如韩国，20 年间一跃成为 OECD 国家中 R&D 投入强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奥地利、以色列、比利时等国的 R&D 投入强度也显著提高。有些国家的 R&D 投入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趋势，典型的国家有英国、荷兰、法国等。也有少数国家 R&D 投入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加拿大、芬兰、日本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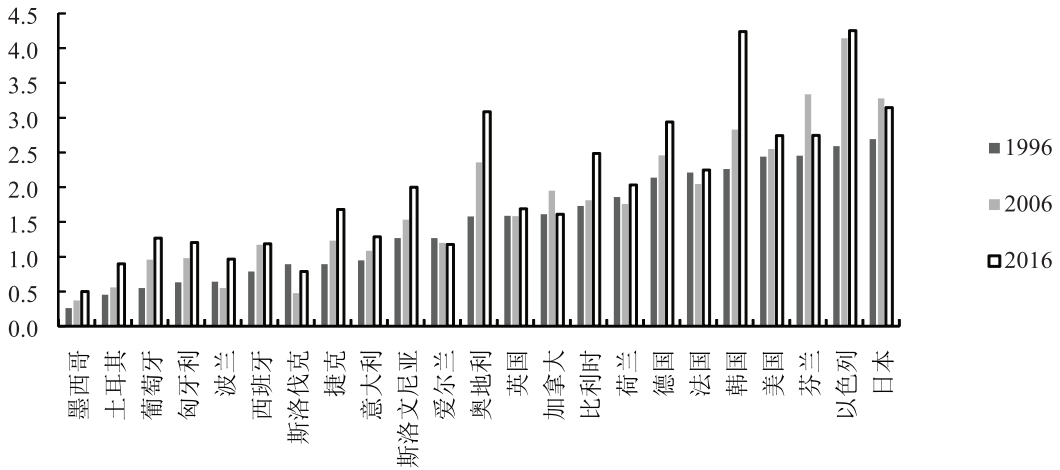


图 2 1996—2016 年 OECD 国家 R&D 投入强度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 OECD 国家 R&D 投入—产出特征分析

考虑各国 R&D 投入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分布情况，本文进一步将 R&D 投入与产出绘制到一张图中进行比较分析（见图 3）。^① 图 3 反映了 OECD 国家 R&D 投入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分布情况。本文以均值为界将这些国家分成不同的“投入—产出”区域，结果显示已有国家可被分成三种类型：其中美国、德国、瑞典、日本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国家，即 R&D 投入与创新产出均保持较高的水平；芬兰、韩国、新加坡属于高投入、低产出的国家，这些国家虽然 R&D 投入很高但是创新产出却很低；爱尔兰、冰岛、英国、西班牙属于低投入、高产出的国家，这些国家以低 R&D 投入、得到较高的创新产出。在第四部分本文将具体考察这些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以期为我国提供启示与借鉴。

^①数据来源：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和会议委员会、经济总量数据库，<http://www.ggdc.net>。最新数据更新至 201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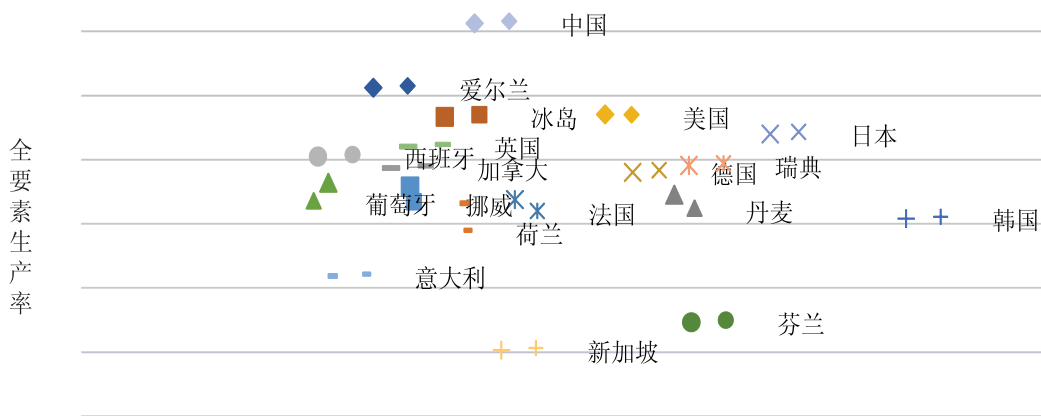


图 3 主要 OECD 国家 R&D 投入与产出的分布

二、主要 OECD 国家的投入—产出机制分析框架

从 R&D 投入到最终创新产出是一个多环节传导的过程。为了深入剖析发达国家 R&D 投入—产出特征，我们首先构建了有关“R&D 投入—产出”效率评价框架，并在这一框架内进行国际比较分析。构建“R&D 投入—产出”效率评价框架有助于对区域创新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因为一个好的创新体系不仅要的最终产出结果进行激励，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机制设计推动资源在创新体系的各个阶段进行高效地分配与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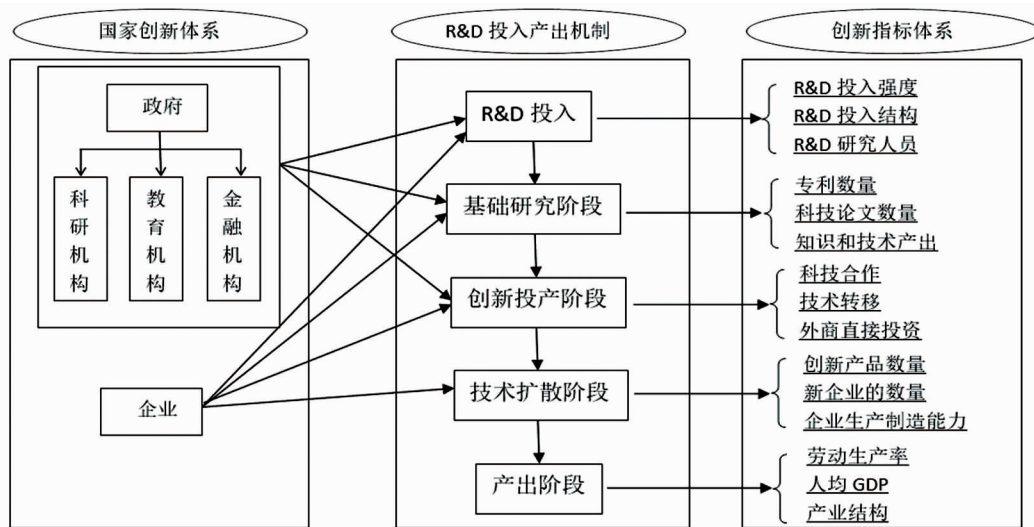


图 4 “R&D 投入—产出”效率分析框架

我们构建的“R&D 投入—产出”效率分析该框架如图 4 所示。该框架的基本逻辑在于以“R&D 投入—产出”机制为核心，将创新指标体系作为评价标准，首先通过量化的方式对各个创新阶段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针对“R&D 投入—产出”各环节发现可能

出现的问题；最后，对应于国家创新体系，判断出哪些政策需要调整。为了有效地度量不同阶段的创新效率，我们为每一创新环节选取了三个代表性指标，指标选取方式与具体说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阶段创新指标的选取及说明

创新阶段	指标选取	指标说明
R&D 投入阶段	R&D 投入强度	以 R&D 投入占 GDP 的比重进行衡量。
	R&D 投入结构	以 R&D 投入中来自企业的比例进行衡量。
	R&D 研究人员数量	R&D 研究人员是指参与新知识、新产品、新流程、新方法等的专业人员。
基础研究阶段	专利数量	以专利申请数进行衡量。
基础研究阶段	科技论文数量	指在物理、生物、化学、数学、临床医学、生物医学研究、工程技术等科学和工程类文章数量。
	知识和技术产出	以商标申请数进行衡量，商标申请是指向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机构提交的商标注册申请，用于识别某一特定个人或企业生产或提供的货物或服务的特殊标志。
创新投产阶段	技术合作	以与高校展开合作研究的公司占比作为测度科技合作的指标。
	外商直接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生产技术、管理技术，这对创新有很大帮助。
	合作研发	外国与本国合作进行技术研发也是促进本国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以外国居民在本国申请专利数占比作为测度指标专利合作的指标。
技术扩散阶段	创新产品的能力	以高科技的产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作为指标测度。
	新注册企业数量	一个地区的技术扩散网络越发达，越有利于催生新企业的诞生，本研究以新注册企业占比作为测度技术扩散能力的指标之一。
	企业生产制造能力	以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企业生产制造能力的指标。
创新产出阶段	人均 GDP	GDP 指标是衡量一国宏观经济绩效最重要的指标，为了排除人口规模对 GDP 的影响，本文采用人均 GDP 作为衡量 R&D 产出的指标之一。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一国产量在一定时间内国民经济中产出与各种资源要素总投入的比值，用以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产业结构	以高技术产品出口在全部制造业出口的占比作为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指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OECD 数据库；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来自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和会议委员会网站。

三、主要 OECD 国家 R&D 投入—产出特征分析

在第二部分提出的分析框架内，我们结合 OECD 主要国家的 R&D 投入—产出特征，选取具有不同投入—产出特征的三类国家进行深入剖析，分别是：以美国、瑞典作为高投入、高产出的典型国家；以爱尔兰、法国为低投入、高产出的典型国家；以芬兰、韩国作为高投入、低产出的典型国家。通过对 3 组、6 个具有代表性的 OECD 国家的各创新环节进行分析，总结梳理不同国家创新发展经验，以期对提高我国 R&D 投入—产出效率提供借鉴。

（一）低 R&D 投入、高经济产出国家的发展经验

1. 爱尔兰

作为 OECD 国家中创新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爱尔兰在创新发展方面最主要的特征是通过较低的 R&D 投入创造出了较高的产出（见图 5）。虽然缺乏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成果，但是完善的技术扩散网络与创新投产机制使得爱尔兰能够克服自身的缺陷，其全要素生产率在 OECD 国家中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

爱尔兰在创新投产与技术扩散环节表现非常突出，这得益于当地良好的技术引进制度、完善的技术扩散网络。^① 爱尔兰十分注重通过跨国公司引进先进技术与资本，通过跨国企业用户与本地供应商之间的互动，促进新技术、新知识的传递，进而提高本地供应商的效率与竞争力。为了吸引跨国公司的进入，爱尔兰政府实施了大量的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政策，目前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仅为 12.5%，远低于英国和西班牙的 30%、美国的 40%。低税率有效地吸引了跨国公司的进驻，目前世界十大科技公司中有 8 家落户爱尔兰。此外，爱尔兰还具有发达的技术扩散网络，为促进科技成果的应用与转化，爱尔兰政府投资建立香浓开发区，^② 形成了独特的“香浓知识网络”。该网络依托高等院校的知识和科研设施，政府通过搜寻公共和私人资助资源、建立企业国际联系网络、开辟国际市场和合作渠道等方式为中小企业搭建技术合作网络，支持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本文测度了 6 个代表性的 OECD 国家在不同阶段的创新情况，其中每一阶段由三个不同指标简单加权计算得到（指标体系见表 2）。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每一阶段的排名情况绘制了各国创新蛛网图，用以测度各国在不同创新阶段的表现。根据数据的可得性与

^①杨志军：《爱尔兰依靠创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和做法》，《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4 年第 4 期，第 72~76 页。

^②权衡、孙亮、黎晓寅：《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经验与启示——印度、爱尔兰、芬兰、以色列比较研究》，《学习与实践》2010 年第 4 期，第 15~22 页。

完整性，我们计算的是 2013 年各国创新情况，我们认为发达国家的历史数据同样可以客观反映出该国的创新路径，值得我们借鉴。图 5~图 10 中“1”“2”“3”“4”“5”分别代表“R&D 投入”“基础研究”“创新投产”“技术扩散”“创新产出”五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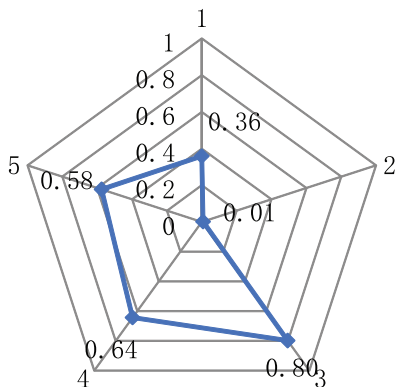


图 5 爱尔兰创新发展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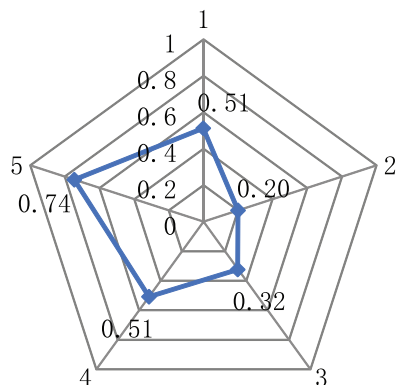


图 6 法国创新发展情况

2. 法国

在 OECD 国家中，法国的 R&D 投入并不算多，属于中等水平。与之相比，法国的最终创新产出却名列前茅，特别是法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仅次于美国，高于日本、德国、英国等传统创新强国（如图 6）。^① 法国政府在促进产学研转化以及打造创新网络方面不遗余力。^② 2005 年 7 月法国提出在全国建立专业化“竞争点”。结合当时的创新发展基础，法国政府确定了包括微电子与通讯、生物技术、纳米科技等行业在内的 67 个竞争点。同时根据各区域发展积累的优势与资源特征，法国政府不断加强创新资源的积聚和集中，把研究机构、大学、企业连成有效的创新网络，激活地方创新潜力。^③ 此外，为提升国际竞争力，法国还出台了竞争力集群政策，^④ 该政策致力于整合区域内企业、研发、教育培训等资源，通过协同创新的方式提升企业技术竞争力、分担研发风险，促进研发成果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化为产品，及时推向市场。

（二）高 R&D 投入—高产出的国家

1. 美国

美国的科技创新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不容质疑，其创新体系呈现高投入、高产出的特

①黄宁燕、孙玉明：《法国创新历史对我国创新型国家创建的启示》，《科技与管理》2009 年第 3 期，第 89~98 页。

②王晓辉：《法国高校协同创新政策与实践》，《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 年第 8 期，第 46~53 页。

③谷斌：《面向国家创新的知识信息网络构建与服务组织研究》，武汉大学学位论文，2006 年。

④法国竞争力集群官网，<http://competitivite.gouv.fr/politique-des-poles-471.html>。

点(如图7)。在R&D投入环节,美国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研发投入总量居世界第一。^①在基础研究阶段,美国拥有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专利与科技论文数量都是世界第一。此外,得益于高效的产、学、研转化机制,以及区域创新产业集群,美国在创新投产以及技术扩散阶段都有良好的表现,这些都为全要素生产率长期保持高水平奠定了基础。^②美国在创新投产阶段与技术扩散阶段良好的表现得益于其高效率的产学研转化机制与技术扩散网络。在OECD国家中,美国的高校与企业之间有着很强的合作关系。美国大学能够长期支持各种基础研究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与企业的合作,通过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的许可、研究区的广泛发展等途径,大学获取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这些经济效益绝大多数在回到大学内部之后再次以各种研究与创新项目的形式得到分配,进一步促进了大学创新发展以及更多的科学研究。

此外,美国还致力于发展规模化的创新产业集群。^③联邦政府采取多种政策鼓励产业创新的计划和项目,通过在各个产业部门中建立大型研发联合体,克服单个企业面临的技术挑战,^④使创新活动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协作和知识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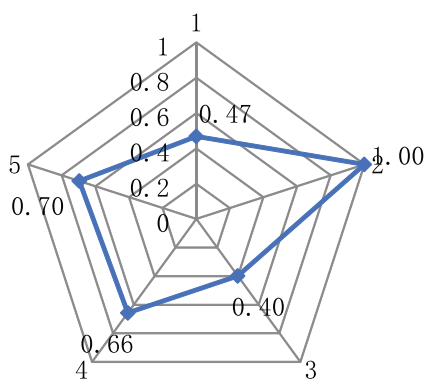


图7 美国创新发展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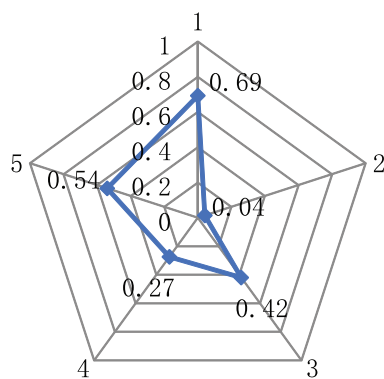


图8 瑞典创新发展情况

2. 瑞典

瑞典的创新发展有高投入、高产出的特征。瑞典在基础研究阶段的成果较少,但是得益于强有力的技术扩散网络以及良好的产学研投入转化机制,其全要素生产率始终维

①黄军英:《美国创新创业政策研究及借鉴》,《科技与经济》2017年第2期,第31~35页。

②王志强:《美国国家创新系统发展中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學刊》2011年第3期,第137~146页。

③田鸣、张阳、唐震:《典型国家创新创业发展模式研究及启示》,《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年第4期,第3~16页。

④Atkinson R D. Understanding the U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Washingto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 2014.

持着较高的水平（如图 8）。在瑞典，拥有与高校之间合作关系的企业比例高达 45.9%。1998 年瑞典政府颁布规定：大学的使命除了教育和研究职能外，还要参与社会环境建设、向外界传播学术研究信息、促使公众获取相关科研成果。这项制度有力地促进了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成果的产业化，93% 的瑞典生物技术企业曾与大学有过合作。^① 此外，瑞典还有许多私营或国有企业联手与学术团体合作，目的是共同开发新的产品、服务项目和运行模式，从而为可持续发展作出长远的贡献。^② 此外，瑞典还有具有高效的技术扩散网络，瑞典高技术产品产值占比为 14.69%，新注册企业数占比为 6%，高技术企业形成率与存活率在 OECD 国家中始终处于较高的水平。瑞典的高效技术扩散网络得益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它们为创新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有力地促进了新技术的传播。

（三）高 R&D 投入—低产出的国家

1. 芬兰

芬兰的创新体系呈现高投入、低产出的特征（见图 9）。受产业结构单一、技术扩散网络传导不畅以及全球化的影响，芬兰的创新产出水平较低，且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芬兰国家创新系统的劣势在于，大学、研究机构、以及中小企业都过度依赖于一个产业，甚至可以说一个企业，当遭遇外生冲击时，很容易引发当地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诺基亚曾是芬兰经济的支柱，在整个芬兰创新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与之相应的是，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在芬兰也十分发达。较为单一的产业结构为芬兰的基础研究带来了不利影响：一方面拥有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教育或实践知识的人群比重很高，而其他实用型专业则缺乏经过职业训练的人才；另一方面，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过热也导致其他领域特别是基础研究在青年人群中声誉较低，其结果是芬兰严重缺少接受过技术、计算机或物理科学方面的高等教育人才，从长远上看制约了芬兰的发展。

2. 韩国

韩国在创新发展方面具有高投入、低产出的特征。其 R&D 投入强度在 OECD 国家中名列前茅。然而，高 R&D 投入并没能有效转化为创新产出，韩国的创新产出在 OECD 国家中始终处于中低水平（见图 10）。韩国创新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在于“强大的大型企业与弱小的小型企业”并存。一方面，由于实力相差悬殊，优质的资本、技术资源大都流向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很难寻找到具有竞争力的本土供应商；另一方面，隶属于财阀的大型企业阻碍了不同企业集团之间的学习交流，在同一集团内部，基于分包关

^① 王海燕、梁洪力：《瑞典创新体系的特征及启示》，《中国国情国力》2014 年第 12 期，第 67～69 页。

^② 余崇武：《瑞典的国家创新体系》，《华东科技》2011 年第 11 期，第 68～69 页。

系的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会积极地合作交流，而跨集团的合作交流则存在着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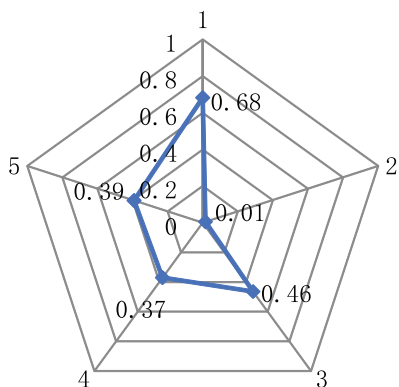


图9 芬兰创新发展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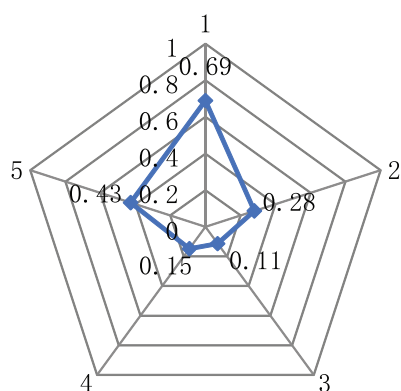


图10 韩国创新发展情况

四、OECD 国家发展创新体系的国际经验借鉴

通过对主要 OECD 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与评估，本文总结梳理了主要 OECD 国家 R&D 投入—产出各环节的特征（见表 2）并得到以下启示。

（一）R&D 投入重在结构而非数量

R&D 投入水平的高低与最终的创新产出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低 R&D 投入国家如爱尔兰、法国仍然具有较高的创新产出；而高 R&D 投入国家如芬兰、韩国其创新产出却表现不佳。这意味着仅仅从数量上提高 R&D 投入并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最终创新绩效的核心要素。R&D 投入结构以及其他创新环节的机制设计对最终的产出至关重要。

表 2 主要 OECD 国家创新情况评估

	R&D 投入	基础研究	创新投产	技术扩散	产出
爱尔兰	低	低	高	高	高
法国	中等	中高	高	高	高
瑞典	高	低	高	高	高
美国	高	高	高	高	高
芬兰	高	低	中等	低	低
韩国	高	低	低	低	低

从 R&D 投入结构上看，OECD 国家的 R&D 投入多以企业为主导，这有利于创新成果的转化，也有助于企业创新产品更加适应市场需求。还需注意的是，过度依赖于单一

的企业（如韩国）、单一产业（如芬兰）会导致创新体系的脆弱性，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外部不确定性将可能对一国创新体系带来严重打击。在这方面，诺基亚破产的案例值得我们借鉴。此外，爱尔兰的案例表明，对于小国来说，外商投资至关重要。跨国公司的引入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更主要的是技术支持。这有利于弥补其在自然资源以及基础研究方面的先天不足。

（二）基础研究水平的高低对最终产出并非决定性的

一个国家基础研究的水平与其历史息息相关，特别是教育体系、文化等等对其影响很大。因此，想要提高基础研究水平，并非仅仅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就能够实现的。在主要 OECD 国家中，通过提高基础研究水平实现提高创新产出的国家大多都是历史较为悠久的创新强国，如美国、德国、英国，这些国家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研究基础，在基础研究领域有着天然的优势。对于如爱尔兰、芬兰、瑞典等小国来说，难以较快地提高基础研究水平。但是教育体系仍然大有可为，比如在爱尔兰、瑞典，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职业技术人才，这为创新产业发展提供了所需的人力资源。此外，努力提高基础教育阶段的质量也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的素质，这将大大提升其学习与模仿能力，比如在韩国，虽然原创性的科研成果以及专利数量并不突出，但是该国培养出的人才能够迅速学习并掌握国外新的技术，这也有利于本国创新体系的完善与进步。

（三）高效的产学研转化机制对创新产出至关重要

OECD 国家的经验表明，高效的产学研转化机制对最终的创新成果是至关重要的。在创新投产阶段表现良好的国家，如法国、美国、瑞典、爱尔兰，其最终的创新绩效都较好；而与之相反，在创新投产阶段效率较低的国家，如韩国、芬兰，其最终的创新产出也相对较低。这就意味着，如果短时间内无法在基础研究阶段实现赶超，那么着力疏通产学研转化机制、提高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也可以实现最终创新绩效的提高。

在这方面，可以采取的方法包括：一是重视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如瑞典政府在新大学规章中明确要求大学发挥第三职能，即大学要向外界传播学术研究信息，使公众及时获取相关科研成果，以此促进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又如爱尔兰采取的以商业为导向的技能开发教育，顺应了市场需求，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本上的支撑；在美国，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大学获取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而这些经济效益绝大多数在回到大学内部之后再次以各种研究与创新项目的形式得到分配，进一步促进了大学创新发展以及更多的科学研究。二是直接通过跨国公司实现技术引进，如爱尔兰政府采取大量的税收优惠与补贴政策吸引跨国公司，以跨国公司与供应商之间互动提高本土效率

和竞争力。三是构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广泛合作机制。如在瑞典，许多私营企业、国企联手与学术团体合作，目的是共同开发新的产品、服务项目和运行模式，从而为可持续发展作出长远的贡献。

（四）完善的技术扩散网络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OECD 国家的经验还表明，高效的技术扩散网络的建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至关重要。与创新投产机制类似，拥有良好技术扩散网络的国家均有着较高的创新产出，无论该国前期 R&D 投入情况以及基础研究水平如何。相比之下，如果一个国家的技术扩散网络效率不佳，那么即便该国拥有较高的 R&D 投入，最终的创新绩效均较低。这就意味着，R&D 投入以及基础研究阶段的劣势同样可以通过构建高效的技术扩散网络予以弥补。

在构建技术扩散网络方面，美国、瑞典等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打造创新产业集群。比如美国，通过打造硅谷、硅路以及圣地亚哥等创新产业集群，让创新活动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协作和知识分享，这有利于创新成果的应用与扩散，从而提高创新效率。二是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于创新在其他经济部门的扩散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提供咨询服务与孵化活动方面。如瑞典政府兴建了大量的科技园，科技园不仅能够快速地反映技术与市场需求，更主要是通过提供咨询服务以及孵化机制，帮助新企业获得资金，并对其进行创业发展训练和专业指导，使其最终进入国内或国际市场。高效率的技术扩散网络使得瑞典高技术企业形成率及存活率都保持着较高的水平。

五、关于构建我国创新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推动创新型企业集群化

有效的孵化服务体系能够极大地推进知识的科技化与创新的产业化，在建设创新创业生态体系的过程中，要加强对企业孵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具体来说，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首先，完善孵化体系建设的政策体系。加强孵化体系的整体规划，创新孵化体系模式，鼓励支持科研院校、科技园区以现有存量土地建设企业孵化器，政府提供税收等政策优惠。其次，加强孵化体系的有效性，促进多方要素聚集。加强创新创业生态体系中多方要素的聚合，统筹产学研三者的集聚与平衡。企业孵化服务体系涉及创新创业的诸多领域，包括对创新项目的管理、对创新成果的转化、对创新企业的指导等。我国应当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在政府支持的基础上，鼓励涉及不同领域的营利性企业、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自主发展，以服务型企业、研究会等共同构成有效的企业孵化服务体系。

（二）强化政府服务职能

政府在创新创业生态体系的建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建设创新创业生态体系过程中需要切实履行服务职能。首先，政府应避免对创新创业活动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应给予新事物一个较为自由开放的发展空间。创新创业需要一定自由的环境，政府应积极采取政策为创新创业营造有利环境，又要避免行政干预降低创新创业的活力。其次，政府要不断强化自身的服务职能，制定优惠政策，提供必要的资助补贴，优化各种资源的调配，为城市的创新创业搭建平台。以政府为主导，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使政府成为城市创新创业生态体系建设的积极主导者、参与者与支持者。

（三）激励企业增加 R&D 投入

目前，虽然近年来我国 R&D 投入强度不断提升，但仍有继续提高的空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 R&D 投入强度仍然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纵观发达国家和创新型国家，均围绕激励企业增加 R&D 投入，构建了包括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体系。在各种激励政策中，对企业 R&D 投入给予税收优惠、降低企业 R&D 成本是最常用的办法。如爱尔兰规定用于企业 R&D 活动的建筑物和机器设备在购置费用发生当年全部在税前扣除。我国也可以效仿此法，对高 R&D 投资的企业提供相应的补贴或其他优惠措施，以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参考文献：

1. 谷斌：《面向国家创新的知识信息网络构建与服务组织研究》，武汉大学学位论文，2006 年。
2. 廖伟：《中国与 OECD 国家 R&D 投入比较研究》，《特区经济》2010 年第 8 期。
3. 卢方元、靳丹丹：《我国 R&D 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1 年第 3 期。
4. 黄军英：《美国创新创业政策研究及借鉴》，《科技与经济》2017 年第 2 期。
5. 黄鲁成：《关于 R&D 产出的国际比较与评价研究》，《科技管理》2004 年第 4 期。
6. 黄宁燕、孙玉明：《法国创新历史对我国创新型国家创建的启示》，《科技与管理》2009 年第 3 期。
7. 田鸣、张阳、唐震：《典型国家创新创业发展模式研究及启示》，《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 年第 4 期。
8.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9. 权衡、孙亮、黎晓寅：《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经验与启示——印度、爱尔兰、芬兰、以色列比较研究》，《学习与实践》2010 年第 4 期。

-
10. 王海燕、梁洪力：《瑞典创新体系的特征及启示》，《中国国情国力》2014年第12期。
 11. 王晓辉：《法国高校协同创新政策与实践》，《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年第8期。
 12. 王志强：《美国国家创新系统发展中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11年第3期。
 13. 杨志军：《爱尔兰依靠创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和做法》，《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4年第4期。
 14. 余崇武：《瑞典的国家创新体系》，《华东科技》2011年第11期。
 15. Atkinson R D. Understanding the U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Washingto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 2014.

责任编辑：谷 岳

(上接第 59 页)

(四) 要以人民需求为中心推动监管政策的适应性变革

在共享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澳大利亚政府也曾经历几年的对抗，但是面对强烈的市场需求，共享经济依然保持强劲生命力。对此，澳大利亚政府选择了客观评估共享经济的利弊，并公开支持共享经济的发展，为百姓创造更多增收和消费选择，同时加强对用户权益的保护。我国监管政策的调整，也必须紧紧围绕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为中心，强化安全、服务、用户权益等社会性监管，放松甚至取消数量、价格等各类经济性监管，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

参考文献：

1. 杨帅：《共享经济带来的变革与产业影响研究》，《当代经济管理》2016年第6期。
2. [美] 道格拉斯·诺思等：《暴力的阴影：政治、经济与发展问题》，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3.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Digital Disruption: What do governments need to do? 2016.
4. Tanya Carney et al. The Dimensions of Insecure Work: A Fact book, 2018.

责任编辑：沈家文

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改革和中国的作用

黄永富

摘要：本文首先概述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发展现状和中国开展的国际发展援助，接着指出了国际发展援助体系面临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最后讨论中国在构建新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可以发挥的作用。本文指出，中国应努力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适应的伦理体系，充分结合和运用现有的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和积极参与三方援助合作。

关键词：国际发展援助 三方合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黄永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

随着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不断抬头，美国避开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挑起贸易和科技争端，几次退出全球多边体系，使全球多边体系面临失序的风险，包括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全球多边体系和增强全球合作的主要机制。而且，国际发展援助合作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为己任，致力于服务全球公共利益，与对外投资贸易合作不同，相对而言利益冲突较少。这一特点使越来越多的全球多边体制改革正着眼于国际发展合作，发展新的知识和话语体系。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改革的方向在哪里？中国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一、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综述

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是维护全球多边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已逐步形成了完善的体系，包括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多边开发银行的发展援助（比如世界银行、地区性

发展银行如亚洲发展银行等)、南南合作(包括三方合作)、混合金融等。本文主要概括官方发展援助、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发展情况。

(一) 官方发展援助

从二战后到 21 世纪初,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一直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南北结构性关系,其中发达国家既是双边也是多边发展援助的主要贡献者。联合国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20 个世纪 60 年代,联合国发展大会提出了一个衡量发达国家履行国际发展援助义务的标准,即发达国家需要拿出 0.7% 的国民总收入(GNI)的官方发展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这一标准被 2002 年召开的联合国发展融资国际会议再次强调。1961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设立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或称作“援助国俱乐部”)。DAC 是国际社会负责协调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ODA)的核心机构,目前拥有 29 个成员,包括 28 个发达国家成员国和欧盟。OECD 对官方发展援助有具体规定,即优惠贷款必须要有 25% 的赠款成分才能被称为是官方发展援助。

表 1 2001—2017 年 OECD 发展援助委员会官方发展援助规模

年份 国家	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						
	2001—2002 平均	2006—2007 平均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澳大利亚	0.25	0.31	0.33	0.31	0.29	0.27	0.23
奥地利	0.3	0.48	0.27	0.28	0.35	0.42	0.3
比利时	0.4	0.46	0.45	0.46	0.42	0.5	0.45
加拿大	0.25	0.29	0.27	0.24	0.28	0.26	0.26
捷克	0.06	0.11	0.11	0.11	0.12	0.14	0.15
丹麦	1	0.8	0.85	0.86	0.85	0.75	0.74
芬兰	0.34	0.39	0.54	0.59	0.55	0.44	0.42
法国	0.34	0.42	0.41	0.37	0.37	0.38	0.43
德国	0.27	0.36	0.38	0.42	0.52	0.7	0.67
希腊	0.19	0.17	0.1	0.11	0.12	0.19	0.16
匈牙利		0.1	0.1	0.11	0.13	0.17	0.11
冰岛	0.14	0.27	0.23	0.22	0.24	0.28	0.28
爱尔兰	0.37	0.55	0.46	0.38	0.32	0.32	0.32
意大利	0.18	0.19	0.17	0.19	0.22	0.27	0.3
日本	0.23	0.21	0.22	0.2	0.2	0.2	0.23
韩国	0.05	0.06	0.13	0.13	0.14	0.16	0.14
卢森堡	0.78	0.91	1	1.06	0.95	1	1
荷兰	0.82	0.81	0.67	0.64	0.75	0.65	0.6

续表 1

国家 \ 年份	占国民总收入 (GNI) 的比重						
	2001—2002 平均	2006—2007 平均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新西兰	0.24	0.27	0.26	0.27	0.27	0.25	0.23
挪威	0.85	0.92	1.07	1	1.05	1.12	0.99
波兰	0.03	0.1	0.1	0.09	0.1	0.15	0.13
葡萄牙	0.26	0.22	0.23	0.19	0.16	0.17	0.18
斯洛伐克	0.03	0.1	0.09	0.09	0.1	0.12	0.13
斯洛文尼亚		0.12	0.13	0.12	0.15	0.19	0.16
西班牙	0.28	0.34	0.17	0.13	0.12	0.34	0.19
瑞典	0.8	0.98	1.01	1.09	1.4	0.94	1.02
瑞士	0.32	0.37	0.46	0.5	0.51	0.53	0.46
英国	0.31	0.43	0.7	0.7	0.7	0.7	0.7
美国	0.12	0.17	0.18	0.19	0.17	0.19	0.18
总额	0.22	0.28	0.3	0.3	0.3	0.32	0.31

数据来源：OECD 网站。

根据 OECD 的统计资料和其最新的《2018 年发展合作报告》，传统的 OECD-DAC 成员国中，只有丹麦、卢森堡、挪威、瑞典、英国 2013 年以来保持在 0.7% 以上。近年来，德国提高了对外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2016 年达到了 0.7% 的水平；比利时和瑞士保持在 0.5% 左右的水平；美国一直保持在 0.18% 至 0.2%。2013 年以来，28 个传统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仅占国民总收入平均比重为 0.3%~0.32%（如表 1 所示），远低于联合国提出的 0.7% 门槛，尚需要巨大的努力。

（二）南南合作的发展现状

南南合作可以追溯到 1955 年的万隆会议，以及 1961 年发起的不结盟运动和 1964 年成立的 77 国集团。1978 年联合国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会议，并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行动计划》(BAPA)，南南合作在国际发展领域成为正式概念和框架。40 多年来，在联合国的支持、引导下，以技术和经验分享为主要特征的南南合作得到蓬勃发展，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不断深入。近年来，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等为代表的南方国家积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其强劲发展正在重塑国际发展援助的大格局，改变南北国家之间、南南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国际关系。根据 OECD 最新的《2018 年发展合作报告》，截至 2017 年，除了 13 个非 OECD-DAC 成员国向其报告援助规模和

投向等相关的数据（包括阿塞拜疆、保加利亚、爱沙尼亚、以色列、哈萨克斯坦、科威特、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俄罗斯、泰国、土耳其、阿联酋），还有 10 个非 OECD-DAC 成员国估计也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援助（包括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卡塔尔、南非）。

国际发展“南方化”的提法悄然出现。这一方面反映了南方国家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积极作为和重要性的上升，以及南南合作的经验不断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并影响北方国家的国际发展实践（比如北方国家趋于减少赠款比例、注重合作双赢等），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北方国家的别有用心，他们呼吁新兴国家承担更多全球责任的呼声日益强烈（北方国家一方面呼吁南方国家多承担责任，另一方面指责国际发展“南方化”是所谓的“逐底竞争”，必然降低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标准，侵蚀现行全球发展援助体系）。由于南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程度处于较低水平，南南合作在国际发展援助总量中的占比仍然较低，10%左右。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其实是在自身财力紧张、物资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始终致力于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向经济困难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技术援助，并逐步扩大援助范围。自 2000 年以来，中国免除最不发达国家所欠债务至少 80 笔。2019 年 3 月 20—22 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强调，南南合作不能取代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及其相应的国际责任，尽管南南合作对于缓解全球不平等、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社会性别平等、丰富多边机制等五个方面都具有突出贡献。

（三）三方合作的发展现状

三方合作通常指北方援助国和南方援助国共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但也泛指政府、国际组织、社团、企业、慈善家（比如梅琳达及比尔·盖茨基金会）等共同参与提供发展援助的合作形式。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积极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审视新兴经济体作为“发展伙伴”或“发展行动者”在国际发展合作体系中的角色和贡献，联合国等国际多边机构对这一新动向也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关注，纷纷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各自机构的发展战略。比如 2012 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设立“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决议，替代原有的“南南合作专门单元”，专门负责协调全球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事务。很多国际多边机构，包括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多边机构也制定各自的三方合作战略，通过提供资金、培训和管理技术等形式支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符合三方的述求。对于北方国家来说，开展三方援助合作，既有利于将南南合作纳

入国际发展援助体系，起到缓解国际发展融资的压力和弥补援助资金缺口的作用，以及学习南南合作中互利共赢的经验和做法，也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南方国家的援助需要，以提供更适合发展中国家需求的援助支持。对于南方援助国来说，与北方国家开展援助合作可以与北方国家建立起有效的交流和合作网络，学习他们多年积累的国际化经验，并弥补南南合作在资金、管理和技术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对于南方受益国，因为三方合作意味着援助资源的多元化，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管理和技术等方面支持，更快缩小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他们对于北方国家参与三方合作持欢迎和开放的态度。

三方合作也存在弊端。比如，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援助方具有非常不同的资源、优势和习俗等，角色定位和责任分工的协调并不容易。于是，谈判成本大幅增加，管理和监督程序变得复杂，执行和运作效率反而低下。

根据 OECD 的《2018 年发展合作报告》，到 2017 年，大多数 OECD-DAC 成员国都参与了三方合作，覆盖了农业、渔业、教育、林业、治理、健康、工业等不同领域，另外，非 OECD-DAC 成员国包括阿根廷、阿联酋、以色列、塔吉克斯坦、土耳其、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南非等也非常积极地与北方国家一道提供三方合作援助，并将参加三方合作作为提升本国在各自所在区域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二、中国的国际发展援助概述

中国于 2018 年初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旨在从政策、规划、协调、管理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充分整合和完善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工作，改变以往对外援助的项目碎片化、管理条块化等状况。

（一）南南合作

南南合作是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 40 年里，中国一直是南南合作坚定的支持者、有力的贡献者和积极的参与者。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努力克服自身发展问题的同时，仍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在如下几方面不断促进南南合作的深化发展，大大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大胆引领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话语权。中国陆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互惠共赢等理念，突出强调政治上不干预、尊重国家需求导向等原则，为全球包容性发展提供公共产品、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勇于开展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中国独资或合资倡议设立新的发展金融机构，比如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渠道，丰富和增强了南南合作的内涵和生命力。在新金融机构的支持下，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助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共商、共建、共享，在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教育、农业和环境等领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大型南南合作项目，积极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互惠共赢等理念。

大力支持理论和实务的研究。中国政府积极引导和支持国内高校或研究智库，如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南南农业合作学院（“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等，参与“一带一路”南南合作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和南方智库联盟，与其他北方和南方国家的研究机构和人员一道，共同深入探讨南南合作的内涵、特点、公共知识、合作机制、监测机制和评估机制等。

积极鼓励多元参与。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和鼓励国内的私营部门和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走出去”，积极参与中国在亚非拉开展的南南合作项目，为构建新型南南国家关系不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老中青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高科技专家、矿业或农业等领域的高级技术专家，还有技术员、工人和私营企业家等正频繁来往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覆盖基础设施、高新技术、矿业、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

（二）三方合作

与西方发达援助国开展项目式的三方合作。对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方合作，中国一直持积极尝试的态度，努力丰富和拓展对外援助形式。中国先后以发展伙伴的身份积极参加 OECD-DAC-中国工作组的相关合作项目，比如农业领域的中国—英国—马拉维水产发展项目、中国—英国—乌干达木薯发展项目、中国—美国—东帝汶农业项目等。

与全球性和地区性多边机构开展三方合作。中国积极与全球性和地区性多边机构开展更加机制化、规范化和长期的三方合作，包括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系统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发基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比如，根据《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报告，截至2012年，中国向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西非开发银行、加勒比开发银行等地区性金融机构累计捐资约13亿美元。2017年5月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承诺在未来三年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

此外，中国还尝试和私人部门开展三方合作，比如和著名慈善机构比尔·盖茨基金

会在莫桑比克和赞比亚开展三方合作。

通过与北方援助国、多边组织和私人部门等开展三方合作，中国对合作机构的影响力大幅提升，对相应领域全球南南合作的影响力也大幅提升。随着对三方合作认识的不断深入，中国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不断为对外援助实践增添新的活力。

三、国际发展援助面临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

（一）西方伦理体系遭受质疑

西方的双边对外援助以及由西方主导的全球性或区域性多边发展援助组织一直以来深受西方伦理体系的影响。不可否认，西方尤其是欧盟的对外援助对于推动受援发展中国家脱贫、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功不可没。但是，西方的对外发展援助政策一直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和双边关系，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旨在通过协调援助和合作方案，向受援国推行其资源、贸易等相关的政策纲领，或通过援助中附带政治条件，向受援国输出“民主、自由、宪政”等价值观。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出现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以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战略和英国脱欧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大国呈上升趋势，基于利他和道义导向的援助理念逐步受到利己主义理念的侵蚀，西方发达国家一直面临着援助有效性的挑战，提供援助的意愿出现大幅下降。其中，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甚至将其原本独立的双边国际发展署撤除或并入了相关部委。

相比之下，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一直在自身条件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积极承担国际援助义务，而且一直坚持“互相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诺、互利共赢”的原则，和“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的方针政策。这些原则和方针政策深受受援国欢迎，却饱受西方的诟病，批评中国的援助助长了受援国的腐败气焰，抹黑中国的对外援助是新殖民主义，批评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为了攫取资源，不遵循既有国际规则，不参与国际合作等等。中国大力推动的南南合作所体现的伦理体系和道德标准能否超越现行主导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西方伦理体系？

（二）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冲击

在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的压力下，国际多边援助体制面临转型、甚至失序的风险。比如，在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鼓动下，世界银行将“发展中国家的标准”设定为人均 GDP 低于 6895 美元，并据此认定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再满足

获得发展援助贷款的条件，而且还需承担相应国际责任。2019年4月17日《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已要求亚洲开发银行停止对中国提供新融资。日本早在2008年就彻底终止对华日元贷款。巴西在WTO框架内宣布放弃其“发展中国家”身份，这对广大的新兴经济体带来强大的冲击波。新形势下，国际多边援助体制应该如何改革？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GPEDC）应该如何构建？新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包含哪些规则和架构（包括一些具体领域的问题，比如如何更好地发挥发展合作中私有部门的作用？如何提升农业领域、卫生领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水平以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

（三）一些地区的发展援助正在成为潜在的冲突点

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和欧盟都在调整对非援助政策，澳新两国也开始重视在太平洋地区的发展援助等等，比如2018年12月13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传统基金会提出的美国“新非洲战略”，即美国将优先处理与非洲的经济联系，增加经济投入以重新拉近与非洲的关系，为美国企业制造机会。美国等在发展与这些地区的援助合作时，不断指责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破坏环境、掠夺资源、造成债务危机和腐败等，鼓吹西方的“公平”“透明”等商业原则。这些政策调整势必影响我国在该地区的援助合作，并使该地区的对外援助出现持续竞争甚至冲突的局面。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是该融合还是独立？三方合作和南南合作的新模式、新形态、未来走向如何？需要哪些新的架构和规则予以规范？

四、中国的作用

（一）努力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适应的伦理体系

当前的国际援助体系迫切需要一套适应新形势的新规则和新伦理体系。中国对外援助是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效载体，尤其需要探索和建立一套与此理念相适应、超越现有的、又被全球所广泛接受的新的发展援助伦理体系，即提出一套“中国体系”“中国标准”或“中国方案”。这一探索是完全有可行的。最近十多年，中国的对外援助深受受援国的欢迎和好评。很多北方援助国和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都在高度关注并积极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原则、方式和经验，并积极推动与中国的三方合作。受到了中国对外援助方式的影响，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和援助框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一些原则、理念和经验已逐渐被接受，比如追求互利双赢、提供优惠贷款、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等。

（二）充分结合和运用现有的国际发展话语体系

目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有一套与联合国 203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相适应的话语体系，包括绿色、包容、可持续、透明、公平、善治、能力建设、劳工保护、发展有效性、监测评估等。中国需要深入领会现行的发展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探索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发展援助伦理体系才能被全球所广泛接受。中国还需要充分结合这些发展话语体系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舆论宣传、统筹协调，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综合能力，包括用这些发展话语体系做好舆论宣传工作，讲述中国发展历程和南南合作故事，才能深入人心。

（三）积极参与三方援助合作

在新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下，中国除了坚持以南南合作为基础的对外援助战略，还应积极寻求与国际多边机构以及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正式合作，这对于化解潜在冲突、构建新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具有积极作用。虽然三方合作的实践已有不少，但国家层面的三方合作行动计划或战略却很少。中国需要在制度、政策、管理等层面不断创新合作机制、提升合作的规模和范围，不断促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在国际发展的话语体系和实践层面发挥作用，从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具体实践中，对标国际规则，既注重提高援助成效又积极防范腐败滋生，既帮助受援国改进硬件建设又帮助受援国完善相关制度。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4 年 7 月 10 日。
2. Hurley, John, Scott Morris and Gailyn Portelance. *Examining the Debt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CGD Policy Papers (No. 121). Washington, DC: Centre for Global Development, March 2018.
3. OEC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port 2018: Join Forces to leave No One Behind*.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8.
4. OECD. *Triangular Cooperation: Why Does It Matter?* Produced by the Foresight Outreach and Policy Reform Unit, OECD Development Directorate, 2018.
5. United Nations. *Financ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New York, 2019.

责任编辑：沈家文

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基于 108 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

姜惠宸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运用宏观审慎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其有效性已得到广泛认可。与“金融稳定”“系统性风险”领域大量的研究相比，关于宏观审慎政策尤其是对其有效性的研究是非常有限的。本文基于 108 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用系统性银行危机指数度量金融稳定，研究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体系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从全样本视角看，随着宏观审慎工具运用次数的提高，系统性危机发生的概率会有一定程度下降，并且借款人和金融机构导向型的宏观审慎工具也有助于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研究发现不同经济体运用宏观审慎工具的频率不同，新兴市场经济体运用次数最高，发达经济体其次，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最低。从回归结果看，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采用宏观审慎工具体系及细分的工具，发达经济体运用借款人导向型的宏观审慎工具，均有助于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因此，设计防范系统性危机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要做到因地制宜，从而更好地实现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

关键词：宏观审慎政策 金融稳定 跨国面板 系统性银行危机 宏观审慎工具

作者简介：姜惠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后。

一、研究背景

关于宏观审慎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Clement 在国际清算银行（BIS）季度报告中指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前身库克委员会在 1979 年 6 月的会议中形成了

* 本文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 年博士研究生卓越学术基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2018 Academic Excellence Foundation of BUAA for PhD Students）。

宏观审慎思想的萌芽。^①1986 年，“宏观审慎政策”一词出现在 BIS 和十国集团中央银行的研究报告中。在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其内涵逐渐丰富，从融入宏观经济视野的审慎监管模式发展为关注金融体系和支付机制的安全性及稳健性。^②李妍认为，由于当时系统性风险主要集中于银行体系，传统的审慎监管基本能满足金融稳定的需要，因此“宏观审慎”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③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 1999 年构建“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时明确表示了对宏观审慎的关注，将相关因素纳入评估体系。Evans 等人指出，宏观审慎指标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增长、国际收支、通货膨胀、利率与汇率、贷款激增与资产价格暴涨、传染效应等多方面因素。^④中国人民银行何建雄也指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西方国家发生的不同程度的银行危机表明，仅仅依靠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是不够的，应通过“宏观审慎指标 + 微观审慎指标”相结合的方式，来分析金融体系的风险。^⑤李宗怡和冀勇鹏指出，1998 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金融机构为防范风险采取一致行为，将高波动性资产置换为安全资产，结果这一个体层面的“理性”行为加剧了资产价格的下降，并导致市场流动性萎缩，金融机构追求自身安全的行为导致了风险的形成、加剧了危机的恶化，应当实行宏观审慎监管。^⑥正如 Borio 所言，尽管当时关于系统性风险的普遍观点是通过微观审慎确保金融稳定，但考虑到金融危机通常伴随着巨大的宏观经济成本，研究危机起源须具备宏观审慎视角。^⑦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内外学者在金融统计、金融风险预警等领域中引入了宏观审慎分析，开展了一定程度的探索，但宏观审慎领域的研究仍有很大发展的空间。

随着时代发展，宏观审慎的理念变得不断明晰。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等已成为研究热点，与之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在迅速增长，宏观审慎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并得到广泛应用。易纲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迅速开展了宏观审慎政策方面的创新性探索，同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

①Clement P. The term “macroprudential”: origins and evolution. *BIS Quarterly Review*, 2010 (03): 59~67.

②BIS and the central banks of G10. Recent innovations in international banking. *CGFS Paper*, 1986 (04): 1~270.

③李妍：《宏观审慎监管与金融稳定》，《金融研究》2009 年第 8 期。

④Evans, O., Leone, A. M., Gill, M, *et al.* Macroprudential indicators of financial system soundness. *IMF Occasional Paper*, 2000 (04): 1~49.

⑤何建雄：《建立金融安全预警系统：指标框架与运作机制》，《金融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⑥李宗怡、冀勇鹏：《对我国实施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问题的探讨》，《当代财经》2003 年第 7 期。

⑦Borio C. Towards a macroprudenti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2003 (02): 181~215.

策。^① 2019年，宏观审慎管理局成立，牵头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维护金融稳定。^②

目前，研究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文献还是比较有限的，特别是关于宏观审慎政策在实践中的应用是否能够实现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值得进行探索性地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首先对国内外研究的主要思路进行梳理，然后基于跨国面板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进行研究。如今，“宏观审慎政策”已作为调控框架，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此背景下，进行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述评

（一）宏观审慎政策的内涵

关于宏观审慎政策的定义，BIS 总经理 Crockett 对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审慎政策的概念差异进行了界定：微观审慎政策关注的是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性，防范的是个体风险；宏观审慎政策则强调个体金融机构的理性行为从系统层面看可能并非理性（如银行在繁荣期扩张信贷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在衰退期紧缩信贷加剧金融不稳定），着眼于降低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及产生的巨大成本。^③

关于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Borio 认为其直接目标是为了降低金融系统压力，最终目标是避免与金融不稳定联系的产出损失；^④ Caruana 认为其目标是通过处理金融机构间的相互联系与共同的风险暴露、降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从而降低系统性风险。^⑤

根据 IMF 团队 Brockmeijer 等人的报告，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三个核心元素是：第一，识别和监测系统性风险、识别和收集必要数据、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性的风险（如趋势、规模、概率、时机掌握、系统恢复能力）及其优先顺序的持续评估；第二，控制风险并防止风险形成系统性风险的工具集合、工具的使用规则、政策效果评估；第三，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度架构（包括管理机制、职责和透明度、宏观审慎政策与其他公共政策在维护金融稳定上的协调）。^⑥

①易纲：《坚定不移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 不断开创金融事业发展新局面》，《金融时报》2018年12月5日。

②王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上海金融报》2019年3月5日。

③Crockett A. Marrying the micro-and macro-prudential dimensions of financial stability. *BIS speech*, 2000-09-21.

④Borio C., Drehmann M. Towards an operation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stability: “fuzzy” measurement and its consequences. *BIS Working Paper*, 2009 (06): 1~44.

⑤Caruana J. Macroprudential policy: working towards a new consensus. *BIS speech*, 2010-04-23.

⑥Brockmeijer J., Moretti M., Osinski J., et al. Macro prudential policy: An organizing framework. *IMF Policy Paper*, 2011-03-14.

（二）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宏观审慎政策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得到使用，然而关于宏观审慎政策效果评估的文献，目前仍然较少。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1. 理论层面建模

通过理论层面建模的方式，研究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如孙国峰等人指出，由于外汇市场投机性交易者的行为具有强顺周期性，这会加剧外汇市场上汇率的波动幅度，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对汇率进行逆周期调节，避免外汇市场上泡沫的形成。他们构建了限制外汇市场投机交易者借贷总量的宏观审慎管理模型。这种宏观审慎政策属于贷款价值比（LTV）工具。他们通过运用蒙特卡洛模拟对其有效性进行了检验，发现引入权重区间管理的模式（央行仅在特定条件下进行宏观审慎管理的模式）与基准模式相比，效果相当，并且监管成本更低。^①

关于宏观审慎领域的理论建模，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对社会福利等因素的影响。Unsal 认为，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资本流入会带来经济过热的压力并引发通胀，同时还可能诱发金融不稳定，传统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充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他建立了开放经济的 DSGE 模型，发现在金融冲击下，运用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对货币政策形成有效补充作用，从而改进社会福利。^② 许先普和楚尔鸣认为，房价上涨具有“抵押品效应”和“财富效应”。房价上涨时，“抵押品效应”可能会促使居民的住房需求增加，并逐渐形成房价泡沫。他们建立的 DSGE 模型中，中央银行通过降低 LTV 对房地产市场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研究发现 LTV 的引入降低了物价和房价波动，但采用 LTV 也降低了经济体的产出。^③ 李伟航和许玲构建了金融加速器 DSGE 模型，发现 LTV 工具在应对生产率冲击和金融风险冲击时，能取得一定效果。但其在应对货币政策冲击时，对降低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效果作用不大。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机构应考虑政策工具的综合效果，合理运用。^④

2. 实证研究

主要是通过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分析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基于单个国家微观数据

^①孙国峰、刘畅、倪克勤：《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管理》，《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 年第 4 期。

^②Unsal D. F. Capital flow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monetary policy and macroprudential responses. *IMF Working Paper*, 2011 (08): 1~27.

^③许先普、楚尔鸣：《宏观审慎对房价波动的调控效应及货币政策协调》，《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6 期。

^④李伟航、许玲：《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有效性研究——基于 DSGE 模型的实证分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的研究：如 Igan 和 Kang 研究韩国采用两类宏观审慎工具，即 LTV 工具和债务收入比 (DTI) 工具的使用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在使用两类工具后，交易活动和房价上涨在一段时间后分别放缓。此外，他们指出，运用 LTV 工具后，市场上关于房价上涨的预期会变少，而这将有效抑制市场上的投机者，从而避免房地产市场形成泡沫。^① Wong 等人研究了采用 LTV 工具对香港、韩国和新加坡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发现对于这三个经济体，提高 LTV 上限将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降低家庭的抵押贷款杠杆率。他们还发现，提高 LTV 上限将抑制房价上涨。但三个经济体中，只有香港是调控后的房价增速确实显著比调控前降低了。^②

基于多个国家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如 Lim 等人以 49 个国家为样本，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析宏观审慎工具的有效性，大多数宏观审慎工具在控制了宏观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后仍然有效。^③ Claessens 等人的研究基于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他们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DTI 上限、LTV 上限、对信贷增长和外币贷款的限制)，确实有效地降低了经济繁荣时期的杠杆与资产等的增长。^④ Morgan 等人认为，房地产市场一直以来是系统性风险的关键来源之一，他们基于亚洲经济体的银行数据，研究发现 LTV 工具有效地降低了住房抵押贷款的增速。^⑤ Gómez 等人指出，宏观审慎工具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应用，他们对哥伦比亚采取宏观审慎工具管理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性进行研究，发现逆周期储备要求和动态拨备对信贷增长产生了负向影响，逆周期的调节机制确实有助于减少信贷的顺周期性。^⑥

三、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

(一) 变量选择

为度量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即分析其有效性)，选用 Laeven 和

① Igan D., Kang H. Do loan-to-value and debt-to-income limits work? Evidence from Korea. *IMF Working Paper*, 2011 (12): 1~34.

② Wong T. C., Fong T., Li K., et al. Loan-to-value ratio as a macroprudential tool-Hong Kong's experience and cross-country evidence. *HKMA Working Paper*, 2011 (02): 1~26.

③ Lim C., Columba F., Costa A., et al. Macroprudential policy: what instruments and how to use them? Lessons from country experiences. *IMF Working Paper*, 2011 (10): 1~84.

④ Claessens S., Ghosh S. R., Mihet R.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to mitigate financial system vulnerabili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13 (12): 153~185.

⑤ Morgan P. J., Regis P. J., Salike N. Loan-to-value policy as a macroprudential tool: The case of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in Asia. *ADBI Working Paper*, 2015 (05): 1~26.

⑥ Gómez E., Lizarazo A., Mendoza J. C., et al.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in Colombia. Banco de la República, *Colombia Working Paper*, 2016 (12): 1~25.

Valencia 等人编制的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系统性银行危机指数作为该国（或地区）金融稳定水平的度量。^{①②}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年爆发系统性银行危机或处于系统性银行危机时期时，该指标取 1；若该国当年未爆发系统性银行危机，也并未处于系统性银行危机时期，则该指标取 0。

为研究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采用了 IMF 的全球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数据，该数据是 Cerutti 等人对各国家（或地区）的监管当局进行直接的调研、收集、整理形成的。他们统计了 2000 年以来各监管当局使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次数，具体包括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综合指数（简称“mp 指数”，表示运用宏观审慎工具体系的次数），及其中的两类细分工具，分别是针对金融机构资产或者负债情况的金融机构导向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指数（简称“fmp 指数”）和针对借款人的杠杆或金融状况的借款人导向型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指数（简称“bmp 指数”）。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文中简称为“宏观审慎工具”或“mp 工具”）指标的具体定义，见表 1。

表 1 宏观审慎政策（mp）工具体系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体系 (用 mp 指数度量)	借款人导向型的宏观 审慎政策工具 (用 bmp 指数度量)	债务收入比
		贷款价值比
	金融机构导向型的宏观 审慎政策工具 (用 fmp 指数度量)	随时间变化的/动态的贷款损失准备
		逆周期的资本缓冲/资本要求
		集中度限制
		对外币贷款的限制
		对本币贷款的限制
		对外币存款的准备金要求
		逆周期的准备金要求
		杠杆率
		对金融机构征税
		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附加费
		对银行间风险暴露的限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Cerutti 等人的研究编制。^③

①Laeven L. , Valencia F. Systemic banking crises database. *IMF Economic Review*, 2013 (06): 225~270.

②Laeven L. , Valencia F. Systemic banking crises revisited. *IMF Working Paper*, 2018 (09): 1~47.

③Cerutti E. , Claessens S. , Laeven L. The use and effectiveness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New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2017 (02): 203~224.

（二）模型设定

度量宏观审慎工具有效性的面板 Logit 模型，见式（1）。

$$y_{it}^* = \mu_i + mptool'_{it}\gamma + X'_{it}\beta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y_{it}^* 表示潜变量，它和被解释变量 y_{it} （即金融稳定指标，用系统性银行危机是否爆发度量）之间的关系是：当 $y_{it}^* > 0$ ， $y_{it} = 1$ ；当 $y_{it}^* \leq 0$ ， $y_{it} = 0$ 。 $mptool$ 表示综合（mp）或细分（即 bmp 或 fmp）的宏观审慎工具指标， X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μ_i 和 ε_{it} 表示个体效应和随机干扰项， γ 和 β 分别为宏观审慎工具指标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在控制变量方面，作者参考了相关文献的设定模式，见表 2。

表 2 控制变量的名称、缩写及其含义

控制变量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实际利率	rint	由贷款利率根据 GDP 平减指数调整后得到。
经济发展速度	rjgdp	用人均 GDP 的年度增长率衡量。
物价水平	cpi	用 GDP 平减指数度量的年通货膨胀率。
资本形成率	cap	资本形成总额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
城镇化率	urban	城镇人口在该国家（或地区）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人口增长率	popgrow	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年度增长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收集的资料编制。

（三）样本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作者收集和整理了 108 个国家或地区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见表 3。样本的时间跨度为 2000—2017 年。根据 IMF 发布的分类，^① 将样本经济体分为三类，包括 33 个发达经济体、47 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和 28 个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从样本分布上看，能够从全球视角研究宏观审慎工具的有效性。

表 4 为全样本及各类经济体 mp、fmp 和 bmp 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 Vars、Obs、Mean、Min、Med、Max 分别表示变量名称、观测值个数、均值、最小值、中位数、最大值。由全样本的 mp 指数描述性统计结果知，宏观审慎政策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无论是从平均值看，还是从中位数角度分析，一个经济体通常会在同一年度内使用 2 次 mp 工具，并且使用次数最高可达 10 次。由于金融机构导向型 mp 工具的政策工具箱中可用工具有 10 余种，而借款人导向型 mp 工具仅有 2 种，因此在全样本层面，fmp 指数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均高于 bmp 指数的相应指标。

^①IMF. Seeking Sustainable Growth: Short-Term Recovery, Long-Term Challenges,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7-10-23.

表 3 108 个样本国家或地区列表

经济体类型	样本国家或地区名称 (按拼音首字母排序)
新兴市场经济体 (47 个)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阿塞拜疆、埃及、巴拉圭、巴拿马、巴西、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波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俄罗斯联邦、厄瓜多尔、菲律宾、佛得角共和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格鲁吉亚、圭亚那、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克罗地亚、黎巴嫩、罗马尼亚、马来西亚、秘鲁、摩洛哥、墨西哥、南非、萨尔瓦多、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泰国、突尼斯、土耳其、委内瑞拉、乌克兰、乌拉圭、匈牙利、牙买加、亚美尼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智利、中国
发达经济体 (33 个)	爱尔兰、爱沙尼亚、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冰岛、丹麦、德国、法国、芬兰、韩国、荷兰、加拿大、捷克、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美国、挪威、葡萄牙、日本、瑞典、瑞士、塞浦路斯、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希腊、新加坡、新西兰、以色列、意大利、英国、中国香港
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 (28 个)	贝宁、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多哥、海地、吉布提、几内亚比绍、加纳、肯尼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蒙古、孟加拉国、摩尔多瓦、莫桑比克、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塞内加尔、坦桑尼亚、乌干达、越南、赞比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IMF 分类，并结合样本情况编制。

表 4 全样本及各类经济体描述性统计结果

Var	全样本					新兴市场经济体				
	Obs	Mean	Min	Med	Max	Obs	Mean	Min	Med	Max
crisis	1818	0.072	0.000	0.000	1.000	810	0.041	0.000	0.000	1.000
mp	1818	1.977	0.000	2.000	10.000	810	2.552	0.000	2.000	10.000
bmp	1818	0.334	0.000	0.000	2.000	810	0.427	0.000	0.000	2.000
fmp	1818	1.643	0.000	1.000	8.000	810	2.125	0.000	2.000	8.000
rint	1346	6.431	-41.230	5.005	93.915	670	6.619	-41.230	5.813	93.915
rjgdp	1800	2.617	-31.341	2.525	33.030	807	3.323	-14.421	3.231	33.030
cpi	1800	6.223	-25.958	3.931	185.291	807	7.622	-25.958	4.985	185.291
cap	1779	24.358	1.097	23.130	61.469	800	25.270	10.666	23.555	57.990
urban	1818	60.132	8.246	62.789	100.000	810	63.516	18.196	63.487	100.000
popgrow	1817	1.208	-2.851	1.129	7.061	809	0.923	-2.851	1.058	7.061
Var	发达经济体					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				
	Obs	Mean	Min	Med	Max	Obs	Mean	Min	Med	Max
crisis	504	0.163	0.000	0.000	1.000	504	0.032	0.000	0.000	1.000
mp	504	1.762	0.000	1.500	6.000	504	1.270	0.000	1.000	6.000

续表 4

bmp	504	0.405	0.000	0.000	2.000	504	0.115	0.000	0.000	2.000
fmp	504	1.357	0.000	1.000	5.000	504	1.155	0.000	1.000	5.000
rint	247	3.615	-1.893	3.229	14.367	429	7.759	-28.516	5.819	51.285
rjgdp	504	1.709	-14.560	1.653	24.377	489	2.388	-31.341	2.652	20.856
cpi	504	2.120	-9.680	1.838	20.116	489	8.144	-9.156	6.565	80.900
cap	501	22.908	9.819	22.488	41.538	478	24.351	1.097	23.551	61.469
urban	504	76.658	50.754	77.688	97.961	504	38.167	8.246	38.124	77.648
popgrow	504	0.508	-2.258	0.484	2.952	504	2.366	-0.282	2.662	5.340

各类经济体的 mp、fmp、bmp 指数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从 mp 指数的平均值和中位数看, 新兴市场经济体使用 mp 工具的次数是最高的, 其次是发达经济体, 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最低。从 bmp 指数的均值水平看, 在三类经济体中, 新兴市场经济体使用借款人导向型 mp 工具的次数最多, 发达经济体使用这类工具的次数略低于新兴市场经济体, 而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使用的次数则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从中位数水平看, 三类经济体这一指标的中位数均为 0, 表明借款人导向型的 mp 工具仍有待进一步推广和完善, 目前仅有不超过 50% 的国家采用。从 fmp 指数的均值水平看, 新兴市场经济体运用金融机构导向型的 mp 工具的次数是最高的, 达到 2.125, 而发达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使用次数均值为 1.357 和 1.155, 较为接近。从中位数值看, 可以得到相近的结论, 新兴经济体使用次数最多, 中位数水平达到 2, 而发达和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均为 1。

四、实证分析

(一) 全样本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 5 中模型 (1)、(2)、(3) 依次研究宏观审慎工具体系、借款人导向型和金融机构导向型宏观审慎工具的有效性, 表中第一列“FE”或“RE”表示, 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 应选择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表中的 obs 表示选择该模型时可用的观测值数目。表中上标 a、b、c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下同)。

结果显示, 从全样本看, mp 指数的系数为负, 这意味着 mp 工具体系能够降低系统性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两类细分工具的回归结果表明, 借款人导向和金融机构导向的 mp 工具均能降低系统性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其中, fmp 指数的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从系数的大小看, 金融机构导向型与借款人导向型 mp 工具相比, 更有助于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

表 5 全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 模型	(1)	(2)	(3)	变量 \ 模型	(1)	(2)	(3)
	FE	FE	FE		FE	FE	FE
mp	-0.306 (-1.549)			cpi	0.040 (1.283)	0.049 (1.547)	0.039 (1.266)
bmp		-0.200 (-0.432)		cap	-0.146 ^a (-2.635)	-0.140 ^b (-2.535)	-0.144 ^a (-2.619)
fmp			-0.416 ^c (-1.710)	urban	-0.073 (-0.936)	-0.113 (-1.508)	-0.078 (-1.039)
rint	-0.015 (-0.671)	-0.007 (-0.297)	-0.017 (-0.780)	popgrow	1.330 ^b (2.118)	1.237 ^b (1.999)	1.330 ^b (2.126)
rjgdp	-0.209 ^a (-3.496)	-0.202 ^a (-3.397)	-0.215 ^a (-3.566)	obs	379	379	379

注：由于篇幅所限，各模型的回归结果均分为 2 列展示。

关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在上述模型中，实际利率的系数为负，表明随着利率水平的降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会一定程度地上升。Buch 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在低利率的环境中，投资者承担更高风险的激励增强，资金可能通过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积累风险，并影响金融稳定。^① 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衡量的经济发展速度对系统性危机的影响，在三个模型中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爆发系统性危机的概率是下降的。但从另一角度看，当经济体增速放缓时，系统性危机发生的概率可能会上升，因而在这种情况时，需要采用宏观审慎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物价水平对系统性危机指标的影响为正，高物价水平正是货币危机的诱因之一，^②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些国家爆发双危机（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同时爆发）的事实相符。因此，监管机构在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银行危机发生的同时，也应当注意防范物价水平的快速上涨，避免双危机的发生。宏观审慎政策立足于维护金融稳定，但监管层面通过货币政策等维护价格稳定，对于实现金融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资本形成率对系统性危机的影响显著为负，并且在三种模型中均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随着资本形成水平的提高，经济体爆发系统性危机的概率会下降。城镇化率对系统性危机的影响在三种模型中均为负，表明随着城镇化率水平的提高，金融体

①Buch C. The Deutsche Bundesbank's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2015, *BIS speech*, 2015-11-25.

②蔡则祥、林峰：《越南货币危机的成因、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经济学动态》2008 年第 7 期。

系的稳定性增强。此外，人口增长率的系数为正，且均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快速扩张时，爆发系统性危机发生的概率有可能会上升。

（二）各类经济体回归结果及分析

这部分对 mp 工具的有效性做深入分析。基于 IMF 的分类，将样本经济体分为三类，研究 mp 工具的有效性在不同类型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异质性。

表 6 各类经济体回归结果

变量 \ 模型	新兴市场经济体			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			发达经济体		
	(1) RE	(2) RE	(3) RE	(4) RE	(5) FE	(6) FE	(7) FE	(8) FE	(9) FE
mp	-0.437 ^c (-1.752)			-0.492 (-1.056)			0.225 (0.511)		
bmp		-0.058 (-0.105)			-10.260 (-0.012)			-13.848 (-0.007)	
fmp			-0.782 ^b (-2.138)			-1.418 (-1.460)			0.353 (0.689)
rint	-0.013 (-0.496)	0.001 (0.029)	-0.018 (-0.667)	-0.111 (-1.168)	-0.119 (-0.717)	-0.143 (-1.076)	-0.325 ^c (-1.665)	-0.335 ^c (-1.787)	-0.316 (-1.600)
rjgdp	-0.131 (-1.535)	-0.129 (-1.580)	-0.140 (-1.573)	-0.008 (-0.082)	0.043 (0.378)	-0.052 (-0.462)	-0.729 ^a (-4.219)	-0.697 ^a (-4.158)	-0.730 ^a (-4.223)
cpi	0.024 (0.996)	0.033 -1.387	0.023 (0.942)	-0.070 (-0.736)	-0.106 (-0.698)	-0.105 (-0.858)	-0.048 (-0.230)	-0.108 (-0.516)	-0.038 (-0.188)
cap	-0.385 ^a (-3.030)	-0.338 ^a (-2.933)	-0.387 ^a (-3.050)	-0.123 ^c (-1.898)	-0.257 ^b (-2.281)	-0.094 (-1.224)	0.369 ^b (2.118)	0.353 ^b (2.042)	0.366 ^b (2.098)
urban	-0.010 (-0.261)	-0.033 (-0.882)	-0.001 (-0.023)	0.118 ^c (1.711)	-0.174 (-0.849)	0.115 (0.566)	-0.278 ^c (-1.896)	-0.249 ^c (-1.714)	-0.281 ^c (-1.936)
popgrow	-0.235 (-0.438)	-0.258 (-0.485)	-0.191 (-0.350)	-0.992 (-1.231)	10.320 ^a (2.745)	6.242 ^c (1.853)	-2.395 ^c (-1.652)	-2.015 (-1.405)	-2.443 ^c (-1.690)
constant	4.518 (1.240)	4.033 (1.175)	4.344 (1.171)	-3.386 (-0.799)					
obs	668	668	668	416	84	84	153	153	153

1. 新兴市场经济体

mp 指数的系数为负，且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新兴市场经济体采用 mp 工具，总体上有助于降低系统性危机发生的概率。bmp 指数和 fmp 指数的系数均为负，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其中 fmp 指数的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从系数的大小看，金融机构导向型较借款人导向型 mp 工具对降低系统性危机发生概率的作用效果更强。关于控制变量，作者发现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系统性危机发生的概率。实际利率在三个模型中对系统性危机的影响均不显著，且符号并不一致，表明实际利率对系统性危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与全样本结果相同的是，物价水平的提高会增加系统性危机发生的概率；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系统性危机发生的概率。与全样本结果不同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的系数为负，表明随着人口的增长，系统性危机发生的概率会下降。

2. 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

mp 指数的系数同样为负，表明对于这类经济体，mp 工具体系有助于降低系统性危机发生的概率。此外，借款人导向和金融机构导向的 mp 工具也有助于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综上，mp 工具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均有助于降低系统性危机发生的概率。在控制变量方面，实际利率的系数为负，利率水平的下降将增加危机发生的概率。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速度的系数，在模型（4）和模型（6）中为负，而在模型（5）中为正。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并不一定如新兴经济体那样，会一定程度地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这可能由于发展中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易受到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如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诸多国家遭遇金融海啸。与全样本结果相同的是，资本形成率的系数为负，表明资本形成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与全样本结果不同的是，城镇化率和人口增长率对系统性危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3. 发达经济体

对于发达经济体，mp 指数的系数为正。表明在这类经济体中，从整体上看，mp 工具体系并没有降低，反而是增加了危机发生的概率。具体细分，bmp 指数的系数为负，表明发达经济体运用借款人导向型的 mp 工具，有助于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而 fmp 指数的系数为正，表明针对金融机构的 mp 工具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危机发生的概率。为何宏观审慎政策在发达经济体中的效果，并不如其在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的效果呢？Cerutti 等人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他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发达经济体通常具有更加发达的金融体系，资金来源渠道丰富，并且存在多种多样规避监管的方式，因而

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尚不太明显。^①

在控制变量层面，实际利率对系统性危机的影响为负，且模型（7）和（8）中的回归系数是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利率水平的提高，危机发生的概率将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部分发达经济体在危机后逐渐采取“加息”的方式让利率回归到正常水平的现象。此外，物价水平的系数为负。表明随着物价水平降低，发达经济体爆发危机的概率也有可能是上升的。以爱尔兰为例，2008年其年通货膨胀率（用GDP平减指数度量）为-0.8889%，2009—2011年依次为-5.0105%、-3.2214%、-0.3744%，虽然物价水平在下降，但爱尔兰仍处于危机之中。因此，仅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实现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采用适宜的mp工具来抵御风险。与全样本结果相同的是，随着城镇化率水平的提高，系统性危机发生的概率是下降的，且影响程度在10%的水平上显著。但与全样本结果不同的是，发达经济体资本形成水平的提高，导致系统性危机发生的概率提高，并且这种影响在三种模型中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此外，人口增长率的系数在三个模型中均为负，且在两个模型中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些特点反映出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等相比，具有各自的特点。因此，在设计防范系统性危机的宏观审慎政策时，要因地制宜。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108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了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稳定（由系统性银行危机指数度量）的影响，同时也研究了借款人、金融机构导向型的宏观审慎工具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对108个国家或地区按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划分，发现宏观审慎工具在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中的效果存在差异。

从宏观审慎工具运用次数的均值以及中位数水平看，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开始采用宏观审慎工具，其中一部分国家或地区在同一年度内多次采用这类政策，维护金融稳定。由于金融机构导向型的宏观审慎工具与借款人导向型的宏观审慎工具相比，种类更丰富，所以运用次数的均值和中位数值均较高；不同经济体运用宏观审慎工具的频率不同，如从mp、bmp和fmp指数的均值水平看，新兴市场经济体运用宏观审慎工具的次数最高，发达经济体其次，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最低。

运用宏观审慎工具，有助于降低系统性危机发生的概率。其中，对于新兴经济体和

^①Cerutti E., Claessens S., Laeven L. The use and effectiveness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New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2017 (02): 203~224.

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宏观审慎工具体系及其中的针对借款人和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工具，均能降低系统性危机发生的概率。同时，发达经济体中运用借款人导向的宏观审慎工具，也有助于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但发达经济体运用金融机构导向型的宏观审慎工具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加强，这可能是由于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系更发达，规避监管的方式也更多。各类经济体的特点不同。从回归结果看，由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在发展阶段、所处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系统性危机影响因素系数的大小和方向存在差异。所以，在构建防范系统性危机的宏观审慎工具时，要考虑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具体国情的特点。

总之，宏观审慎工具从理论研究到逐步运用于实践，已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本文也印证了这一点。中国央行致力于开展宏观审慎政策领域的创新性探索，目前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并将资产扩张行为等金融活动因素融入宏观审慎管理体系。^①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属于新兴经济体，中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程度的独特性，在设计中国的宏观审慎工具时，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体系。从全样本层面看，与金融机构导向型的宏观审慎工具相比，借款人导向型的宏观审慎工具的种类较少。为了更好地防范系统性危机，可在此领域积极开展新工具的研发、完善和试点性应用，从点到面，逐步普及。从回归结果看，影响系统性危机的因素较多（如物价水平、资本形成等），因此不但要通过宏观审慎政策防范风险，而且也要通过货币政策等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

责任编辑：李蕊

^①易纲：《坚定不移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 不断开创金融事业发展新局面》，《金融时报》2018 年 12 月 5 日。

全球科技革命与我国职业教育： 趋势、问题及选择

李 超

摘要：全球正蕴育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分工体系将出现新的调整。我国产业发展能否适应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变革，完成转型升级并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职业教育肩负重要使命。根据新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和突出，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要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适应我国产业发展变化的新特点，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规模和层次，加强新专业和重点专业建设，形成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探索新型职业教育模式，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实现职业教育的“三个转变”。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 职业教育 教育体制改革

作者简介：李超，北京财贸职业学院讲师。

发展职业教育既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重要机遇、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就业和创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规模不断提升，结构更加合理，模式呈多元化格局，毕业生就业率保持较高水平。目前已在天津市、四川省等地批准建设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产教结合、校企合作的步伐不断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进程加速，全球产业布局、国际产业分工

体系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转变，各国围绕新兴产业竞争不断加剧，我国产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对我国职业教育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我国职业教育如何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中，适应产业发展变化的新特点，逐渐形成职业教育和产业升级互动发展模式，成为当前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2019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为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方案指出，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下一步，要把职业教育发展和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立足于服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的需要，大力培养产业发展急需的各类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提供强大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一、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的背景和趋势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多次科技革命，每次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带来了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进步。关于科技革命阶段划分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主要有：四次科技革命论，认为从 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人类社会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三次科技革命，目前正进入以“智能系统化”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五次科技革命论，认为前四次科技革命分别以机械技术、电气技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为主要核心，引发重大产业变革，促进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当今人类社会正进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五次科技革命。^①

虽然各机构和学者对科技革命的阶段划分莫衷一是，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酝酿，并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出现“技术引爆”。许多著名机构和学者还对科技革命突破口做了分析和预测。Markillie 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将以制造业数字化为重点，特别是机器人和 3D 打印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将得到快速发展。麦肯锡根据各国研究情况，并加入经济效益指标进行机构化分析后，筛选出 12 项可能的颠覆性技术突破。国家发展改革委课题组经过梳理，总结出 14 项颠覆性技术，分别是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机器人、3D 打印、先进材料、新一代基因技术、可再生能源、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采技术、新能源汽车、新一代储能技术、自动驾驶汽车、知识型工作自动化。

^①城市中国计划：《大势——世界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趋势及其影响》，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5 年版。

综合国内外研究，新一轮科技革命最可能发生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相互渗透、交叉融合的领域。^①并在六大方面带来巨大变革：重要科学领域从微观到宏观各尺度加速纵深演进、前沿技术呈现多点突破态势、科技创新呈现多元深度融合特征、颠覆性创新呈现几何级渗透扩散、科技创新日益呈现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新技术可能对社会伦理和安全等问题带来重大影响和冲击。^②

那么，面对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为核心的制造技术将广泛运用，在生产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新时代，我国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需要为此做怎样的准备呢？首先，这需要考察我国产业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扮演什么角色。

二、全球科技革命下的中国产业发展

科技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先导，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相伴的工业革命将推动全球生产制造方式的深刻变革，促进生产力提升的同时，带来国际分工体系的全面调整，这对我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未来，我国产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将出现以下趋势性变化。

（一）制造业产业升级速度加快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科技革命以及由之带来的工业革命，都为后发国家实现其产业升级并赶超先进国家提供了机遇和窗口。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产业链完备、综合竞争力较强的工业制造体系，工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一，但总体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在自主创新能力、信息化程度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明显差距，即所谓“大而不强”。为迎接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抢占产业变革中的国际分工优势地位，我国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引起广泛关注。根据这一部署，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创新能力大幅提升，重点领域发展取得重大突破，整体竞争力明显增强，优势行业形成全球创新引领能力，全面实现工业化。^③可以说，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起点上，中国首次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这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①杨长湧：《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趋势及其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全球化》2018年第8期。

②王志刚：《科技创新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中国科技产业》2018年第6期。

③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2015年5月8日。

（二）生产制造的方式和形态出现革命性改变

一是数字化制造蓬勃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以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为特点之一，信息技术将融入制造业领域的各个方面，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等全过程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目前，我国在 3D 打印等数字化制造上已经取得突破性发展。二是智能化制造迅速推开。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智能制造将进一步解放人类双手，让人工操作变成人工管理。我国智能制造技术也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中国 305 个智能制造示范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升 37.6%。三是个性化制造走向成熟。新科技革命为解决需求多样化和大规模制造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可能，我国企业以完备的工业制造基础为依托，面对广阔的国内市场需求，将大规模生产转向大规模定制，形成了包容性、灵活性强的生产制造方式。近年来，我国企业在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个性化等新型制造业领域已取得长足发展。如青岛红领集团，在全面综合成本、质量、时间和利润等因素影响下，发展了基于消费需求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生产。四是相关生产制造行业的边界趋于模糊。新一轮科技革命以新兴技术领域的交叉融合为主要特征。随着技术融合的程度不断加深，在部分产业内，各产业之间出现相互渗透，使不同产业具备共同的技术属性。当某个产业的产品具备了其他产业的全部或部分功能，这一产业的部分企业将自然跨越到另一个产业，或实现其生产经营活动部分跨越，出现跨产业边界的新产品或服务，从而产业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如智能穿戴设备的创新和发展，就是突破了传统生物制造、电子信息和纺织服装行业的界限。得益于我国较强的产业基础条件和相对宽松的创新环境，我国产业融合发展已具备一定条件，一些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产业边界淡化的同时，不同产业企业间形成新的竞争合作关系，促进了生产要素跨行业的流动和配置。

（三）制造与服务的融合进一步深化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改造传统生产模式和服务业态，推动传统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变革，促进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以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技术已逐步渗入制造业和服务业，新技术的引入不仅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产品生产在制造和服务流程上的整合，不断形成新的业态和模式。企业的竞争逐渐由单个企业的利润和成本竞争，变为在平台上整合资源能力的竞争。竞争方式的改变促使制造业中的科技要素在生产性服务业中广泛应用，同时让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要素在制造业的部分领域有所渗透和拓展。产品和服务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逐渐突破制造业、服务业在业态上的分割，制造业和服务业加速融合。

（四）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面临新调整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全球产业链和国际分工格局将出现新的分解和整合。一是劳动力等传统要素在生产制造中的比重下降，将改变国家间产业竞争的比较优势。新科技革命将推动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推动新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深刻改变传统大批量和流水线的生产制造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显示，过去 20 多年，发达经济体劳动者收入占比下降明显，主要是由技术进步造成的。为对抗因自动化生产成本的下降，中低端制造业必须向人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以寻求空间，发展中国家围绕低要素成本的竞争将加剧。而随着我国人力成本、土地成本等传统竞争优势不断减弱，我国长期依赖的在大规模生产上的传统比较优势将加速丧失。二是各国围绕产业变革带来的新技术领域制造业竞争进一步加剧。目前，发达国家正通过“制造业回归”“再工业化”等战略举措，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工业制造红利，以保持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技术和资本积累，以广阔的中高端消费市场为基础，充分发挥在高端服务业领域内的领先优势，不断促进中高端制造业重心重新向发达国家转移，力图牢牢把控全球高附加值产品、新型装备产品和重要新材料的研发、设计及生产制造。我国产业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的压力加大。

三、全球科技革命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面临新的挑战

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互相影响、相互促进。实际上，职业教育是产业发展的基石，产业升级也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更大空间。随着我国产业跟随全球科技革命的发展而逐渐升级、演进，产业发展对职业教育的要求也将出现变化，给职业教育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一）产业升级加快导致中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不足

应当看到，在我国，职业教育长期被定位为教育序列的尾部，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理解不充分，认为是“次等教育”，很多家长不愿意子女就读职业院校或职业技能专业，造成职业教育的优质生源长期不足。数据显示，我国职业院校在校学生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已由 2010 年的 3200 万人下降到 2018 年的 2680 万人，降幅达 17%。随着我国制造业由传统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升级，对于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层次也随之提高，需求规模还将不断扩大。同时，企业所需的生产人才结构将发生重大改变，部分初中级技术人员将被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生产所取代，而中高端技术人才需求扩大，所需要的这些中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不仅要有现代制造业的生产制造技能，还要掌握一

定的理论知识，能够快速掌握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技术变化，并具备技术研发能力，在技术创新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仍主要停留在基础性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技能人才数量占比不足 5%，远低于发达国家 30%~40% 的比例，难以满足新科技革命下企业对中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二）职业教育改革步伐难以跟上企业技术型人才需求的变化

由于我国技术型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前瞻性不够，各职业院校存在专业设置趋同现象，特色专业缺失，专业发展不平衡，培养出的毕业生千篇一律，不适应市场需求。新科技革命带来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催生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必然导致企业人才需求的快速变化，技术技能人才供需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将进一步加剧。一方面，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滞后，难以跟上产业升级带来的技术人才市场的需求变化速度。职业院校专业和学科建设的周期长，专业设置和调整的速度慢，报批设立新专业复杂。而且跨学科的专业设置较少，不利于培养技能技术类的复合型人才，难以适应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程度不够，技术性人才的市场适应能力较弱。部分职业院校仍受应试教育影响明显，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

（三）职业教育教学方式和理念滞后无法跟上技术革命的步伐

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带来复杂而深远的产业调整和变革，大大加快传统的简单劳动被智能生产、自动化生产所取代的速度，同时制造和服务融合、跨界生产又产生许多新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新科技革命下，我国产业升级对劳动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求技能型劳动者掌握传统的专业技能，具备数字化制造、网络化制造、信息化制造、智能化制造等新型生产制造业的技术本领，还要掌握跨岗位的多学科交叉知识，适应生产岗位界限模糊化的需要，发挥人的能动性以实现对生产流程的控制。从目前看，我国职业教育领域从体制机制、教学理念上都没有做好相应准备，在信息、数字、智能、绿色等符合新科技革命趋势的重点技术领域，教育教学方式和理念创新不足，人才培养的探索力度不够。

（四）职业人才培养难以满足我国国际分工调整的要求

新科技革命将带来各国比较优势的变化，现有国际分工体系将出现调整。一方面，以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竞争优势的低端生产制造将加快由我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目前，我国纺织服装、鞋帽、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出现向东南亚、非洲转移的趋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先发优势，加快抢占新科技革命下智能制造、自动化制造的比

较优势。未来，我国产业要向中高端转型升级，更主要的是要与发达国家在新兴产业的竞争中，抢得一席之地。反观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较，在职业教育体系、教育模式、专业规划和建设等方面，仍有不小差距。

四、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也强调，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改革到了必须下大力气抓好的时候。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职业教育带来的机遇，以及妥善应对相关挑战，此次职业教育改革方案明确，用5~10年，职业教育要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①为贯彻落实这一方案，我国职业教育应该按照国内产业发展的新需求，不断深化改革，适应产业演进的趋势和规律。要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规模和层次，加强新专业和重点专业建设，逐步形成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探索新型职业教育模式，推动我国加快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步伐。

（一）进一步提升办学规模和层次

广泛宣传职业教育的积极作用，引导各界正确认识职业技术人才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逐步扩大职业教育优质生源招生规模。建设更加完善的培养体系，探索开展本科段职业教育，建立一批国家重点职业教育院校，逐步建立从中职、高职乃至专业技术型研究生的人才培养通道，为职教学生提供更理想的成长路径通道。强化高端职业技能师资培养，有序实施一批重点职教人才工程，分步骤开展重大职教科技任务，不断提升职业院校教师待遇，吸引有实践经验的优秀企业人才向高等职业院校流动。

（二）加强新专业和重点专业建设

聚焦新一代信息产业、智能制造业、机器人技术、绿色环保技术、新型汽车、制造业服务化、对外商贸等重点领域，加大职业院校课程研发、专业改造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加强我国职业教育与新科技科目重点领域的对接。针对新技术进步带来的职业岗位重组、职业内涵扩展，加强对职业教育传统专业的改造、拓展和再生，增强复合性、交叉性培养，以应对产业革命带来的职业结构变革和分工体系的变化。

^①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2019年1月24日。

（三）逐步形成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

坚持市场为导向，根据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突出人才培养的应用性与实用性，以提升职业技术人才实践能力为核心，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创办一批办学特色鲜明、应用特征较强的职业院校。加强职业院校与工业园区、开发区、创业孵化园区的对接与合作，促进校企合作，引进企业教学资源，补齐院校在课程设置、实习实训方面的缺陷和瓶颈。探索更加灵活的学制安排，鼓励技能技术人才更长时间在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四）探索新型职业教育模式

创新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逐步扩大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等新模式的规模，探索开展新“学徒制”，积极培育技术技能人才的匠人精神。倡导开放办职业教育，积极引进国际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优化学科结构，改进人才培养方式。探索开展个性化定制职业教育培养，实现企业、教育院校和个人培养的三方联动，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参考文献：

1. 刘延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面开创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求是》2018年第3期。
2.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2016年。
3.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编：《中国制造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4. 付卫东：《经济转型期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5. 何传启编：《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6. 姜大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理性追问》，《教育研究》2011年第11期。
7. 王仕军、李向阳：《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打造》，《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3期。
8.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课题组：《从职教大国迈向职教强国——中国职业教育2030研究报告》，《职业技术教育》2016年第6期。

责任编辑：李 蕊

区域中心城市郑州的战略定位与 发展重点

黄奇帆

摘要：郑州在 2018 这一年实现了三个指标一起突破，第一个是常住人口突破了 1000 万人，第二个是市域的建成区突破 1000 平方公里，第三个是 GDP 突破 1 万亿元。三个突破具有历史性意义，标志着郑州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郑州的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郑州今后的战略定位是：国家的超级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将是经济中心、贸易中心、交通枢纽航运中心；中原地区城市群的领头羊，形成以郑州为中心、为枢纽的一个城市群。郑州要抓好交通枢纽建设，要加大公共服务建设力度，要努力成为开放高地，要做好财政与投融资管理。

关键词：区域中心城市 战略定位 交通枢纽 开放高地

作者简介：黄奇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重庆市原市长。

一、郑州发展的战略定位问题

2018 年，郑州在三个重要的城市指标上有了里程碑意义的突破。一是常住人口突破了 1000 万；二是建成区面积增加了 200 平方公里左右，使得郑州市域的建成区突破 1000 平方公里；三是 GDP 突破 1 万亿元。郑州在 2018 这一年实现了三个指标一起突破，具有历史性意义，标志着郑州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郑州的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郑州下一步应该发挥怎样的功能？需要从全局出发来谋划，要周全的规划和顶层设计。我国除港澳台外的 31 个省份，超过 1 亿人口或者 7000 万到 1 亿人口的大省有七八

个，这些省的省会城市一般跟本省的经济比例有一个约定成俗的逻辑，这个逻辑大体可以用“一二三四”四个指标来衡量。一是省会城市的占地面积大体上是省土地面积的 5%~10%。河南省有 16 万多平方公里面积，郑州市域面积 7000 多平方公里，占 5% 左右的比例，显然有些偏低了。二是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的人口一般应该占全省人口的 20% 左右。河南省有 1 亿人，郑州事实上应该达到 2000 万人，但目前只占全省的 10%，只有 1000 万人。三是省会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应当达到全省 GDP 的 30% 左右。河南省 GDP 接近 5 万亿，郑州是全省的 20%，偏低了。如果整个河南省增长 5%~6%，那么郑州应比其他兄弟地市要快半步，别的地方平均增长 6% 的话，郑州就应该增长 8% 或者 8.5%。四是有关服务业。中心城市的服务业，包括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市场主体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应当占全省同类行业比重的 40% 左右。如果整个河南省的服务业有 1 万亿的话，郑州市应该占 40%，就是 4000 亿。用这个“一二三四”去框的话，可以把郑州 15 年以后该达到的目标值、功能定位想清楚了。这不是主观的，也不是想做大就能做大的目标值，而是从全省的角度，从中原地区的角度看，郑州应该有这么一个责任。然后按照长远的顶层设计，脚踏实地的一年一年规划、五年五年规划，并互相衔接，这就会为郑州的发展产生不懈的动力。

另外，到了超级大城市做规划要想三件事、三个圈，一是城市本身的 2000、3000 平方公里核心圈的规划，二是城市圈大都市圈的规划，三是超级大城市同 200~300 公里半径内关联的其他大城市、特大城市形成的城市群规划。像开封、许昌、新乡、焦作 4 个地市都在郑州 100 公里的范围内，是郑州大都市圈的四兄弟。在 300 公里以远的地方，还有洛阳、南阳、信阳等其他一些城市，都与郑州有联系，都以郑州为核心，这就是城市群的逻辑了。

理清上述概念可以给郑州几个定语：第一，郑州是我们国家的超级大城市；第二，郑州要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将是经济中心、贸易中心、交通枢纽航运中心；第三，郑州是中原地区城市群的领头羊，形成以郑州为中心、为枢纽的一个城市群。

总体说，郑州在 2018 年三个里程碑意义的指标突破以后，按照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有“一二三四”的目标。作为超级大城市搞规划就要有三个圈的概念，核心圈、大都市圈、城市群的概念，有了这些概念以后，如果经过若干年实现了，逐渐在功能上就体现出经济中心、贸易中心了。郑州不是国家综合性的金融中心，但至少是中部区域的产业链金融中心，因为有服务业的产业链，金融肯定会相应的发展。有些定位如交通枢纽、物流中心等等这些中心城市的功能也会自然展开。

二、郑州要抓好交通枢纽建设

郑州要大发展很重要的是要抓交通。交通枢纽至少有五种，对郑州来说发展好、建设好五种交通枢纽十分重要。

第一个交通枢纽是郑州引以为傲的米字形高铁枢纽。中国的高铁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城市运行的版图。到目前为止，中国真正叫做枢纽性高铁的其实就8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是终端型的枢纽；还有就是5个通过型的枢纽，中部地区是郑州、武汉、合肥，西部是重庆、西安。

第二个枢纽是货运铁路枢纽。郑州历史上是我国传统铁路货运的中心，郑州要成为一个经济中心、贸易中心，不仅仅靠人流，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货流，货流当然以铁路为中心。郑州在高铁时代要抓住机遇，要成为中国内陆最重要的铁路货运枢纽。现代铁路货运枢纽无非是两类：一类是矿物、粮食、煤炭等大宗物资集散枢纽地，另一类是铁路集装箱枢纽地。郑州要发展的是商品集装箱铁路枢纽。铁路集装箱的货运枢纽可能是三五个省范围内有一个，整个中部地区需要两个，长江南面一个，北面一个，南面在湖南湖北是个点，北面郑州是个枢纽点。一是因为郑州是超级大城市货运量充足，二是因为在历史上郑州就是铁路货运枢纽。可以建一个十平方公里的铁路配送站，再配十平方公里的物流中心，形成仓储、物流、货运中心。

第三个枢纽是航空。郑州机场现在能吞吐6000万人次、50万吨的航空货运。随着电子邮包、跨境电子商务的不断增长，航空货运也会不断增长。郑州也要发展和建立基地航空公司；要多建机场航站楼上的登机桥；应该有很好的飞机维修，有各种部件配送的保税仓库，是一个能提供免税航空油的基地，这样更多的飞机愿意到郑州来维修、加油，加油加的是保税的油，郑州的保税区与机场在一个区位上，要充分利用在机场里保税区的配套条件，为航空公司做好服务。另外，一个好的机场要有良好的商业商务服务。在香港，40%的收入来自香港机场候机楼里的小卖部、免税商店或者吃饭、休息、买衣服各种各样的活动场所。郑州机场的规模和旁边的空间绝对可以变成一个航空城，一方面是个大机场，另一方面是个大的购物中心、大的俱乐部、大的旅游中心。老百姓不光是坐飞机到机场来进进出出，还可以单纯为了买东西，为了开眼界，也会到机场来转一转。机场人丁兴旺，其他各种业务也会跟上。

第四个枢纽是轨道交通。作为超级大城市需要建轨道交通、地铁交通。地铁是个长远规划。地铁投资一方面是为满足居民出行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拉动，可以拉动地铁站附近的房价，这样修建地铁的投资也就回收了。香港地铁政府没出一分钱，就是在

地铁站上面加盖物业，香港地铁 200 多公里，基本上市场化运作。郑州现在 1000 万人，至少应该有 200、300 公里地铁。再有，郑州作为一个超级大城市，要想着城市圈。在郑州 500 公里地铁网的外侧，辐射出 4 条或者 8 条到新乡、许昌、开封、焦作以及周围地市州一级的城市轨道，这样整个郑州大都市圈可能形成的地铁、轨道交通是 800 公里。总之，从规划角度讲，城市中心圈是地铁，大都市圈是轻轨，城市群之间是高铁或城际铁路。

第五个枢纽是通信。首先，目前郑州有个跨境电子商务一秒通，郑州已经成为互联网直联点。郑州还要做通信枢纽，互联网中心。其次，要建设 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云计算中心这样的通信基础设施，郑州应该是个云计算中心，也即数据处理中心（IDC）。这是个重要的产业，也是基础设施。再次，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大数据服务能力的 PaaS（平台即服务）和人工智能软件服务 SaaS（软件即服务）。实际上一个地方如果把这三个功能搞好了，这地方也就超前于其他各个地方，会领先一步，而且步步领先。

三、郑州要加大公共服务建设力度

一个大都市除了基础设施好、城市空间、就业各方面好以外，公共服务也要好。郑州作为一个超级大城市，公共服务十分重要，标志性的医疗体系，标志性的教育体系，标志性的文化设施体系等都要相对齐全。在这三个方面郑州要下点工夫。

一是医疗。如果说 100 万人需要一个三甲医院的话，河南省 1 亿人口，大体上应有 100 个三甲医院。如果河南省要有 100 个三甲医院的话，郑州这个大都市形成 40 个甚至 50 个三甲医院是应该的。郑州现在有 18 个三甲医院，需要再加 22 个。一个三甲医院投资至少是 10 亿元，20 多个三甲医院需要准备 200 亿元的投资，整个河南省就要准备 600 多亿或 1000 亿元的投资。投资医院是投入小、产出大，单从唯 GDP 论的角度讲，建医院只要有市场，比发展工业赚钱，还轻松，还得人心。因此，建三甲医院可以做个五年或十年规划。

二是教育。河南不算教育高地，但也不是教育洼地。河南应该占全国 3000 万大学生的 1/13、1/14，应该有 220 万、230 万名大学生。但现在整个河南大专院校的在校生才 100 多万名，好像少了 100 万人。另外，现在全国有 3000 多个大专院校，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做平均的话，河南也应该有 200 个，但现在大概只有 130 多个，学校的数量也少了点，在校生也少了点。河南省 1 亿人的普九是到位的，高中毕业生普及率也与全国水平相当，数量也不少，比例跟全国平均值一样。但是这么多的高中毕业生能进大学的毛入学率却比全国低得多。因此，河南在教育上要加大投入。要将河南的高等学校建成 150 个、

170个。还要建一些民办高等院校，可以请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的大学教育集团到河南来建分校。还可以邀请一些大企业、大集团来河南或郑州办高等学校。

三是文化。郑州是个有5000年历史、3000年都会历史，很有历史渊源的地方。郑州作为一个超级大城市、中心城市，处在河南丰富的历史文化条件下，要围绕文化基础设施、文化作品、文化人才三个方面推动文化高地建设，要加大投资、有所作为。

四、郑州要努力成为开放高地

开放的高地有五个标志。一是口岸高地，内陆地区的枢纽口岸可以有航空、铁路和公路三种。这三种口岸都建起来，郑州的集输运系统、跨境电子商务的各种集输运系统都会变得更加一体化。二是通向世界各地的交通枢纽，包括航空、铁路、公路、航运等等，应该是一个同国际大交通枢纽能够直接连接的交通枢纽。三是开放平台、境内关外保税平台。保税区的功能不仅仅是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还可以做转口贸易、离岸贸易、服务贸易和跨境电子商务，是一个地区得以大进大出的功能性口岸平台。作为境内关外特殊监管区，郑州已经有了，但是目前仅有5平方公里，还需要再进一步扩展。四是自由贸易区。全国一共12个自由贸易区，河南省级的自贸区有三个，郑州、洛阳、开封各有一个。自贸区营商环境建设要对标自贸协定（FTA）中的零壁垒。自贸区也是个开放平台，而且是最高端的服务贸易的开放平台，是最高端的游戏规则制度的开放平台。在开放高地建设过程中，如果能把自贸区的探索试验做好了，开放就有了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郑州自然而然就成为中原大地最为开放的高地了。五是开放高地要形成一批开放的产业、开放的企业，这些企业、产业在这里可以大进大出。要有人才的开放、企业产业的开放、平台的开放，平台的开放又包括保税区、自贸区的开放，还有枢纽口岸等等，构成整套的开放体系。

五、发展中城市的财政与投融资管理

如上所述，郑州市未来10多年要占河南省20%的人口、30%的GDP、40%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总的目标是要实现贸易中心、交通枢纽、经济中心。这将涉及巨大的投资，包括五六千公里的城市道路需投资5000亿元，七八百公里的地铁轨道交通需投资4000多亿元，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需投资2000多亿元等等，大约共需2万多亿元的投资。这些投资有的可以市场化由企业来承担，有的可以公私合作（PPP）方式承担，有的可能是国家级投资单位承担。毋庸置疑，这中间相当多的是公共服务项目，至少有1万多亿元必须由地方政府的财力来承担。如何解决好巨额的投资资金来源，又避

免过度负债风险，关键是要抓好财政管理、搞好土地储备，推进 PPP 投融资改革。

（一）要按照“六要六不”的工作原则，抓好财政管理

第一，理财理念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水养鱼、涵养税源，不能竭泽而渔、寅吃卯粮、收过头税。在经济下行的周期里，更要发挥财政逆周期的调节作用，着力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负担，增强企业发展活力。通过涵养税源，扩大税基，最终形成一个低税费成本、低要素成本、低物流成本、低物业成本、低资金融通成本的“五低”投资环境。

第二，一般预算财力支出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不能搞透支，更不能搞赤字财政。在每年的财力调度运行过程中，政府要坚持量入为出，特别注意收支平衡。不搞财政赤字的关键在于努力做到收支的“三个平衡”。一是静态平衡，就是预算收支要平衡，“以收抵支”。二是动态平衡，指的是现金流平衡，要善于做到“十个锅子八个盖”。三是债务结构平衡，对于历史形成的既有债务，在结构上要做到短期和长期债务的调节平衡，严格控制短期债务的增长。

第三，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善于运用财政资本杠杆、社会资本，撬动全社会的投入产出效益，但不能以财政资本过分地杠杆债务融资而扩大债务风险。对地方政府而言，怎样做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呢？就是在财政资本使用上，要注重投放到那些具有“四两拨千斤”效用的领域，发挥财政资本对社会资本的杠杆作用，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第四，政府搞基础设施和公共建设的投资是可以透支的，但由此形成的债务率和负债率不能超过警戒线，债务成本不能太高，债务率（债务余额与财政收入之比）不要超过 70%，负债率（债务余额与 GDP 之比）不要超过 30%。同时，还要控制债务成本，即使债务率不超过 70%，但都是高利贷也不行。政府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良好信用，尽量使用各种利息比较低、周期比较长的资金。

第五，地方政府要善于发挥土地财政功能，不能唯利是图、推高地价房价，破坏投资环境。由于土地出让形成的所谓“土地财政”，就成为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应当把它充分利用好。在土地财政管理方面，有一个特别要注意防范的问题，就是土地出让收益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政府往往希望地价越高越好，但决不能把土地价格搞得过高。高地价必定导致高房价，而高房价不但老百姓不满意，还会削弱实体经济的发展，终究得不偿失。

第六，政府要善于建设强大的、有信用的投融资平台，但不能层层叠加、搞得太多太滥。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是一个城市在工业化、城镇化起步阶

段甚至进入快速发展期时，地方政府整合各类资源、增强融资信用、破解发展资金难题的有效载体，是先于经济发展周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力推手，是在市场信号薄弱、政府财力不足又不能发债的条件约束下，为工业化、城镇化获取长周期、低利息融资，以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必要而合理的路径选择。从实际操作看，有几个问题需要特别引起注意：一是平台公司数量和规模要严格控制，二是高利息借贷坚决不能搞，三是财务监管要加强，四是要像保护生命一样维护投融资平台的信用。

（二）要遵守五条原则做好土地储备

在土地管理的五条原则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建立土地储备制度。这作为政府调控土地市场的重要手段，可以有效显化国有土地的资产价值。土地储备做好了，不但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还可以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用地需求，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土地储备和金融有机结合、良性循环，还能平衡政府财政收支，稀释债务并降低风险。

（三）要按照五个路径抓好 PPP 的投融资改革

PPP 模式核心是构建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应当把握好五个原则：一是利益共享。所有 PPP 项目，都要保证政府公共部门、民营企业以及社会投资者能利益共享，不能由任何一方独享。二是风险共担。一方面，风险与利益对等；另一方面，一旦有风险，大家一起来承担，不能让任何一方独自兜底。三是公共利益最大化。因为 PPP 项目都是社会公共服务项目，不能唯利是图，必须充分体现和照顾公共利益。四是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能只讲公共利益，不讲经济效益，否则就吸引不了社会投资。五是既要有激励，也要有约束，保证社会投资者有合理的收益。这五条原则是高度关联的，缺一不可。

责任编辑：谷 岳

· 名人观察 ·

关于中国《外商投资法》和 中美双向投资的思考

张晓强

中国《外商投资法》已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经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有关部门正在抓紧制订实施细则，以保证《外商投资法》能得到有效实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外商投资法》公布后，分别与美国中国商会、欧盟中国商会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在华企业代表召开了座谈会。参会外方代表表示，以法律方式明确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标准制定工作、依法通过公平竞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国家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以及国家鼓励外商投资过程中基于自愿原则和商业规则开展技术合作、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等条款，将若干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对外商关注的参与标准制定、政府采购、强制转让技术等通过法律给予保障。法律的公布，充分体现了中国鼓励外商投资、致力于建设高水平的营商环境，使中外企业在中国这一巨大市场中，通过合作与公平竞争，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共享发展红利。

“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这是中国人民的重要原则。2018 年 4 月 10 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并提出在扩大开放方面中国将采取四方面重大措施。第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放宽金融业外资股比限制，尽快放宽汽车等行业外资限制。第二，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完成修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工作。第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四，主动扩大进口。一年来，在上述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国特斯拉独资新能源汽车厂在上海落地，沈阳宝马汽车的德方股比增至 75% 达成协议，新版准入前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 2018 年 7 月发布，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金融机构均获得了突破旧有股比限制的许可。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成果丰硕，近 1200 家参展商中，美国企业达 180 家，位居第三。

2018年，在全球FDI大幅下降近20%的情况下，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逆势增长3%，达1350亿美元。

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包括继续大幅度缩减负面清单、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中国将在行政许可、市场监管等方面规范各级政府行为，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争、扭曲市场的不合理规定、补贴和做法，公平对待所有企业和经营者，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在此背景下，2019年2月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19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0%的会员企业预计2019年行业将实现正增长，明确表示中国仍然是所在行业近期全球投资计划的重中之重。53%的企业相信，未来中国投资市场将更加开放，达到2016年首次提出该问题以来的最高点。但报告也提出，中美双边关系的紧张正在成为新的关注焦点。会员企业表示，中美两国政府均可采取措施，避免双边关系的日益紧张。

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对象国，双边经贸合作中的利益不断扩大，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对于在经贸谈判过程中，美方宣布大幅度上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至25%的“极限施压”，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国家信誉，也使双边经贸磋商进程受到严重干扰。从双向投资看，近几年美国对华投资低速增长，而中国对美投资则大幅度缩减。根据美国荣鼎公司数据，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2016年至2018年分别为约450亿美元、300亿美元和50亿美元（2018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约1300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4.2%）。坦率地讲，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和对中国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平等互利是经贸及投资合作的基本原则。正因如此，中国《外商投资法》第40条规定，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投资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在扩大开放、鼓励企业公平竞争等方面，美国政府存在诸多问题，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中方关注。

真诚地希望，中美双方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按照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2018年12月在阿根廷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合作，为中美双向投资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稳定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责任编辑：沈家文

· 智库言论 ·

如何推动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

2019 年 7 月 24 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 120 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如何推动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邀请国内著名专家与会研讨。现将专家观点综述如下。

一、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和基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会议进一步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他认为，在新时代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念和要求，要进一步发挥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和基石作用。目前开展的“十四五”规划相关研究工作，需要贯彻高质量发展主题，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为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展了能源、交通、水利、信息和市政建设等五大领域的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形成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在高速公路、高铁、通讯 4G 和 5G 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对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能够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能够体现新发展理念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对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研究的课题成果进行介绍。他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也将从规模扩张为主向提高质量为主的阶段转变。

第一，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体现新发展理念。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含以下五点基本特征：一是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二是协调成为发展的内生动力，三是绿色成为基础设施发展的普适要

求，四是开放成为发展的必由之路，五是共享成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第二，我国基础设施还不能完全满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当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政策与制度体系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各领域存在一定短板且布局不尽合理、社会效益与财务收益的平衡难度较大、创新作为第一引领的作用发挥不够、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可靠性及协调发展还需提升等多方面问题。

第三，我国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与任务。突破瓶颈，弥补短板，形成更加合理完善的体系；强化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形成更加合理的城乡和区域布局；提升整体效率、安全性、可靠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好的先导作用；提高基础设施的科技水平，更好满足用户需求；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更好的良性循环；增强基础设施五大领域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协同发展效应；提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合作的水平。

第四，促进我国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措施。改革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深化破除垄断、放管服、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在基础设施领域发挥作用；加强中央层面、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各地方政府间的跨领域协调机制，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协调发展；加大国家和社会多方面投入，前瞻性地推动重大科技创新；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完善统计监测和考核评价体系，引导高质量发展。

三、把握好交通运输率先实现现代化机遇，

打好交通运输服务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和引领的“先手牌”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汪鸣认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对稳定投资（稳增长）、发育产业（增动能）、营造环境（调结构）、优化空间（聚要素）均具有积极作用，而交通运输自身的转型升级也有重要的产业价值。

第一，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要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针对区域发展新格局、新型城镇化、社会主义新农村、产业布局优化调整等需求，精准发挥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从大区域一般性布局向区域走廊、城市群网络、都市圈系统精准布局转型，形成交通与城市、产业融合发展。

第二，交通投资持续增长动力不足。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截至 2018 年的“十三五”年均增长为 5.5%，2018 年超过 3.2 万亿元，是 2000 年的 9.3 倍，但 2018 年增速出现大幅

回落，仅增长 0.7%。交通投资持续增长动力不足，主要在于：一是项目投资收益变差，一次资金投入比例增加。中西部地区项目占比逐年增加，对资本金比例要求高，一次资金投入对总投资的撬动弱。同时，无直接收益项目比重增加。二是项目资金投入能力减弱，突出表现在：地方投融资平台整顿导致的项目融资渠道收缩，地方财政投入能力减弱，民间资本进入积极性低，国家铁路总公司的负债比例较高，用地、用海和环保等要求更加严格。

第三，促进我国交通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措施。补短板和新供给形成交通基础设施新的投资重点，促进我国交通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包括：强化骨干通道建设；进一步突出对国家重大战略的支撑作用；打通“最后一公里”，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军民融合，打造国防交通建设新格局；推进新型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并形成都市圈高效交通系统。

四、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向绿色低碳为主转型， 充分发挥市场在能源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原所长韩文科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以电力为中心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形成了门类齐全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体系和世界领先的能源设备制造产业。

第一，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需尽快向绿色低碳转型。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使得我国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但需要加快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向绿色低碳为主转型。不仅要求以绿色低碳的方式开展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也要求以资源集约化、环保生态的绿色低碳方式开展运营。

第二，在产业发展政策上，充分发挥市场在能源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总量上，要突破发展瓶颈，充分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在结构上，要更加突出清洁能源；在布局上，更好地将国家能源战略规划与地区发展相结合，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依据因地制宜原则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

第三，能源基础设施的发展模式需要全方位的改革与机制创新。以国有建设和运营为主转到多种所有制共同参与建设和运营；以国家集中规划、集中建设为主转向更加突出分布式、考虑地区平衡和市场平衡的发展；更加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的互动，拓宽互联互通，拓宽资源调配的范畴，使盈利性或者效益更提升一步；在具体能源路径和技术选择上更加依靠市场的力量；在建设运营上主要依靠避免高杠杆的市场化手段。

五、污水管网更新与修复是实现城市环保基础设施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住建部城建司巡视员张悦认为，在我国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管网破漏、清水污水混杂难题，对污水管网进行更新与修复。据测算，我国城市排水管网存量约 63 万公里，约 65% 具有收集污水功能，其中约 20 万公里亟待更新修复，总投资约需 3000 亿元。

第一，城市基础设施的排水管网问题成为目前制约城市发展的突出问题。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治理难题是清水灌满管道和污水溢流河道，导致污水厂的污水浓度上不去和河道的污水浓度下不来的矛盾，城市管网质量问题是这个矛盾的根源。在我国南方和北方问题表现不一：在南方表现为清水入管问题，大部分城市由于管网破裂，污水厂的进水被大量地下水和河水稀释；在北方则表现为污水外漏问题。管网最核心的问题是管材质量低劣所造成的，应当采取球墨铸铁管的管材。

第二，城市排水管网问题主要是由“唯政绩”造成的。主要表现为：市场价格机制不合理，因为污水处理的计价单位是按污水量计量的；重视地面建筑轻视地下管网，监管难且考核不到位，导致伪劣管材盛行的现象。

第三，污水管网更新与修复迫在眉睫。应进一步明确目标，落实责任，科学实施，强化考核。目标是提高污水处理的效率，污水的进水浓度要进一步提高；责任主体为政府，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进一步协同；进一步落实存量管网的质量提升，更新排污管材；实施减排的综合评价体系，推广污水厂、管网和河湖的一体化评价体系。

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十六字”治水方针， 实现水利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农经司原司长高俊才认为，为实现我国水利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刻领会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十六字治水方针。

节水优先。我国人均水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 1/4，且时空分布不均匀，水资源属于不可进口资源。节水优先的两项措施是：农村农业灌溉渠道尽可能实现管道连接；城市大幅提高水价，对不同人群实行差别化水价。

空间均衡。从人口布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出发，进一步实现水资源的空间

均衡。第一，继续对南水北调的空间布局进行优化，实施南水北调 1.5 期工程，深挖东线和中线的水资源供给潜力，加大对北京、天津和雄安的水资源供给。第二，长远看，加强水利的西建工程可行性研究，对“三江”（长江、珠江、松花江）到“四河”（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的调水工程开展前期论证。

系统治理。统筹自然生态各要素，从国家大系统的总体框架之下实现对水资源的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从水的公共产品属性出发，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实现水利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要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一方面要优化政府投资，另一方面要完善水资源市场机制，改革水价制度，关键是解决水权问题。

七、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何霞认为，全球数字化浪潮带来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经济也对信息基础设施提出了新要求，要进一步推动构建高质量信息基础设施。

第一，工业互联网和车联网的发展对信息基础设施提出新需求。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所形成的新兴业态与应用模式；车联网实现了智能动态信息服务、汽车智能化控制、智能化交通运输管理。这些新一代的数字信息系统对信息基础设施提出了新需求。

第二，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是通过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构建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和各行业发展基础平台的集合，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防等各方面都有重大影响。

第三，全方位、多角度建设高质量的信息基础设施。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形成多元化的投资形态；明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商群体的社会化企业定位；推动数字互通、产业互融和监管协同；重视平台数据与个人信息保护，强化平台治理；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

（郭迎锋）

责任编辑：李蕊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9年7月中旬以来，国际权威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IMF 下调 2019、2020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年7月23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预测》报告，预计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3.2%，2020年回升至3.5%。与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IMF此次报告对这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值均下调0.1个百分点。报告指出，由于全球技术供应链受到美国制裁前景的威胁、与英国“脱欧”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扰乱了能源价格等因素，IMF下调了2019、202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而截至目前发布的GDP数据以及总体下行的通胀形势也表明，全球经济活动弱于预期。由于企业和家庭继续抑制长期支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和耐用消费品需求持续低迷，导致与之相关的国际贸易依旧疲软。

2020年预计全球增速回升，主要依据有如下几个因素：一是金融市场情绪总体支持增长；二是临时性拖累因素影响继续消退，尤其是在欧元区；三是承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形势企稳，如阿根廷和土耳其；四是经济体避免更严重的崩溃，如伊朗和委内瑞拉。相比2019年，2020年全球增速预测的改善有70%来自承压经济体的预期企稳和复苏，而这些因素取决于有利的全球政策背景，即确保各央行立场的“鸽派倾向”以及中国政策刺激的积累不会被贸易紧张局势升级或英国无序退出欧盟所削弱。假设当前承压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恢复稳定且贸易政策分歧的解决取得进展的情况下，预计2020年的经济增速回升仍不稳定。

（二）IMF 称全球外部失衡面临主要两大短期风险：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和英国无序脱欧

2019 年 7 月 18 日 IMF 发布年度《对外部门报告》(ESR) 指出，目前全球外部失衡面临的主要短期风险来自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或英国无序脱欧，结构性政策仍然是解决一般外部失衡问题的关键。同时，所有国家都必须避免扭曲贸易的政策。

IMF 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吉塔·戈皮纳特 (Gita Gopinath) 指出，“自从 2007 年全球外部失衡达到顶端（占全球 GDP 的 6%）以来，全球失衡已经取得了极大进展，目前占全球 GDP 的 3%”。戈皮纳特坦言，但 2013 年以来这一进展始终缓慢，外部不平衡也逐渐更多地体现在发达国家中。目前全球外部失衡面临的主要短期风险来自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或英国无序脱欧，因为他们“可能对全球需求和全球风险偏好产生负面影响，并反过来影响那些高度依赖外国需求和外部融资的经济体”。从中期来看，若缺乏纠正政策，贸易紧张局势可能会变得根深蒂固，资产失衡的进一步扩大可能会导致关键债务国经济出现破坏性调整，而这些调整可能会蔓延到全球其他地区。戈皮纳特强调称，各国需要精心计划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实现外部再平衡。经常账户赤字过度的国家需要采取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整顿，与此同时，经常账户盈余过度的经济体应该引入可促进潜在增长的财政政策来实现再平衡。

（三）联合国视气候变化为全球最大挑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019 年 7 月 16 日在 2019 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再次呼吁各国为绿色气候基金注资，认为全球应对行动的步伐落后于气候变化的速度。

联合国非常重视气候变化问题，认为气候变化的危害极其重大。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显示，自 1880 年至 2012 年，全球气温上升了 0.85 摄氏度。气温每上升 1 度，粮食产量就下降约 5%。经济损失方面，联合国发布的《2019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出现，1998 年至 2017 年，与气候相关的灾害造成的损失高达 22450 亿美元，比 1978 年至 1997 年期间增长 151%。还有研究显示，半个世纪以来，气候变化加剧了国家间的不平等，减缓了最贫困国家的发展。

更让联合国不安的是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2015 年，联合国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第 13 个目标是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2016 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正式生效，各国达成共识，致力于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尽管如此，实现这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仍面临挑战。2017年6月，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并重启化石燃料开采计划。二十国集团（G20）大阪峰会的公报中，甚至没有出现“全球变暖”等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字眼。

（四）联合国报告显示 2018 年全球 8.2 亿人挨饿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等机构 2019 年 7 月 15 日联合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饥饿人口逐年增多，截至 2018 年全球面临粮食不足困境的人数达 8.216 亿。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零饥饿”目标正面临巨大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强化合作以应对这一严峻形势。报告首次引入“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这一新的监测指标。报告估计，全球共有超过 20 亿人处于这一状态，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达席尔瓦表示，“全球饥饿人口在经历近 10 年的持续下降后，过去 3 年出现激增。全球在应对粮食安全等问题上出现的停滞与倒退向我们发出了明确警告，如果想在 2030 年前实现‘零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必须更迅速地采取更多措施”。

根据联合国报告，过去 3 年中，面临粮食危机的总人数维持在 1 亿人以上，波及的国家和地区正在扩大。预计 2019 年，也门、刚果（金）、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叙利亚、苏丹、南苏丹以及尼日利亚北部仍将经历全球最为严重的粮食危机，上述国家有大量人口处于粮食紧急状态，导致营养不良问题日趋严重或死亡人数增多。气候变化、地区冲突和经济发展放缓是造成全球饥饿人口上升的重要因素。有专家指出，在这三大因素中，冲突因素比重最大，2018 年共有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7400 万人因冲突或安全局势动荡而陷入饥饿。

（五）英智库：全球经济放缓或令多国央行重启量化宽松

英智库牛津经济研究院 2019 年 7 月 24 日发布报告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传统的货币政策缺乏空间，多国央行可能会重启量化宽松政策，以促进其经济增长。如果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7 国集团（G7）央行将很快用完传统货币政策的“弹药”。自 1980 年以来，在政策宽松周期中，G7 平均的利率调整为 350 个基点。但是目前，G7 平均利率为不到 1%。这些国家降息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央行可能会很快回归到非常规的政策选择，比如量化宽松。

报告预测，为匹配这一货币宽松周期，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将需要购买价值超过 20% GDP 的资产，“由于美国仍有利率调整空间，因此量化宽松手段将更加温和”。低风险收益率、窄风险利差和高资产估值，意味着量化宽松可能不如过去有效。例如，核心欧元

区国家和日本 10 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逼近 0，国债操作空间有限。因此，全球经济衰退越深，量化宽松就会越多样化和更加激进。量化宽松可能带来些许问题。“所有更激进的选择都有缺点，例如让政府成为金融市场的主导者；让政府大量参与公司治理和信贷方向；并且，将来从量化宽松退出将会更难。”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IMF：中国经济外部再平衡取得进展

IMF 2019 年 7 月 17 日表示，2018 年中国外部头寸基本符合中期经济基本面，中国经济外部再平衡继续取得进展。IMF 当天发布《2019 外部风险报告》称，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已从 2007 年的约 10% 大幅降至 2018 年的 0.4%，中国外部头寸已基本符合中期经济基本面，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不再依赖出口拉动，而转向内需驱动。报告说，2007 年以来中国经常账户顺差持续大幅下降，是主要发达经济体需求疲软、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服务贸易逆差扩大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反映出中国经济再平衡取得显著进展。

随着中国经济再平衡继续推进，IMF 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将进一步下降。IMF 表示，2018 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经济基本面保持一致，从全年看跨境资本流动为小幅净流入。IMF 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表示，IMF 期待中国继续依靠国内消费驱动经济增长，减少信贷依赖，并鼓励私营部门更多参与到经济当中。呼吁拥有经常账户顺差和逆差的经济体共同努力解决全球失衡问题，重振国际贸易，避免采取扭曲的贸易政策措施。

（二）IMF：政策与内需助力中国经济稳健增长

IMF 研究部副主管吉安在 2019 年 7 月 23 日《世界经济展望更新预测》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经济的重要积极因素是政府有能力保障宏观经济稳定。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也表示，中国有足够政策空间继续应对当前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下行风险。

除宏观政策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外，IMF 还指出中国经济的内部再平衡取得进展，即经济增长更多由消费而非投资和出口驱动，这令中国经济在应对外部冲击时的韧性进一步增强。IMF 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特表示，IMF 期待中国继续依靠国内消费驱动经济增长，减少信贷依赖，并鼓励私营部门更多参与到经济活动中。

麦肯锡公司近期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的 16 个季度中，有 11 个季度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 60%。麦肯锡亚洲区董事长奥利弗·汤比认为，中

国正在打造更强劲、更多样化的经济。

（三）海外专家：中国经济潜力巨大、韧性十足

在世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保持稳健运行的良好态势引发海外专家热议，中国经济潜力巨大、韧性十足成为普遍看法。

美国硅谷著名天使投资人史蒂夫·霍夫曼表示非常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他表示，中国经济政策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为世界经济带来了积极影响。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支持民营经济等多种举措推动了相关产业蓬勃发展，中国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

埃及中埃商会主席迪亚·菲基表示，中国是强大且重要的经济体，中国奉行的合作共赢原则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国注重发展和互利，中国经济稳健增长不仅反映了其自身成就，也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示范和样本。中国经济在有效应对经贸摩擦等外部压力的同时保持了自己的步伐和节奏，中国经济发展有助于为全球经济合作与投资开辟广阔前景。

沙特阿拉伯智库海湾研究中心首席经济专家约翰·斯法基亚纳基斯表示，伴随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和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中国经济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前景更加光明。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中国的贡献有目共睹，中国脱贫减贫的成功实践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爱德赫雷·卡文斯表示，广泛协商和高效执行是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因素，中国的发展模式为全球消除贫困和经济转型树立了典范。基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经济体量，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已经不仅仅是关乎中国自己，而是关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

（四）澳新银行：到 2021 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降至 6% 以下

澳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Yetsenga 2019 年 7 月 24 日在悉尼指出，澳新银行发表研究报告认为，2021 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放缓至 6% 以下，部分原因是低迷的全球经济加快“不可阻挡的结构性放缓”的速度。IMF 将 2019 年中国经济预期下调 0.1 个百分点，至 6.2%，为该系列数据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将 2020 年下调至 6%。“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阻力相当强”。中国这个除美国之外的全球最大经济体经济的放缓将会对世界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中国占全球 GDP 增幅的 1/3。没有哪个经济体拥有如此大的规模，来填补世界的缺口”。中国政府的政策措施，包括财政支出、放松地方政府限制、放宽住房政策、加强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等等，都未能足以重振短期经济增速。如果美联储普遍预期一般

下调利率，那么中国人民银行也可能会降息。

（五）中国上榜《财富》世界 500 强公司数首超美国

美国《财富》杂志 2019 年 7 月 22 日公布了 2019 年世界 500 强企业排行榜。在以营业收入排名的 500 强榜单中，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企业占据 129 个席位，数量首次超过美国（121 家）。除进入榜单企业数量增加外，中国企业的规模和营收也在不断扩大，进入 2019 年排行榜的中国企业中，77 家排位比 2018 年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9 年 500 强排行榜的 25 家新上榜和重新上榜公司中，新上榜的中国公司有 13 家，占据半壁江山。

“入围 2019 世界 500 强的中国企业在规模与盈利能力上呈现新亮点”。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指出：一是在规模上继续实现较快增长，平均营业收入与 2018 年相比增长了 9.2%，快于世界 500 强总体营业收入增速；二是入围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分别为 5.3%、9.9%，分别比 2018 年高 0.2 个百分点、1.0 个百分点。技术创新是支撑我国大企业近年来持续扩张，不断有大企业新晋世界 500 强的关键所在。此外，商业模式创新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小米成为世界 500 强中最年轻的公司，其核心诀窍就在于持续迭代的商业模式创新。

专家指出，尽管从数量来看，中国企业在世界 500 强榜单上的总数已经名列第一，但仍然大而不强，存在诸多不足。从利润水平来看，此次上榜的世界 500 强平均利润为 43 亿美元，而中国上榜企业的平均利润是 35 亿美元。如果剔除榜单中的银行类企业，中国其他 108 家上榜企业平均利润只有 19.2 亿美元。上榜中国企业的平均销售收益率为 5.3%，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 9.9%，均明显低于美国企业和全球平均水平。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指出，在很多行业，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仍有待提高，特别是在研发、设计、品牌等高端领域与国际先进企业的差距仍然比较明显。中国企业在 500 强榜单上的行业分布值得注意，金融、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类企业偏多，竞争性行业偏少。中国企业“大而不强”的情况仍然存在，改变这种情况的关键在于提升中国企业整体国际竞争力。

责任编辑：沈家文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7年	2018年 估计值	2019年 预测值	2020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年7月)				
世界	3.8	3.6	3.2	3.5
发达国家	2.4	2.2	1.9	1.7
美国	2.2	2.9	2.6	1.9
欧元区	2.4	1.9	1.3	1.6
日本	1.9	0.8	0.9	0.4
发展中国家	4.8	4.5	4.1	4.7
印度	7.2	6.8	7.0	7.2
俄罗斯	1.6	2.3	1.2	1.9
巴西	1.1	1.1	0.8	2.4
世界银行(WB,2019年6月)				
世界	3.1	3.0	2.6	2.7
发达国家	2.3	2.1	1.7	1.5
发展中国家	4.5	4.3	4.0	4.6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19年8月)				
世界	3.2	3.2	2.6	2.6
美国	2.4	2.9	2.3	1.9
欧元区	2.6	1.9	1.1	1.2
日本	1.9	0.8	0.9	0.3
印度	7.2	6.8	6.8	7.0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7年	2018年 估计值	2019年 预测值	2020年 预测值
世界	5.5	3.7	2.5	3.7
发达国家	4.4	3.1	2.2	3.1
发展中国家	7.4	4.7	2.9	4.8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7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7年	2018年 估计值	2019年 预测值	2020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年7月)				
世界				
发达国家	1.7	2.0	1.6	2.0
发展中国家	4.3	4.8	4.8	4.7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19年8月)				
世界	2.5	2.9	2.6	2.6
美国	2.1	2.4	1.8	2.1
欧元区	1.5	1.8	1.3	1.4
日本	0.5	1.0	0.7	0.8
印度	3.6	3.4	3.7	4.2

注: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8 年		2.4	1.7	3.0
	7 月	2.5	2.1	3.0
	8 月	2.6	2.1	3.1
	9 月	2.4	2.1	3.0
	10 月	2.5	2.2	3.0
	11 月	2.2	2.0	2.5
	12 月	2.0	1.6	2.2
2019 年	1 月	2.0	1.5	2.2
	2 月	2.0	1.5	2.4
	3 月	2.1	1.7	2.6
	4 月	2.1	1.8	2.9
	5 月	2.3	1.7	2.8
	6 月	2.0	1.6	2.5
	7 月	2.1	1.5	2.9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8 年		3.6	2.1	4.9			
	7 月	3.7	2.2	5.7	52.7	52.9	52.5
	8 月	3.6	2.3	4.7	52.5	53.2	52.4
	9 月	3.6	2.2	4.7	52.1	52.3	51.9
	10 月	3.6	2.4	5.3	52.0	51.8	51.8
	11 月	1.8	0.7	3.9	51.9	51.8	51.8
	12 月	1.8	0.1	3.5	51.4	51.9	51.2
2019 年	1 月	2.4	1.1	3.2	50.8	50.8	50.1
	2 月	2.4	0.5	3.1	50.6	50.6	50.0
	3 月	3.0	0.0	5.2	50.5	50.3	49.9
	4 月	1.2	-0.2	3.5	50.4	50.6	50.1
	5 月	1.8	0.2	3.5	49.8	50.1	49.5
	6 月	1.2	-1.0	3.5	49.4	49.5	49.0
	7 月				49.3	49.5	49.3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 Markit 公司。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7 年		2.4	2.6	0.7
	3 季度	3.2	2.4	-0.1
2018 年	4 季度	3.5	4.6	2.4
		2.9	3.0	1.7
2018 年	1 季度	2.5	1.7	1.9
	2 季度	3.5	4.0	2.6
	3 季度	2.9	3.5	2.1
	4 季度	1.1	1.4	-0.4
2019 年	1 季度	3.1	1.1	2.9
	2 季度	2.0	4.7	4.5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7 年		4.2	3.5	4.7
	3 季度	1.4	4.4	1.3
2018 年	4 季度	8.7	10.1	14.0
		4.6	3.0	4.4
2018 年	1 季度	5.5	0.8	0.6
	2 季度	5.2	5.8	0.3
	3 季度	0.7	-6.2	8.6
	4 季度	2.7	1.5	3.5
2019 年	1 季度	3.2	4.1	-1.5
	2 季度	-1.1	-5.8	0.1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7 年		2.4	2.6	0.7
	3 季度	2.4	2.4	0.5
2018 年	4 季度	2.8	2.9	0.8
		2.9	3.0	1.7
2018 年	1 季度	2.9	2.8	1.4
	2 季度	3.2	3.2	1.7
	3 季度	3.1	3.4	2.2
	4 季度	2.5	2.6	1.5
2019 年	1 季度	2.7	2.5	1.8
	2 季度	2.3	2.7	2.2

表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7年		4.8	3.5	4.7
	3季度	3.5	2.3	4.1
	4季度	5.1	5.5	5.6
2018年		4.6	3.0	4.4
	1季度	4.6	4.1	4.7
	2季度	5.2	5.2	3.9
	3季度	5.0	2.4	5.7
	4季度	3.5	0.4	3.2
2019年				
	1季度	2.9	1.2	2.6
	2季度	1.4	-1.5	2.6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8、表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8、表9)。

表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非农雇员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环比折年率	同比		
2018年		1.3		3.9	267.9
	7月			3.9	17.8
	8月			3.8	28.2
	9月	1.2	1.2	3.7	10.8
	10月			3.8	27.7
	11月			3.7	19.6
	12月	0.1	1.0	3.9	22.7
2019年					
	1月			4.0	31.2
	2月			3.8	5.6
	3月	3.5	1.7	3.8	15.3
	4月			3.6	21.6
	5月			3.6	6.2
	6月			3.7	19.3
	7月			3.7	16.4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	(%)		(%)	(%)	
2018年		25329		3.0	34530		4.5	-9200
	6月	2110	-1.1	8.6	2584	0.3	7.7	-474
	7月	2087	-1.1	7.2	2612	1.1	9.3	-524
	8月	2078	-0.5	6.2	2626	0.6	9.8	-549
	9月	2097	1.0	5.8	2658	1.2	10.0	-561
	10月	2101	0.2	5.4	2668	0.4	9.0	-567
	11月	2080	-1.0	2.5	2616	-1.9	3.8	-536
	12月	2057	-1.1	-0.5	2665	1.9	3.7	-608
2019年								
	1月	2074	0.8	2.4	2601	-2.4	2.1	-527
	2月	2097	1.1	2.0	2597	-0.2	0.1	-500
	3月	2114	0.8	0.7	2633	1.4	2.4	-519
	4月	2064	-2.4	-1.2	2576	-2.2	0.2	-512
	5月	2107	2.1	-1.2	2660	3.3	3.2	-553
	6月	2063	-2.1	-2.2	2615	-1.7	1.2	-552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2017年		2773	3004	-231
	2季度	856	431	425
	3季度	646	703	-57
	4季度	374	608	-234
2018年		2536	-906	3442
	1季度	528	-481	1009
	2季度	6	-1209	1215
	3季度	1239	560	679
	4季度	763	224	539
2019年				
	1季度	741	338	403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7 年		2.4	1.7	1.2
	2 季度	0.7	0.5	0.4
	3 季度	0.7	0.6	0.5
	4 季度	0.7	0.2	0.2
2018 年		1.9	1.3	1.0
	1 季度	0.4	0.5	0.1
	2 季度	0.4	0.1	0.4
	3 季度	0.1	0.1	0.0
	4 季度	0.2	0.3	0.6
2019 年				
	1 季度	0.4	0.5	0.1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2.6	5.2	3.9
	2 季度	2.2	1.0	1.3
	3 季度	-0.1	1.3	0.3
	4 季度	1.2	2.1	1.5
2018 年		3.4	3.2	3.2
	1 季度	0.0	-0.6	-0.2
	2 季度	1.6	1.2	1.1
	3 季度	0.5	0.2	1.2
	4 季度	1.4	1.2	1.2
2019 年				
	1 季度	1.1	0.6	0.4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8 年			0.4	8.2	1338.7
	6 月	0.0	0.7	8.2	1340.9
	7 月			8.1	1322.4
	8 月			8.0	1310.5
	9 月	-0.1	0.2	8.0	1310.0
	10 月			8.0	1310.6
	11 月			7.9	1296.5
	12 月	-0.1	0.1	7.9	1286.0
2019 年					
	1 月			7.8	1280.5
	2 月			7.8	1272.5
	3 月	0.0	-0.3	7.7	1257.3
	4 月			7.6	1250.5
	5 月			7.6	1242.2
	6 月			7.5	1237.7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7 年		2.4	1.7	1.2
	3 季度	2.8	2.1	1.5
	4 季度	2.8	1.6	1.3
2018 年		1.9	1.3	1.0
	1 季度	2.5	1.8	1.1
	2 季度	2.2	1.4	1.1
	3 季度	1.7	1.0	0.7
	4 季度	1.2	1.1	1.1
2019 年				
	1 季度	1.2	1.1	1.1
	2 季度	1.1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2.7	5.1	3.9
	2 季度	3.7	4.7	4.4
	3 季度	2.9	5.6	4.0
	4 季度	2.6	6.3	3.7
2018 年		3.4	3.2	3.2
	1 季度	3.4	3.9	2.9
	2 季度	2.8	4.0	2.8
	3 季度	3.4	3.0	3.7
	4 季度	3.7	2.0	3.4
2019 年				
	1 季度	4.8	3.2	4.0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	同比	进口额	环比	同比	出口额
			增长	增长		增长	增长	减进
			(%)	(%)		(%)	(%)	口额
2018 年		22782		3.8	20846		6.6	1935
	6 月	1914	1.9	6.2	1752	2.5	9.4	162
	7 月	1893	-1.1	9.4	1768	0.9	14.1	125
	8 月	1928	1.9	5.6	1763	-0.3	8.7	165
	9 月	1907	-1.1	-0.5	1777	0.8	7.9	130
	10 月	1942	1.8	11.1	1808	1.8	14.8	133
	11 月	1928	-0.7	2.3	1775	-1.8	5.5	153
	12 月	1932	0.2	-2.0	1773	-0.1	2.7	159
2019 年								
	1 月	1952	1.1	2.6	1779	0.3	3.5	173
	2 月	1954	0.1	6.2	1748	-1.7	5.6	206
	3 月	1975	1.1	3.5	1789	2.3	6.2	186
	4 月	1927	-2.5	5.4	1774	-0.9	6.8	153
	5 月	1955	1.5	7.1	1759	-0.8	4.8	196
	6 月	1943	-0.6	-4.7	1764	0.3	-4.2	179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2018年		-2767	-2609	-358
	6月	398	277	121
	7月	527	484	43
	8月	-340	-458	118
	9月	-1122	-1131	9
	10月	95	141	46
	11月	-304	-779	475
	12月	-1614	-2058	444
2019年				
	1月	389	537	-148
	2月	78	206	-129
	3月	-189	54	-243
	4月	737	290	448
	5月	-42	128	-171
	6月	-674	-576	-99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19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7年		1.9	1.1	0.3
	3季度	0.7	-0.7	0.3
	4季度	0.3	0.5	0.1
2018年		0.8	0.3	0.8
	1季度	-0.1	-0.1	0.3
	2季度	0.4	0.4	0.1
	3季度	-0.5	-0.1	0.2
	4季度	0.4	0.4	0.7
2019年				
	1季度	0.7	0.1	-0.1
	2季度	0.4	0.6	0.9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口	进口
2017年		2.9	6.8	3.5
	3季度	0.4	2.2	-1.0
	4季度	0.1	1.9	2.6
2018年		1.1	3.4	3.4
	1季度	0.1	1.0	0.6
	2季度	1.2	0.8	0.8
	3季度	-2.0	-2.1	-1.2
	4季度	1.7	1.2	3.6
2019年				
	1季度	0.6	-2.0	-4.3
	2季度	1.2	-0.1	1.6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7年		1.9	1.1	0.3
	3季度	2.2	0.7	0.4
	4季度	2.4	1.2	0.5
2018年		0.8	0.3	0.8
	1季度	1.3	0.2	0.5
	2季度	1.5	0.1	0.7
	3季度	0.1	0.6	0.7
	4季度	0.3	0.5	1.3
2019年				
	1季度	1.0	0.7	0.9
	2季度	1.2	1.0	1.9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口	进口
2017年		3.0	6.8	3.5
	3季度	3.3	7.1	2.6
	4季度	3.0	6.7	5.1
2018年		1.1	3.4	3.4
	1季度	1.9	5.2	3.6
	2季度	2.4	5.9	2.9
	3季度	-1.0	1.7	2.8
	4季度	0.9	1.1	4.1
2019年				
	1季度	1.3	-2.2	-1.3
	2季度	2.0	-2.9	-0.4

资料来源:日本内閣府(表20~表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8年		0.7	1.61	2.4
	6月	-2.3	1.61	2.5
	7月	2.1	1.62	2.5
	8月	-0.6	1.63	2.4
	9月	-0.7	1.63	2.4
	10月	3.9	1.62	2.4
	11月	-0.7	1.63	2.5
	12月	-0.6	1.63	2.4
2019年				
	1月	2.0	1.63	2.5
	2月	-2.0	1.63	2.3
	3月	-3.2	1.63	2.5
	4月	-0.5	1.63	2.4
	5月	0.6	1.62	2.4
	6月		1.61	2.4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进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8 年	814788		4.1	827033		9.7	-12245
7 月	68505	0.4	3.9	69368	2.3	14.6	-863
8 月	68693	0.3	6.5	70310	1.4	15.4	-1617
9 月	67515	-1.7	-1.4	69556	-1.1	7.1	-2041
10 月	70023	3.7	8.2	73615	5.8	20.0	-3592
11 月	67504	-3.6	0.1	71475	-2.9	12.5	-3970
12 月	66708	-1.2	-3.9	68811	-3.7	1.9	-2102
2019 年							
1 月	62255	-6.7	-8.4	65119	-5.4	-0.8	-2864
2 月	66354	6.6	-1.2	66258	1.7	-6.5	96
3 月	65640	-1.1	-2.4	67559	2.0	1.2	-1919
4 月	65866	0.3	-2.4	67222	-0.5	6.5	-1356
5 月	62547	-5.0	-7.8	68008	1.2	-1.4	-5461
6 月	65825	5.2	-6.6	66164	-2.7	-5.2	-339
7 月	65683	-0.2	-1.6	66950	1.2	-1.2	-1268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2018 年		28590	175788	-147198
	6 月	2365	18887	-16522
	7 月	3592	14899	-11307
	8 月	-356	13329	-13685
	9 月	5807	17588	-11781
	10 月	428	8197	-7769
	11 月	4223	27158	-22935
	12 月	1277	11285	-10008
2019 年				
	1 月	1078	71933	-70855
	2 月	2506	12932	-10426
	3 月	12726	27056	-14330
	4 月	3234	20718	-17484
	5 月	4086	12308	-8222
	6 月	137	14862	-14725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7 年		3.0	1.8	1.3	1.0	6.7	1.6
	3 季度	3.0	2.0	1.6	1.4	6.8	2.2
	4 季度	2.9	1.6	1.4	2.2	7.7	0.9
2018 年		1.9	1.4	0.6	1.1	7.0	2.3
	1 季度	2.2	1.2	0.7	1.2	7.7	1.9
	2 季度	1.8	1.4	0.1	0.9	8.0	2.2
	3 季度	2.0	1.6	1.3	1.3	7.0	2.2
	4 季度	1.6	1.4	1.1	1.1	6.6	2.7
2019 年							
	1 季度	1.3	1.8	0.0	0.5	5.8	0.5
	2 季度		1.2		1.0		0.9

注: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2017 年		3.1	2.0	3.8	3.1	5.9	5.1
	3 季度	3.8	1.6	3.6	3.4	6.1	5.1
	4 季度	2.8	1.5	3.5	3.5	5.7	5.2
2018 年		2.7	2.0	3.0	2.7	4.7	5.2
	1 季度	2.9	1.2	4.6	3.2	5.3	5.1
	2 季度	2.9	2.6	3.6	3.3	4.5	5.3
	3 季度	1.9	2.5	2.8	2.4	4.4	5.2
	4 季度	3.0	1.7	1.2	1.8	4.7	5.2
2019 年							
	1 季度	1.6	1.2	0.6	1.7	4.5	5.1
	2 季度	2.1	-0.8	0.5	2.4	4.9	5.1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8 年		5.8	4.1	27.1	12.3	4.1	4.8
	7 月	5.8	4.0		12.3		4.7
	8 月	6.0	4.0		12.1		4.6
	9 月	5.8	4.1	27.5	11.9	3.5	4.5
	10 月	5.7	4.1		11.7		4.7
	11 月	5.6	4.0		11.6		4.8
	12 月	5.6	4.0	27.1	11.6	3.5	4.8
2019 年							
	1 月	5.8	3.9		12.0		4.9
	2 月	5.8	3.9		12.4		4.9
	3 月	5.8	3.8	27.6	12.7	3.5	4.7
	4 月	5.7	3.8		12.5		4.7
	5 月	5.4	3.8		12.3		4.5
	6 月	5.5	3.9	29.0	12.0		4.4
	7 月	5.7					4.5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2018 年		3.9	3.3	2.8	3.7	3.3	
	7 月	3.8	3.5	2.8	3.7	3.4	
	8 月	4.1	3.5	2.8	3.7	3.4	
	9 月	4.0	3.6	2.8	3.7	3.3	5.3
	10 月	3.9	3.2	2.8	3.7	3.3	
	11 月	3.8	3.3	2.8	3.7	3.3	
	12 月	3.8	3.4	2.8	3.7	3.3	
2019 年							
	1 月	4.4	3.6	2.8	3.7	3.3	
	2 月	3.7	3.3	2.8	3.7	3.3	
	3 月	3.8	3.2	2.8	3.7	3.4	5.0
	4 月	4.1	3.5	2.8	3.7	3.4	
	5 月	4.0	3.5	2.8	3.8	3.3	
	6 月	4.0	3.6	2.8	3.7	3.3	
	7 月	4.0	3.7	2.9	3.7		

注:(1)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8年	4506	4704	-197	4868	6738	-1870
6月	399.6	411.3	-11.7	423.6	556.8	-133.2
7月	374.8	388.1	-13.2	421.8	557.1	-135.4
8月	387.0	410.3	-23.3	404.7	535.7	-131.1
9月	373.2	384.8	-11.6	421.4	542.4	-121.1
10月	397.6	406.2	-8.6	432.6	606.3	-173.7
11月	372.9	383.3	-10.4	395.1	598.8	-203.7
12月	348.5	356.4	-7.9	333.9	506.9	-173.0
2019年						
1月	342.9	369.0	-26.1	371.5	594.2	-222.7
2月	324.5	358.2	-33.7	381.2	564.2	-183.0
3月	393.3	414.0	-20.7	449.3	636.1	-186.8
4月	371.8	397.3	-25.4	390.0	523.2	-133.2
5月	412.1	413.7	-1.6	403.7	521.6	-117.9
6月	384.8	389.0	-4.2	377.6	504.8	-127.2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非			巴西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8年	940	933	6	2399	1812	587
7月	79.8	83.5	-3.7	225.3	186.5	38.8
8月	82.8	76.6	6.2	216.0	187.8	28.2
9月	76.6	79.0	-2.5	192.3	141.2	51.1
10月	84.2	88.2	-4.0	220.2	161.1	59.1
11月	84.1	81.8	2.3	210.9	168.6	42.3
12月	71.6	60.0	11.6	195.6	129.2	66.4
2019年						
1月	64.0	73.6	-9.5	183.8	163.9	20.0
2月	70.9	68.1	2.8	161.0	126.2	34.8
3月	76.1	72.6	3.5	181.7	131.3	50.4
4月	73.2	75.7	-2.5	196.9	136.3	60.6
5月	79.0	77.9	1.1	213.9	149.7	64.2
6月	74.0	71.1	2.9	180.5	130.3	50.2
7月				200.5	177.6	22.9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度			俄罗斯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8年	3248	5080	-1832	4440	2491	1950
7月	257.7	437.9	-180.2	343.9	212.2	131.7
8月	278.4	452.4	-174.0	375.7	216.7	158.9
9月	279.5	419.3	-139.8	386.4	198.1	188.3
10月	269.8	441.1	-171.3	413.7	215.1	198.5
11月	265.0	431.7	-166.7	402.9	212.5	190.4
12月	279.3	410.1	-130.8	408.4	224.1	184.3
2019年						
1月	263.6	410.9	-147.3	308.2	164.2	144.0
2月	266.7	362.6	-95.9	347.5	182.3	165.2
3月	325.5	434.4	-108.9	368.1	209.2	158.9
4月	260.7	414.0	-153.3	356.6	219.5	137.1
5月	299.9	453.5	-153.6	315.9	197.7	118.2
6月	250.1	402.9	-152.8	324.8	199.7	125.1
7月	263.3	397.6	-134.3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8年	6052	5350	702	4506	4766	-260
7月	518.1	449.6	68.5	367.2	406.7	-39.5
8月	511.8	443.5	68.4	395.4	432.5	-37.2
9月	506.5	410.1	96.4	378.1	390.1	-12.1
10月	548.6	484.8	63.8	413.6	442.9	-29.3
11月	514.8	468.1	46.7	386.1	409.3	-23.2
12月	482.1	440.2	41.8	375.5	356.9	18.6
2019年						
1月	461.8	450.5	11.3	326.2	372.6	-46.4
2月	394.8	365.2	29.6	364.1	350.7	13.4
3月	470.1	419.4	50.8	390.2	375.3	14.9
4月	488.0	449.1	39.0	394.5	380.8	13.7
5月	457.7	436.3	21.4	418.3	408.0	10.3
6月	440.9	401.0	40.0	379.5	353.9	25.6
7月	461.4	437.0	24.4	393.0	404.2	-11.2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8年	5685	6266	-582	3361	2863	497
7月	489.8	540.6	-50.8	283.6	260.5	23.1
8月	505.8	559.1	-53.4	282.8	236.7	46.1
9月	491.8	555.4	-63.7	296.2	252.5	43.7
10月	511.1	558.8	-47.7	295.5	261.6	33.9
11月	498.5	542.2	-43.8	277.8	231.1	46.7
12月	455.5	508.5	-52.9	285.6	238.9	46.7
2019年						
1月	474.9	472.3	2.6	272.9	263.8	9.1
2月	314.2	360.5	-46.3	204.0	154.6	49.3
3月	467.3	526.5	-59.2	286.4	255.6	30.8
4月	440.6	474.3	-33.8	258.0	231.5	26.5
5月	455.5	499.7	-44.2	277.2	232.2	44.9
6月	408.6	473.3	-64.7	283.9	245.1	38.7
7月				282.0	246.4	35.7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8年	2475	2176	299	1802	1887	-85
7月	212.8	192.3	20.6	162.9	183.0	-20.1
8月	199.9	196.0	3.9	158.7	168.2	-9.4
9月	200.4	163.6	36.8	149.2	146.1	3.1
10月	231.8	192.6	39.2	158.9	176.7	-17.7
11月	202.9	184.1	18.8	148.5	169.0	-20.5
12月	199.8	174.7	25.0	142.9	153.7	-10.8
2019年						
1月	207.5	179.5	28.0	139.3	149.9	-10.6
2月	163.4	136.3	27.1	125.6	122.3	3.3
3月	206.2	171.0	35.3	141.2	134.5	6.7
4月	207.1	180.8	26.3	131.1	154.0	-22.9
5月	204.6	182.5	22.1	148.3	146.1	2.2
6月	183.1	158.4	24.7	117.9	115.0	3.0
7月				154.5	155.1	-0.6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27~表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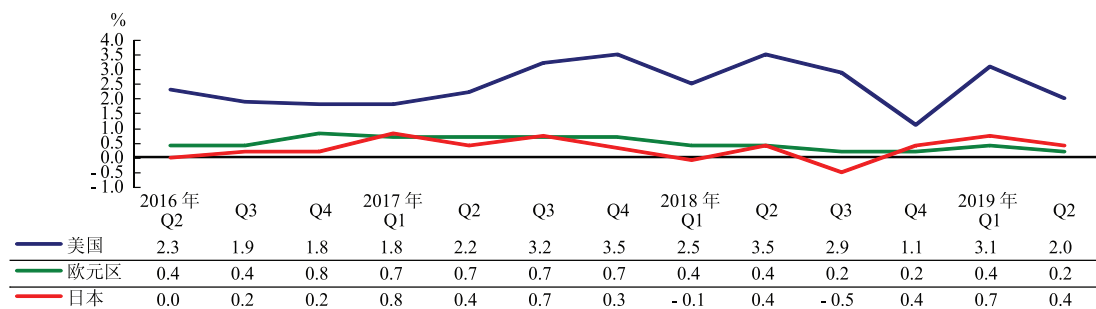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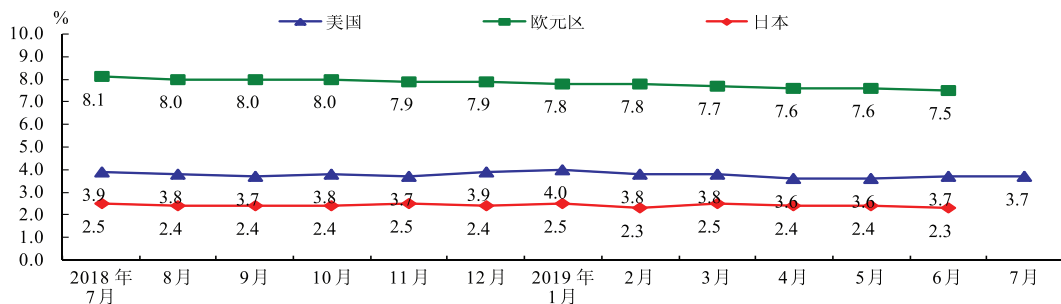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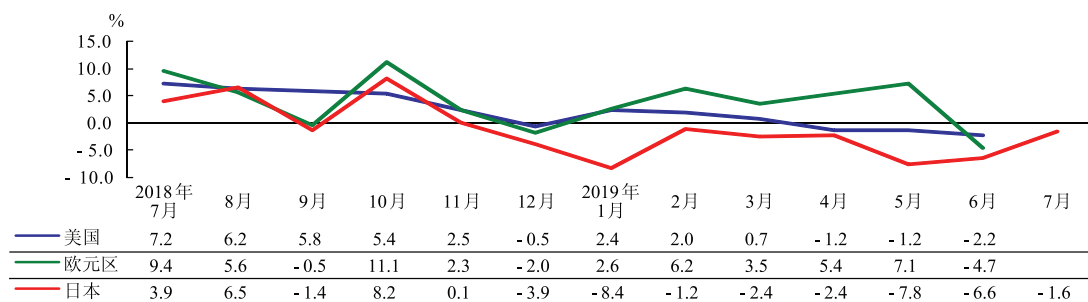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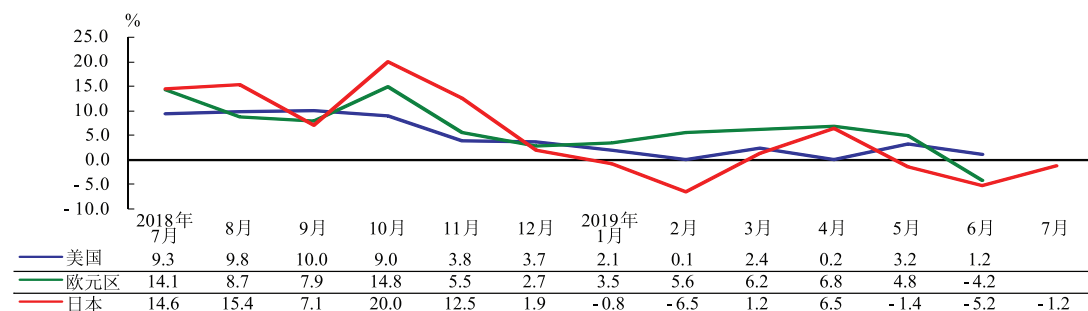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图 1~图 4)。

ABSTRACTS

(1) The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So-called “Deficit Theory” of the U. S. Trade with China

Zeng Peiyan

Since 2018, the U. S.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trade frictions with China and which has been escalating, seriously affecting the economic growth prospects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romoted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consultations with great sincerity and hopes to resolve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As we know, the US trade deficit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a long tim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US dollar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the internal imbalance caused by the low savings and high consumption of its own, the adjustment of the U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shift of manufacturing to overseas. Regarding the trade deficit issue, the US needs to understand correctly and not only emphasize the trade deficit one-sidedl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pattern and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from focusing on trade in goods to placing equal emphasis on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and from focusing on trade in final goods to focusing on trade in intermediate goods. If we only put our emphasis on the trade of goods without the trade in services, only on the total amount of trade without the added value of trade, only on the perspective of GDP and without the perspective of GNP, these are not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fact, over the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suffered from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with China, but has gained tangible benefits in various sectors such as the state, enterprises, and families. It is hoped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respect each other's core interests, resolve their respective legitimate concerns, implement the principles and directions set by the two heads of state, be pragmatic and enterprising, and achieve mutually acceptable trade agreements. This not only ha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ut also has exemplary significanc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2) Guangzhou: Realizing Revival and Rejuven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Zhang Dawei

In February 2019,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ially released the Outline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Outline), the Bay Area, the Belt and Road,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ve become major strategie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the Outline,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A vibrant world-class city cluster, A globally influential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An important support pillar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showcase for in-depth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nd Macao, A quality living circle for living, working and travelling. In the Outline and relevant

documents recently issu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national embodied in the regional strategy is clearly revealed as following: The enrich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aintaining the long-term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vision of development,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new economic drivers and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to support the continued growth in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further Opening up,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advanc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develop into an important support area for the convergence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To drive the innovative and green development of Zhuhai-Xijiang Economic Belt.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uangzhou needs to better shoulder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being a national central city. It suggests that, to accelerat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urban renewal, to make old Guangzhou further rejuvenate; to maintain the city’s youthful; to build Guangzhou into an internationally influential fashion center and consumer center.

(3) The Analysis of China’s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9 and Prospects for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Hu Chenpei, Wangjun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9, the Chinese economy showed an overall stable and stable developing trend.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is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continues to be stable in a reasonable range, the economic structure is continuously optimize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s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re more obvious. However, while the economy is growing steadil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becoming more complicated and the economy is facing new downward pressu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second half of 2019,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economy will face severe challenges. There will be a great uncertainty in the external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The internal deep-level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will still be prominent. Macroeconomic policies should continue to be based o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It should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six stable” policy (ensure stable employment, a stable financial sector, stable foreign trade, stable foreign investment, stable domestic investment, and stable expectations)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4) The Analysis of the Certainty of Trade Friction and the Urgency of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Basis

Huang Zhiling

As Sino-US trade frictions continue to intensify, the U. S. ’s increasing demands for trade with China have far deviated from the so-called “trade friction” field. Based on the previous trade frictions and ending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j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ors, most of strategic intentions are very obvious. Trade friction is only a means, and strategic containment is its ultimate goal.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trategic containment, the United States may adopt various means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including the more common means of trade warfare such as tariff increase, import and export control, and the use financial warfare which is more dangerous means when the means of trade warfare cannot achieve its purpose. We need control Sino-US trade frictions as much as possible in the “trade area”, maintain active cooperation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avoid expanding trade frictions into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immediately focus on long-term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strive for a larger

space for cycling when extreme situations arise.

(5)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Australia's Sharing Economy Development

Yu Fengxia

The sharing economy brings the daw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human beings. The sharing economy has many advantages and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Its development still faces enormou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balance between old and new formats, adjustment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changes in labor relations, and changes in regulatory policies. In the balance of sha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ew & old formats, the government finally chose to support public opinion and make policy adjustments in terms of taxation, supervis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which not on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but also ensures fair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old & new formats. Referencing to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 would help China to develop sha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ulatory policies better.

(6) The R&D Investment Mechanism of OECD Countri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Yang Baibing, Li Taoya

This study takes the OECD countries as research objects. By constructing the R&D input-output efficiency analysis framework, the innovation mechanism would b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R&D input, basic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innovation output. This study would also provide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OECD countries in innovation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show that, R&D input structure rather than quantity has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novation output, and enterprise-led R&D investment has higher input-output efficiency; The impact of the level of basic research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not decisive, and efficient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and perfect technology diffusion network are the key to improv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next steps of development process, China should tak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to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R&D investment, to promote innovative enterprise cluster,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 service function,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to innovate financing mode and etc.

(7)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System and the role of China

Huang Yongfu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system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system and the direction of reform. Finally, it would discuss the role that China can play in building a new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system. The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that China should strive to build an ethical system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fully integrate and apply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iscourse system,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ripartite aid cooperation.

(8) The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y—The Analysis of Multinational Panel Data which about 108 Countries or Regions

Jiang Huichen

Since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he adoption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for maintaining financial stability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for its effectiveness. Compar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systemic risk", research on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especially on their effectiveness was not enough. Based on the

multinational panel data of 108 countries or regions, this article uses the systematic banking crisis index to measure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study the impact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y instrument system on financial stability. From a full-sample perspective, as the number of macro-prudential tools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a systemic crisis will decline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borrower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oriented macro-prudential tools would also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a crisis. The study figure out, different economies use different macro-prudential tools with different frequencies, the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using the highest number of times, followed by developed economies and low-income developing economies with the lowest. From the regression results, emerging markets and low-income developing economies adopt macro-prudential tools and subdivided tools, and developed economies use borrower-oriented macro-prudential tools to help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crisis. Therefore, the design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y tools to prevent systemic crises should be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maintaining financial stability.

(9)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Trends, Problems and Choices

Li Chao

The world is in the midst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a new adjustment will occur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Whether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an adapt to the technological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new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omple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enhance it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vocational education plays a major role. According to the newly promulgated National Plan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the stat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education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more important and outstand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should link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arket demand,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new features will further enhance the scale and leve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ajors and key specialties, form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explore new mod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ubstantially enhance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realize "three conversion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10)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Focus of Zhengzhou - a Regional Central City

Huang Qifan

Zhengzhou achieved three breakthroughs in 2018. The first one was that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exceeded 10 million, the second was that the built-up area of the city exceeded 1,000 square kilometers, and the third was that GDP exceeded one trillion. The three breakthroughs hav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which is a milestone that marking Zhengzhou entering a new era and the city development of Zhengzhou City entering a new stage. Zhengzhou's strategic positioning in the future: Zhengzhou is a megacity in our country; Zhengzhou is to become a national central city, and it would be an economic center, a trade center, a transportation hub shipping center; Zhengzhou is the leader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Central Plains, with Zhengzhou as The center is a city group of hubs. In order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ation hubs, Zhengzhou should develop the intensity of public service construction, strive to become an open highland, and do a good job in finance an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anagement.

Editor: Zhao Ze